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

魏国英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要:我国女性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传统学科女性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伴随着女性学知识与理论系统的不断完善,女性学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不断推进,初步呈现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和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的两种探索模式,并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女性学;方法论;唯物史观;社会性别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01-06

我国女性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在传统学科的女性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女性学内在学理构建和外学科建制的推进,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已初见端倪。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设立了女性学研究生专业方向并开始招收研究生。2006年,教育部批准中华女子学院设立女性学本科专业,并每年招收30名本科学士生。这一年,北京大学的女性学研究生专业方向升格为硕士学位授予点,成为社会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2008年,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设立女性学研究硕士点,2012年升格为跨学科的女性学博士授予点。至此,女性学本科、硕士、博士级学位教育已被纳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在各既有学科开设女性学研究硕士和博士专业方向、开设女性与性别研究课程方面,也取得显著进步。据统计,截至2008年,已有32所大学和研究所,在遍及哲学、经济学、文学、史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和医学等八大学科门类的

40多个硕士学位点和15个博士学位点上,招收了女性或性别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高等院校面向本专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女性或性别研究课程达282门^[2]。伴随我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也逐步深入。本文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高等院校先后出版的10本女性学原理性教材^①和相关论著,对我国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发展态势及其模式特征做一简要探讨。

一、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发展态势

一般来说,所谓研究方法是指认识事物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它是认识事物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发生联系的桥梁和中介。这就决定了一切研究的方法都有两个特点:从主观方面看,它受到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支配;从客观方面看,它反映着特定认识对象的属性与特点。随着认识和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相当完备。按其普遍程度来讲,大体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

收稿日期:2014-12-07

作者简介:魏国英(1946-),女,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编审,主要从事女性学研究。

个层次是各门科学的一些特殊的研究方法;第二个层次是各门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第三个层次则是宏观的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是一切科学的最普遍的方法^[3]。哲学方法亦可称为方法论,它是具体研究方法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指导。当然,不同的哲学学派有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方法论也应用到不同的学科。在具有历史属性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研究中,应遵循何种方法论,这是由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以及研究对象的具体属性决定的。按照以上3个层次的划分,作为一门相对规范的学科,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也应该具有从低到高的3个层次,即特殊研究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方法。

我国的女性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式起步的,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也带有时代特色。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批判“极左”运动的展开,我国思想理论界曾出现过一股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风潮。女性研究界也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已不能解释现阶段的妇女问题”^[4]“妇女学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风马牛不相及”^[5]等观点。这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女性研究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受到严重的质疑和挑战。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各种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及其分析框架,也被不断且大量地引入进来,对中国女性研究界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相当一个时期,传播和吸纳西方女性主义的研究视角、分析工具和运作策略,成为了女性研究的新潮和热潮。初始阶段,一些研究力量相对雄厚的传统学科的女性研究发展较快。女性文学与女性批评、妇女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教育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取得明显成果,为之后的女性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方法借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女性研究界,曾出现过要不要建设独立的女性学学科,要不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不要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能不能拥有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等问题的争鸣和讨论。

经过不断的探讨与实践,上世纪末以来,建

立独立的女性学学科,推动女性学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呼声逐渐明晰和强烈。学界普遍认为:“女性学学科的问世是世界妇女运动和妇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女性学学科的创立是发展妇女运动、深化中国女性研究的客观要求”^[6]。“如果没有妇女学学科建设,妇女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7]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学术理论界推进女性学建设的行动,也就更加自信和自觉。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至少先后出版了10部女性学原理性教材。这说明女性学研究进步很快,其研究方法也日益成熟。首先,在女性学的特殊研究方法这个层次上,取得了基本共识。由于女性学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是与男性相对应的人类的另一半,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它需要独特的研究方法,即性别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女性学安身立命之本^[8]。由此,构建以性别分析法为核心的女性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就成为学者们较为普遍的意见。这种方法,简单说就是从“人”出发,从“女人”出发,以男性为参照,对女性加以聚焦,从而解答女性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等一系列问题,为男女平等而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其次,在一般研究方法这个层次上,也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一致。由于“女人”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女性问题必然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角度对女性和各种女性现象普遍具有的特质加以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有学者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观念、批判继承的观念,以及借鉴吸收的观念和跨学科思考与观察的视角和规则,现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与方法都可以为其所用。”^[9](P21-22)同时,随着各个学科研究方法在社会性别框架下的成功应用,它们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些学者从初始的“拒绝和否定由男性一手构建起来的包括方法论和研究方法在内的知识体系”,逐渐转化为赞同“有选择地使用与研究目的一致并能够为顺利达到研究目的服务的现成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方法”^[10]。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应该

“选取、改造和转化相关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为女性学所用’的研究方法”^[11],这既是研究任何一种社会现象普遍采用的方法,也是女性学研究中的一般研究方法。当然,也有学者仍坚持认为,因为研究者不可能在研究过程中真正保持价值中立,以往由男性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免不了打上性别歧视的烙印,无法胜任女性学研究重任,甚至还会把女性学引入男性早就铺设好的歧途;应倡导使用与传统研究方法相对立的解释主义的方法,特别是质性研究更适合于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的女性学研究^{[12](P16-23)}。

再次,对于以带有方法论意义的哲学作为女性学研究的指导原则,目前仍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应是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社会性别理论才是女性学研究的方法论核心。有学者指出,既然女性学是社会科学,那么“它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即方法论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要“按照唯物史观的思维模式来分析女性、解剖女性,把女性看成社会的产物、社会的缩影,从女人身上寻求社会历史的因素”;“要从女性与社会的联系和制约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中,寻求关于女性的一切问题的答案”^{[9](P21)}。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女性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综合学科^[13],女性学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而与此种意见不同,有学者则强调:“运用‘社会性别’的概念,是要从理论层面去指导整个研究过程”^{[12](P21)}。也就是说,“社会性别”理论应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要成为核心的指导原则。坚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还进一步比较明确地提出:“要树立社会性别的哲学思想方式,确实把社会性别引入到建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整个过程中去。”“有了社会性别这一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作为先导,我们就会自觉地从女性学的学科角度选用合适的研究步骤和分析手段”^[14]。显然,这种意见是把性别视角、性别差异、性别矛盾方法论化、基本原则化和普遍观念化了。“社会性别”,毕竟是“社

会”的性别,而不是抽象的性别。只要是“社会性别”,那它就不全是能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所指明的,它就必然会同意到这个差异和冲突的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意识形态形式发生关系,就必然要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因此,笔者认为,仅仅用“社会性别”理论去指导女性学“整个研究过程”,或者把“社会性别”理论等同于“哲学思想方式”,等同于“方法论原则”,是难以达到深层次的理论高度、难以解析女性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的。

方法论问题涉及到女性研究的理论假设、框架分析及其材料的选用。不同学者对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看法不尽一致,恰恰折射出该学科到底应以何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选择何种方法论原则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应用分析

女性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综合科学。它的理论和方法既来自对女性生存和发展实践的认识和总结,也指导着人们解释和应对女性发展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与困惑。为此,采用不同的方法论,对各种女性现象和问题就会有着不同的分析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看法和结论。

例如,在如何看待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问题上,女性学界就存在区分和差异。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在男性主导、在民族和国家的解放与振兴中兴起并推进的。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持有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学者就给出了不同的认识 and 解析。有学者提出:“中国妇女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妇女平等地位问题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觉者们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这使我们无法断定,享受着平等公民权的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她应该有的一份权利还是被强制规定的一种身份。”^[15]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妇女解放不同于西方历史上那种由妇女自身掌控的妇女解放,而是在男性主导的国家和民族解放振兴中兴起并发展的,因此这样的妇女解放算不上真正的妇女解放,应当受到质疑和否定。而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伴生物,它也被当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必要环节,并随着国家建构的变化而变化。它与国家建构之间的互动,是一种确定无疑的必然的历史性存在。而正是有这样历史环境的制约,它才呈现出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样态,即男性主导,性别合作,而且在辛亥前革命语境下的女性就已经萌生了此前女性所没有的那种自我意识^[16]。

上述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源自两种不同的理念。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托的女性主义分析框架,势必认为妇女解放就应该是妇女的自我解放,就应该是相对男性而言的、在性别比较基础上的平等权利的诉求。因此,他们指责“男性主导”的妇女解放的不正当性,质疑中国妇女“解放”的成色,对妇女解放的国家与民族叙事采取批判和解构的态度,认为中国妇女已经获得的所谓“解放”,“不过是蕴含了男性主导的国家民族主义以‘解放’的名义强加于传统妇女的一种现代化暴力”^[16]。而倘若按照唯物史观去解释,那么,妇女首先是带有阶级和阶层性的人,然后才是带有阶级和阶层性的女人。妇女的解放首先是作为人的解放,其次才是作为女人的解放;妇女解放应该也始终与人的解放结合在一起。从人的解放来说,只要社会存在等级差异,消除性别等级就不一定比消除非性别等级具有优先性^[16]。因此,他们认为,男性主导的与国家民族解放紧密相连的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的解放与妇女解放的一种很好的结合。而将个人与社会和国家对立的西方视野,只看到国家和民族论述召唤女性奉献的一面,却无视了国家和民族论述有时会帮助女性获得平等权利并推动女权发展的另一面^[17]。上世纪20年代中国妇女运动杰出领导者和实践者向警予就曾说过:争国权和民权与争女权并不相悖,争国权与民权的国民革命是“开女权之路”,因为“非将人权民权首先争回,女权不能有存在的根据”^[18]。这一见解,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妇女解放的状况,学界也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国家“恩赐”的、是“超前”的、是“去性别化”的,因此需要在女性主

体意识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双向补课^[19]。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近年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出发,这一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三个前瞻性的内涵:一是以改造和废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来铲除压迫妇女的根源;二是以改革家庭和婚姻制度,改变生产关系来建构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三是以改造上层建筑来建构妇女的主人翁精神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20]。这种观点呼吁珍视我国社会主义的这些宝贵历史遗产,以此构建新世纪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理论。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的“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上呈现出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面对这些不同意见所展开的学术讨论与争论,也是积极的、有益的。不同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可以为中国女性学生生长发育提供更丰厚的底蕴与沃土,可以为推进女性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更充足的动力。

三、我国女性学研究方法论的初步评估

毫无疑问,近30年来,蓬勃发展的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方法及其累积的学术成果,为中国女性学研究提供了多视角的分析工具。“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广泛应用,也为中国女性学研究减少了许多起步时的艰难与困惑。它对于推进我国女性学研究视角的多样化,对于揭示当今世界在性别角色塑造上的社会文化的许多不合理之处,有其独特的效果和作用。然而,“社会性别”理论毕竟有其自身的“适用域”,它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理论局限的。譬如,它自身就存在着“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的偏颇^[21]。有学者在研究中已经指出:“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但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这可能会导致妇女学与学科化的僵化。”^[2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要防止走向方法论上的‘性别万能论’,要坚持批判性和宽容性并存的原则,在女性研究方法上秉持开放和多元的态度”^[23]。

鉴于此,有些学者主张,要将社会性别分析

范畴与其他分析范畴结合起来,尽量避免从单一的女性角度来考察性别问题,而应从两性角度来思考女性发展与两性和谐问题。也有学者从本土的角度提出“弱嵌入”分析方法^[24],认为“我们需要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无论是思考问题、分析原因还是寻找对策,都不能脱离中国现实社会系统”。“我们需要分解这个大系统,发现其中的性别关系”,同时“又要将其‘嵌入’回这个系统中去发现联系和影响,寻找原因和对策”。“弱嵌入性”还“提示我们关注社会系统中的性别关系需要注意的‘度’,既不能脱离社会经济现实孤立地讨论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也不能将社会经济关系对性别关系和性别问题的影响绝对化,或理解成‘强嵌入性’。否则,性别关系就可能被埋没在社会经济关系之中”^[25]。这一理论思路,是值得重视的。

笔者认为,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分析方法,是女性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独特的研究手段,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要解析社会性别是如何被建构的,性别等级制度是怎样产生又是怎样被复制、被再生产的,男性中心文化构成要素是什么,它与权力、资源的占有与分配是什么关系,等等,那都必须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必须去考察它的历史起源与它的前提条件,考察它经过了哪些主要的阶段,并以此为根据去认识它的现在和推断它的未来。同时,还必须历史地分析那个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以及经济关系,因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的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6]也就是说,认识女性,只能是从一般的女性进入到社会的女性,再从社会的女性进入到具体历史和具体社会中的女性,从而得到动态的、多维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女性图景。诚然,面对人类社会的前进和妇女实践的发展,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原则的女性学方法论,也要与时俱进,也要改变自己的形态,以便为探索和

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与发展问题提供新的阐释方法和解析模式。

笔者还认为,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指导的性别分析和“社会性别”理论框架下的性别分析,如果处理得好,也可以实现某种共通性。既然二者都是为了认识妇女受压迫被歧视的历史、现状和根源,以推动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既然二者都重视性别比较和分析,并注意从中发现性别的社会差异及其原因,那么,存在互补的功能是可能的。当然,即便如此,这两种方法的本质差异也是不能抹煞的。

客观地说,新世纪以来我国女性学的方法和方法论研究虽有很大推进,但还是不够深入、不够规范和完善,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探索、研究和争鸣。为了不断拓展女性学研究的发展空间,我们一要坚持开放原则,二要倡导学派意识,三要强化合作精神,唯此才能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注释:

- ① 按出版年代为序,这10本教材是:(1)《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女性学》,啜大鹏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3)《女性学》,罗慧兰主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4)《女性学》,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5)《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6)《女性学教程》,周乐诗主编,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7)《女性学导论》,叶文振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8)《女性学导论》,祝平燕、周天枢、宋岩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9)《女性学(第二版)》,骆晓戈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10)《现代女性学概论》,黄蓉生、任一明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参考文献:

- [1] 陈方. 中国女性学的学位教育[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增刊): 36-41.
- [2] 杜芳琴, 王珺. 三十年妇女/性别研究的学科化[A]. 莫文秀. 妇女教育蓝皮书[C]. 北京: 社会科

- 学文献出版社,2008.354.
- [3] 范伟达. 现代社会研究方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33.
- [4] 丁娟. 妇女理论研究的发展及其特点[A].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1991~1995[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44.
- [5] 邓伟志,华泽. 女性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A].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1991~1995[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32.
- [6] 啜大鹏. 试论创建女性学学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65-69.
- [7] 李小江. 妇女研究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兼谈妇女学学科建设问题[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4):129-134.
- [8] 陈方,王珺. 女性学学科建设研究综述[A].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2001~2005[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262.
- [9] 魏国英. 女性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叶文振. 女性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学科意义[J]. 妇女研究论丛,2006,(4):35-39.
- [11] 叶文振. 女性学导论[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87.
- [12] 韩贺南,张健. 女性学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23.
- [13] 祝平燕,周天枢,宋岩. 女性学导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7.
- [14] 啜大鹏. 女性学[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7.
- [15] 孟悦,戴锦华. 浮出历史地表[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25-26.
- [16] 杨剑利. 国家建构语境中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J]. 近代史研究,2013,(3):110-124.
- [17] 宋少鹏. 社会主义女权和自由主义女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妇女运动内部的共识与分歧[J]. 中共党史研究,2013,(5):76-88.
- [18] 向警予. 向警予文集[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40.
- [19] 李小江. 对话白露:关于1980年代“妇女研究运动”——由《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说开去[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8.
- [20] 苏红军. 从“占领华尔街”到“李双双”:从近来对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的反思来认识1950~1970年代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和实践的三个前瞻性的内涵[A]. 岳素兰,魏国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39.
- [21] 潘锦棠. 我看“社会性别理论”及其流行[N]. 中国妇女报,2002-12-02(3).
- [22] 魏开琼. 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本土妇女学的建立[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0-63.
- [23] 吴小英. 女性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综述[A].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 2001~2005[C].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48.
- [24] 孟宪范. 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25] 谭琳. 在变化的社会系统中关注妇女和性别问题——读《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的思考[J]. 妇女研究论丛,2004,(5):63-64.
- [26] 恩格斯. 反杜林论[A].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4.

A Study on the Approaches to Women's Studies and Their Methodology

WEI Guo-ying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began in the middle of 1980s, based on the specific studies on women in the traditional subjec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men's studies, the approaches to women's studies and their methodology improve a lot. Two development pattern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ise, one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other lead by social gender theory.

Key words: women's studies; methodolog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ocial gender theory

·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

麦当娜女权主义： 美国第三波女权主义百花园里的一支毒葩

苏红军

(爱荷华州 爱荷华市 52245, 美国)

摘要: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角度看,1990年代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好的十年之一。在学术、媒体和大众视野中,一支“麦当娜女权主义”名噪一时。这支女权主义虽然内部在理论上各持己见,但是都含有4个重要的共识: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重提性别的生理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强调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认为性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回顾那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特瑞莎·艾伯特和西方一些带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者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娜奥米·沃尔芙和卡米拉·帕格利亚的主要议题、论点、修辞策略和宏观理论框架的评析,对引起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涉及这4个层面的议题的反思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麦当娜女权主义;受害者女权主义;女性气质;身体;性赋权女权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07-09

麦当娜“揭露了永远长不大,总在抱怨的美国女权主义清教徒式的令人窒息的意识形态。”——卡米拉·帕格利亚^[1]

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角度看,1990年代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好的10年之一。在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里根和克林顿政府的支持下,美国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展。随着各种新科技的发明,消费领域产品不断推陈出新。这个10年中还涌现了五光十色的新文化现象。在演艺界,麦当娜以张扬的个性和多变性感的艺术形象横空出世,风靡全球。麦当娜还受到了不少当时兴起的第三波女权主义的推崇,甚至被其中有些人称

为“女权主义的将来”^[1]。

虽然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宣告的“妇女的权利是人权”凸显了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引领的世界主流女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取得的显著成就,但是具有不断反思传统的西方各种新老女权主义在1990年代对第二波女权主义进行了又一轮的回顾。在学术、媒体、商业和大众视野中,一支“麦当娜女权主义”名噪一时^①。这支女权主义虽然内部多元,理论上各持己见,但是都含有4个重要的共识: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重提性别的生理性、自然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强调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如麦当娜一样,认为性

收稿日期:2014-12-21

作者简介:苏红军(1948-),女,退休教师,曾任美国爱荷华大学亚太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北慈大学外文系客座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国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女性文学和评论研究。

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2014年好莱坞电影《消失的女孩》(Gone Girl)再现的“坏女孩女权主义”凸显了这支女权主义对当代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

1990年代,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面临的新的社会现实,虽然其表述方式与西方不同,但上述4个层面的议题也逐渐进入中国妇女理论研究的视野。本文回顾那一时期美国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特瑞莎·艾伯特(Teresa L. Ebert)和西方一些带有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倾向的女权主义学者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娜奥米·沃尔芙(Naomi Wolf)和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的主要论点、议题、修辞策略和宏观理论框架的评析,希望引起中国妇女研究学界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涉及这4个层面的议题的反思。

一、指责第二波女权主义是“受害者女权主义”

要让年轻人相信她们是受害者,她们从上一辈继承的遗产除了受害别无其他,这实在、实在不是个好主意。

——卡米拉·帕格利亚^{[2](P274)}

针对1960年代以来美国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在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和个人生活等层面进行的全面的“女权主义的干预”取得的成就,麦当娜女权主义指出,主流女权主义的理论 and 运动都基于把女性界定为父权制的受害者的前提。主要表述在沃尔芙的“以火对火”(Fire with Fire)(1993)一书中。在这本著作中,她首先发明了“受害者女权主义”这一概念。在回顾30多年来女权主义运动的成就后,她认为女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然后她强调:“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是抓住这个契机,实现性别平等,还是游离而去,抓住过时的受害者形象不放。”^{[3](Pxx-xvi)}她把受害者女权主义总结为:鼓励女性以受害、被动为荣,把隐名埋姓、自我牺牲和集体思维视为领导力、公众承认和个人成功的关键。帕格利亚进一步指出,女性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自由过。她认为,第二波女权主义近30年所做的一切都不外乎抱怨男性。这是

一种青少年的心态。主流女权主义把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于父权制的理论带有清教徒式的道德说教,导致理论上的破产^[1]。

艾伯特等人对麦当娜女权主义把女权主义指责为“受害者女权主义”的质疑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她们非常不赞同沃尔芙等人认为女权主义发展近30年后,父权制式微,或根本不存在的观点。艾伯特以1990年代印度男性通过包办婚姻,在全球大肆贩卖少女学徒工的现实为例强调当代性别压迫不仅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酷。父权制的一个新的特征是打破了地域的局限,日趋全球化^②。艾伯特指出,沃尔芙等人否定父权制的存在实质上是维护现存的对女性的剥削压迫制度,以此否定女性变革社会的必要性^{[4](P179)}。

第二,对第二波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建构的宏观的认识论不是不能质疑,而是从什么角度以及怎么来质疑。艾伯特等人认为,帕格利亚等人把第二波女权主义建构的有关父权制的系统的宏观认识论指责为清教徒式的说教,实际上涉及要不要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继续建构对女性受性别压迫的深层的社会根源的认识论。她们认为,沃尔芙在这个议题上的理论框架基于当时西方风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述的思潮,特别是法国哲学家琼-弗朗斯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其《后现代主义条件》(The Postmodern Condition)(1979)一书中用差异、语言的不确定性和局部主义来质疑宏大叙述的一统性导致的集权主义。他有句名言:“让我们发动一场战争来反对一统化。”^{[5](P82)}

艾伯特认为,利奥塔提出这个反对宏大叙述的理论背景是1960~1970年代后殖民主义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深入人心,同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停滞。这些都激发了西方思想界重新从宏观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背景下,利奥塔质疑的宏大叙述指的是17世纪新兴资产阶级建构的推翻封建社会的启蒙主义的叙述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叙述。他认为这两大宏观叙述都已经丧失了可信性^{[5](P37)}。艾伯特指出,根据利奥塔的理论

论,1960年代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反体制的群众运动中表述的诠释各种压迫性等级制、具有解放意义的宏观认识论,比如第二波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的认识论、美国黑人对种族主义的认识论和世界各国殖民地人民对16世纪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的认识论都是没有理论根基的^{[4](P184)}。

为此,艾伯特等人特别强调建构对当代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力剥削和压迫妇女的系统、宏观的认识论的重要性。她们认为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氛围中,传统的父权社会机制及其意识形态逐步崩溃,父权制不得不以新的方式和意识形态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其在经济层面的一个主要的新策略是将社会性别自然化,以降低女性的劳动力的价格,为资本主义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父权制和全球资本主义新的联姻的后果是加剧了体制性的男女不平等和女性生活状况的恶化。在谈到印度的贩卖少女案时,艾伯特指出,“这些少女被买卖的根源在于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和财产关系”^{[4](P179)}。

美国少数民族女权主义学者凯瑞琳·索瑞斯欧(Carolyn Sorisio)列举了凯瑞琳·卡切(Carolyn L. Karcher)和弗兰西斯·福斯特(Frances S. Foster)等人对美国土著印第安妇女和黑人妇女受压迫和抗争的方式的研究,指出女权主义不仅不能放弃继续建构对父权制的宏观的认识,而且更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把妇女局部的、多元的生活现实与父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探索其内在的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关系,系统地建构对父权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宏观的认识论,以此为基础建构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解放政治^{[6][7][8]}。

二、重提性别的生理性、自然性,提出应重建女性气质

是父权社会解放了我,让我重做女人。——卡米拉·帕格利亚^{[2](P37)}

帕格利亚的这一言论代表了麦当娜女权主义在这个议题上的主要论点。她的著名的《性面具》(*Sexual Personae*)(1990年)一书充满了对男女差异的自然化的界定,以此维护父权制存在的合理性。她对男女差异的界定源于古希腊神话

中用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来界定的性别差异。即阿波罗神象征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代表光明、文化、艺术、秩序和理性认识。帕格利亚认为,男性是聪慧的,是美和秩序的创造者和捍卫者,男性创造了人类的文明。而狄奥尼索斯神象征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代表自然、原始、身体和大地崇拜,具有破坏性。她因此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男性为女性和儿童提供了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安全保障”^{[2](P6)}。受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她认为,男女有别是因为他们的大脑皮层不一样。人类的文明和进步是男女的自然性之间不断博弈的结果。她进一步指出,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极力解构这种男女有别的建构,导致了西方文明的崩溃。沃尔芙也与她呼应,认为女性缺乏侵犯性、暴力性。女性要解放,不应反对父权制,而应该更加女性化^{[3](P144)}。

艾伯特等人从3个层面质疑麦当娜女权主义重建男女气质的观点。她们首先着眼这些言论的历史背景,指出197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女性就业的高潮。到了1980年代初期,女性在教育 and 就业领域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据统计,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时期在大学中第一次女学生的人数超过男学生的人数;第一次50%以上的女性就业;美国人口普查部门第一次允许女性为户主^{[9](P67)}。

大多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学者认为这个突破虽然与第二波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有关,但是更与19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对美国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后对女性劳动力的新的需求有关^[8]。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男性工人的工资大幅度地下降。据统计,靠男性的工资养家的白人家庭中男性的工资减少了22%左右。靠男性养家的家庭几乎绝迹,只占8%^{[9](P65)}。

1991年美国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指出,1980年代以后,面对产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男女之间的矛盾,美国各种保守社会势力挑起男性对女权主义运动的恐惧,炒作了一场“男性气质的危机”。当时在任的里根总统率先为这次反弹推波助澜。他宣称,女性就业的增加导致了男性的大量失业^{[9](P67)}。一些

民意测验机构也纷纷通过相关的调查为这次反弹摇旗呐喊。1988年《绅士季刊》(Gentlemen's Quarterly)对3000男性的调查发现,只有1/4的男性真心地支持女性独立和平等的诉求,绝大多数男性认同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主流媒体大肆宣泄男性的一种失控的情绪:“现在女性的强大导致我们的独立性不仅在家庭中丧失,而且在公众生活中被践踏。”^{[9](P62)}同期好莱坞和出版界极力重塑凶悍的男性气质。宗教界更是掀起了一场“男性运动”,鼓励男性抵制女性化,激发内在的野蛮性。虽然帕格利亚常常自誉是当代最伟大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她公然宣称是这次反弹的一部分^{[4](P256)}。她认为:“现在没有任何发展男人气的空间。男性气质已成为只能在电影里模仿的东西了。”^[10]帕格利亚的这些言论受到了当时美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的赞许。右翼评论家肯尼·阿切提(Kenneth Atchity)等人把帕格利亚称为“知识分子中的贞德。”^[11]

在理论层面,艾伯特等人指出,1970年代以来女权主义一直强调把男女的性别差异自然化、本质化是历史上所有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女权主义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性别是社会建构的理论。帕格利亚等人在1990年代再次将男女性别差异自然化,是重拾女权主义已经颠覆了的父权意识形态的性别建构的牙慧,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是一种倒退、反动。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建构的这种本质主义的话语的核心是为男性的统治辩护,为基于男性气质的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辩护,目的是把女性重新推回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建构,即回到父权制的家庭中去当妻子和母亲。因此她将麦当娜女权主义称为“父权女权主义”(patriarchal feminism)、“复古女权主义”(retro-feminism)^{[4](P253, P257)}。这些女权主义强调这种父权女权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密切关系。沃尔芙承认资本主义存在压迫,但认为女性之间的阶级压迫是健康的,“是我们全面参与社会的结果”^{[3](P18)}。她还宣扬私有制对女性有利,认为有钱就“能把女性从深重的性别压迫中赎买出来”^{[3](P19)}。帕格利亚更是把资本主义赞美为“一

种艺术形式”,是阿波罗精神的创造,认为在当今世界上,剥削和压迫是自然存在的,不可避免的^{[2](P38)}。

法露迪以1980年代在美国财富500强中美容业内女工就业的遭遇为例来凸显帕格利亚等人认同的父权资本主义建构的女性气质对广大劳动妇女身心的危害。这些企业不仅乘重建男女气质之机生产各种新型的化妆用品,盈利大增,而且在这些企业内利用传统的女性气质阻止女性就业,对就业的女工进行百般的刁难。她特别提到了在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就业的贝蒂·瑞格斯(Betty Riggs)等女工的遭遇。该公司以美容产品含有有毒化学成分对女工的身体和生育能力有害为由,对瑞格斯等人提出要么绝育,要么回家的苛刻要求。为了生存,瑞格斯等人不得不选择绝育。即便如此,后来她们还时时面临被解雇的危险^{[9](P441-445)}。因此,艾伯特指出,帕格利亚等人所建构的女性气质帮助了全球资本主义从男女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和消费中获取暴利。她们有关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理论遮蔽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源分配上存在的性别的不平等,因此否定了广大劳动妇女提出解放和社会公正的正当性和必要性^{[4](P257)}。

三、宣扬身体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关键

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由于不射精,不把她们的体液抛出体外,女性是安详的、自我容纳的动物。因此,女性对自己的现状是满足的。女性不具备变革、革命所需的暴烈的侵犯性。——卡米拉·帕格利亚^{[2](P28)}

1990年代西方女权主义把有关身体的理论提高到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的高度。同样,身体理论也是麦当娜女权主义的核心问题。其上述对男女差异自然化的界定源于其对女性身体的生理性、动物性的认识,认为身体决定了女性的本质和主体性,决定了她们的命运。对帕格利亚来说,女性的身体指的是她们的性和生育的功能,尤其是女性的性激素、体液和身体的节奏等。在谈到她之所以认为男性创造了人类文明和进步

时,她指出,“男性小便呈抛物线状和射精时的勃起是所有文化发展和认识论深化的轨迹”,女性,“就像狗一样,是蹲着小便的”,因此她们用不着抽象思维就能生存^{[2](P17)}。

艾伯特等人对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身体理论的讨论有3个重要的层面。第一,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对女性身体的界定强调女性对身体的自然功能的体验,带有强烈的反理性思维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导致否定女性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的理性认知,即女性的主体意识的必要性。众所周知,女权主义有关身体的讨论历来是围绕着卡迪尔的头脑与身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论把男性界定为理性的;女性是身体的、感性的。第一、二波女权主义有关身体的理论虽然是多元的,但是都质疑这个二元对立,认为这个二元论是传统的性别等级制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艾伯特等人认为,对身体的界定是一种社会建构。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与文明、身体与理性的关系是辩证的,应该在具体的社会氛围中审视。帕格利亚等人的身体理论不仅不质疑这种二元对立,而且进一步深化这种二元对立。在女权主义多年来解构这种二元论之后,她们把女性身体的生理特征夸大到极致,目的是抹去女性劳动的全部历史,否定父权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女性生产力剥削的基础上的历史现实;同时,在女性的身体上重写父权制意识形态建构的宏大叙述,以此替代女权主义基于女性集体的对父权制资本主义的理性认知的解放理论^{[4](P270)}。

第二,这些学者认为,帕格利亚等人以男女小便姿势的差异决定男女差异的理论导致对身体的不可知性。在质疑帕格利亚等人的身体理论时,艾伯特特别强调概念对建构女性解放理论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概念是理论的重要基石,概念编织了理论之网。概念从来都是社会建构。艾伯特指出,有关身体的概念,不仅是哲学的、认识论的、认知性的,而且更是女性解放的历史图表。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初期的“提高觉悟”的“诉苦”活动的一个主要侧重就是解构父权制意识形态中

那些掩饰性别统治的概念,建构能够诠释女性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表述女性主体意识的概念。比如发明了“社会性别”“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等概念。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等人利用后现代主义有关语言涵义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将1990年代的父权意识形态对身体的建构嵌入主流女权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中,用以颠覆女权主义解放理论的有效性。比如在有关身体的概念中重新注入西方古代封建社会对男女身体的建构^{[4](P252-253)}。

艾伯特认为,在政治上,帕格利亚等人把性别等级制建立在女性的身体上,以此把女性受父权制的压迫归罪于女性本身。这种对身体的自然化的建构转移了女权主义对现实生活中父权资本主义对女性身体的暴力的视线。她强调,这些暴力不仅包括性暴力和战争对女性的杀戮,而且涵括与身体有密切关系的经济上的剥削,以及贫困、饥饿、童工、移民、贫民窟、贩卖妇女、危险的工作场合、没有充分的医疗保险,以及剥夺女性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尊严等^{[4](P271)}。据美国经济学家阿马塔·森(Amartya Sen)1990年代初的统计,世界上—百多万女性正在因这些暴力致死或失踪^[12]。

第三,这些学者质疑帕格利亚等人在阐述身体理论时所使用的修辞策略和逻辑。她们指出,修辞策略是理论的一个重要层面,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修辞逻辑有时对理论的传播起关键作用。艾伯特注意到,在阐述身体理论时,帕格利亚的修辞策略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采用肆无忌惮、极端的论点和逻辑来达到惊世骇俗的效果。在《性面具》一书开头帕格利亚就宣称,应该承认“性别的刻板形象中内含的真理”^{[2](Pxiii)}。她坦言,她就是要用“一种耸人听闻的形式”来表述她的言论^{[2](Pxiii)}。艾伯特认为,这种修辞策略内含强烈的极端性,多是带有煽动性的宣言,因此在理论上缺乏严肃性,旨在挑衅女权主义30多年来致力颠覆的父权意识形态建构的所有的神话、价值观念和民间语汇及其理论前提。她特别提到这种极端的逻辑与好莱坞电影《沉默的羔羊》(*Silence of the Lambs*)(1991年)中对女性身心极

端残暴的再表现手法吻合。比如影片中剥女人的皮的再表现方式。她指出,这种极端的艺术再现的危害是淡化了女性现实生活中遭遇的性暴力,使女性感到性暴力存在是自然的、常见的、不可避免的。她认为,这种修辞策略在政治上非常有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保守势力利用^{[4](P259-260)}。

帕格利亚等人的修辞策略的第二个特点是以调侃、诙谐的语气营造闹剧的效果。帕格利亚在讨论男女身体差异时多以“下半身”作为比对照,强调男女的动物性和生理需求的差异。这种修辞手法显得与众不同,好似给人以新鲜感、幽默感。艾伯特认为,为了修复女权主义对父权意识形态的重创,重新建构性别差异,父权资本主义特别注重再度把性别等级制自然化,以维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父权资本主义又不可能简单地、照搬不动地重拾过去的牙慧,因为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的有些层面在现实中已经失效了。这种调侃、打诨的修辞策略营造的闹剧的目的是帮助父权制重建的意识形态躲避严肃的理论辨疑。马克思有句名言,历史不断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13](P15)}。如果说,传统父权社会意识形态对身体自然化的建构导致女性的悲剧性的遭遇的话,那么在20世纪末重复这种建构,就很可能沦为人们嗤之以鼻的闹剧了。但是闹剧也是一种论证的方式。帕格利亚营造的闹剧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在人们对重谈熟悉的谬论的不以为然中,进一步诋毁女性的身体,引发男性的怀旧和失控情绪,发泄对女性的恐惧。因此,这类闹剧在当代的政治生活中是极其危险的。她总结道,帕格利亚的这两种修辞策略正在帮助当代父权资本主义有效地加剧生产中的性别分工和财富的不平等的分配^{[4](P259)}。

四、宣扬“性”决定女性的命运,“性”是赋权女性的最佳途径

麦当娜教导年轻女性在完全掌控自己生活的同时充分表现她们的女性气质和性感。——卡米拉·帕格利亚^[1]

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身体理论的一个重要落点是性理论。帕格利亚认为,“麦当娜对性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即)性的动物性和艺术

性。”^[1]麦当娜女权主义性化万物,也因此被称为“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sexual empowerment feminism)。这种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权力是生而具之,源于女性的身体,特别是性。因此,女性的权力是性化的权力。性是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源泉,性决定了她们命运的轨迹。

第一,艾伯特等人首先质疑这种“性决定论”。她们认为产生这些认识的背景是自1960年代避孕技术发明以后,人的性从生育的功能中剥离出来,性功能多元化。1980年代后期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进入一段繁荣时期,其意识形态和市场顺势将女性的身体和性进一步商业化、消费化,以赚取最大的利润。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1990年代美国右翼在大众文化中炒作有些女权主义“不要性别平等,要性高潮”的风尚,相当有效地把女权主义指责性暴力的舆论转变成性愉悦的话语。同期在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兴起之后出生的年轻一代在这种话语和消费文化中建构了新的诉求,认为性感是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最佳途径。同时,女权主义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特别是福柯的“性,可以用来解释一切”的理论,把性建构为一个重要的“权力点”,使性成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的新空间^{[14](P66-67)}。

艾伯特等人指出,这种性决定论首先有个阶级层面,即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属于中产阶级女性的思想范畴,表达她们通过性来抵制父权制的诉求。但是这种话语并不触及建立在性上的等级制及其依附的经济基础——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其次,这种以性赋权的女权主义无视大多数女性的性经历,无视父权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对女性的生产力和性的剥削和压迫上的现实。对广大劳动女性来说,她们的性的主要社会功用,一是生育新的劳动力,二是性服务。艾伯特认为,随着医学,特别是生育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深入女性的身体和性的空间。世界各国的贫困妇女为了生存,不仅出卖她们的廉价劳动力,而且其中很多人还不得不出卖她们的身体和性,比如卖淫,或为有生育困难的中产阶级夫妇代孕,出卖卵子和器官等^{[4](P271)}。

第二,联系帕格利亚对法国18世纪以性

虐待文学著称的马克·德·萨德(Marquis de Sade)的崇拜,艾伯特等人指出她推崇的性内含强烈的施虐倾向。帕格利亚认为性是“黑暗的、暴力的,是男性独有的特权。”^{[2](P55)}在谈到强奸这个议题时,她宣称,“强奸是一种自然进攻的形式”^{[2](P23)}。虽然性学界内对“性虐待”议题存在很多争议,但是德国生态女权主义者玛丽亚·密斯(Maria Mies)等人认为,帕格利亚的这些言论凸显了麦当娜女权主义以性赋权的理论的虚伪性。密斯强调,性暴力的实质不是性行为,而是利用性来表达权力的行为。应该把性暴力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性暴力是制度性的权力和高压统治的一部分,以达到对妇女的剩余劳动价值的“超级剥削。”^[15]

这些学者认为,帕格利亚等人性理论中的这个层面为1980年代后期美国加剧的性暴力推波助澜。法露迪特别提到1985年美国心理学学会呼应这股逆流,把性虐待界定为一种新的心理疾病,以淡化性暴力的犯罪性。在谈到1980年代中期男性运动的发起人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在美国各地巡回举办的、每次上千男性参加的讨论班时,她指出,这个以爱情和性为主题的讨论班的宗旨是为了赋权男性的权力,指导他们怎么控制女性的性,怎么用暴力赋权他们的性。比如在1987年的一次讨论班的奖品中有零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当有个学员抱怨,“当我们告诉女人们我们的性欲,她们不答应”时,布莱指示他们,“那就把这些手枪插到她们嘴里去”^{[9](P310)}。

艾伯特等人进一步指出,麦当娜女权主义推崇性暴力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1990年代以后美帝国主义为掠夺世界经济资源多次发动的战争宣传鸣锣开道。在谈到1991年美国发动的海湾战争时,沃尔芙只字不提这场战争杀害了20多万伊拉克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反而极力把美国女兵推崇为赋权女权主义的标杆,“女兵们挥舞着火力强大的武器的形象,……不仅能让人感到她们的爱和欲望,而且感到尊严,甚至恐惧”^{[3](P17)}。艾伯特等人指出,当代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强奸和其他性暴

力来征服对方。这特别反映在1992年的波黑战争中以有组织的强奸和性奴役来达到“种族灭绝”的目的。据联合国有关部门统计,约5万妇女在这场战争中被强奸^[16]。

第三,艾伯特等人质疑麦当娜女权主义的性决定论的第三个层面是其修辞策略的色情化。帕格利亚是色情的积极支持者,她认为,色情揭示了人类的性中“最黑暗,但是最深刻的真理”^[17]。她宣称,“我们的文化不允许女性成为女人。网上的色情业越来越成为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无性的文化中挖掘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最原始的能量’”^[9]。虽然美国各派女权主义对色情业至今还争论不休,但是艾伯特认为帕格利亚为低俗、淫秽的色情文化辩护的修辞策略与上述提到的以极端的逻辑和以调侃、诙谐以达到闹剧的效果的另外两种修辞策略相辅相成,导致“思想的色情化”^{[4](P264)}。她指出,在封建社会和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的性和有关性的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多被边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今天,过去被边缘化的事物失去了被边缘的缘由,有些被资本主义反过来为其统治所用。1990年代以来“性”爆炸性的转身就是一例。帕格利亚本人也认为,这种思想的色情化出现在1980年代后“政治和宗教对人的控制逐步式微的背景,等级制注入了性的空间”^{[2](P264)}。艾伯特认为,她建构的思想色情化有两个层面。一是利用人们对色情、绯闻的专注转移他们对父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系列的假设的思辨。同时以感官和性愉悦的话语来重写建立在私有制生产关系上的社会关系,颠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剥削的理论;二是把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色情化,用以为资本主义商业经济赢取暴利,掩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上特别是劳动力分工基础上的性别化的阶级等级制,为统治阶级实施剥削和暴力应负的责任开脱。她认为这个修辞策略非常有效,是父权资本主义后现代时期的意识形态区别于之前的历史上其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逻辑和修辞策略,导致当代资本主义引领的各种意识形态和认识论,其思维方式和

内容、语言表述的方式和修辞策略都不仅被性化了,而且被色情化了^[4](P263-264)。

五、结论

女人应该从人而不是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波伏瓦^[18](P267)

1990年代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10年。随着与“全球接轨”和经济改革的深化,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起来。同时,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开始逐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以上描述的这些麦当娜女权主义关注的议题或多或少地也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有所表现。且不说这一时期大众文化低俗化,色情文化开始泛滥,就文学领域来说,1990年代男性作家的“流氓文学”和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尤其是“下半身写作”更是刺目、火辣,引人注目。在妇女研究领域,乘1995年联合国北京妇女大会的东风,西方女权主义高举“社会性别”的大旗登陆中国。19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在探寻将“社会性别本土化”的道路上,突破了1980年代开启的“去解放”“重新社会性别化”的理论瓶颈,逐渐成为妇女研究的一个主要的思想脉络和思维方式^[19]。同期,女性主义行动主义空前活跃,开始了重点以身体、性和欲望来赋权女性的主体意识的新时期。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国的妇女研究是否正视1990年代遗留的这类议题,将决定今后理论研究的走向。

怎么审视这些重要的议题,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诠释。不难看出,艾伯特等人围绕麦当娜女权主义的讨论有3个重要视角: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审视这些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辨方式;注重研究这些涉及女性现状的社会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的等级制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建构扎根深受全球父权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各阶层妇女的生活现实和认知的妇女理论,不改女权主义解放所有妇女,解放全人类的初衷。这些是不是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解放理论应该坚守的视角呢?

注释:

- ① 对这支女权主义有很多种想法。如本文后来提到的“父权女权主义”“复古女权主义”“性赋权女权主

义”等。中国的搜狗网称之为“反女权主义”。“麦当娜女权主义”是笔者给这支女权主义的命名,这一命名基于这类女权主义对麦当娜的崇拜。帕格利亚本人就宣称她是学术界的麦当娜。

- ② 在中国妇女研究中,性别等级制一般被称为男权制,但是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中普遍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因为其词源指建立在以父亲为家庭的家长的社会制度上。

参考文献:

- [1] Camille Paglia. *Madonna - Finally, a Real Feminist* [N]. *New York Times*, 1990-12-14 (28).
- [2] Camille Paglia. *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ens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 Naomi Wolf. *Fire with Fire: The New Female Power and How It Will Chang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 [4] Teresa L. Ebert. *Ludic Feminism and After: Postmodernism, Desire and Labor in Late Capitalism* [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 [5]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 Geoff Bennington, Brian Massumi,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6] Carolyn Sorisio. *A Tale of Two Feminisms: Power and Victimization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 [A]. Leslie Heywood, Jennifer Drake. *Third Wave Agenda: Being Feminist, Doing Feminism* [C].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143.
- [7] Carolyn L. Karcher. *The First Woman in the Republic: A Cultural Biography of Lydia Maria Child* [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 France Smith Foster. *Written by Herself: Literary Production by African American Women, 1746 ~ 1892*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9] Susan Faludi.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M].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INC, 1991.
- [10] Bari Weiss. *Camille Paglia: A Feminist Defense of Masculine Virtues*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0, 2013.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97604579240022857012920> Retro-fem.
- [11] Francesca Stanfill. *Women Warrior* [EB/OL]. New

- York Magazine, March 4, 1991. <http://francescastanfill.squarespace.com/warrior-woman-new-york-march>.
- [12] Nicholas D. Kristof. *Stark Data on Women: 100 Million Are Missing* [N]. New York Times, 1991 - 11 - 05.
- [13] Karl Marx.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1963. 15.
- [14] 福柯. 性史 [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67 - 77.
- [15] Maria Mies. *Patriarchy and Accumulation on the World Scale: Wome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M]. London: Zed Books, 1986.
- [16] *Rape During the Bosnian War* [EB/OL]. http://www.wikipedia.org/wiki/Rape_during_the_Bosnian_War.
- [17] Tracy Clark - Flory. *Interview with Camille Paglia* [EB/OL]. http://www.salon.com/2013/08/21/camille_paglia, 2013 - 08 - 21.
- [18] 波伏瓦. 给女人讨个说法 [M]. 牧原, 译.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5. 267.
- [19] 柏棣. 性别政治: 谈“社会性别”概念的不确定性 [J].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2013, (5): 1 - 6.

Madonna Feminism: A Dangerous Brand in American Third - wave Feminism

SU Hong-jun

(Iowa City 52245,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bstract: From a socio -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1990s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decades in American history. A new brand of feminism which regarded Madonna as their champion caught the American public, media and academia by surprise. Despite differences, the feminists who identified with this brand of feminism shared four major views. Firstly, they charged Second - wave Feminism to be victim feminism; secondly, they re-essentialize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advocated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femininity; thirdly, they grounded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female body; fourthly, they argued that sexuality was the best means to empowerment. This article is a survey of the critiques by American Marxist feminist Teresa Ebert and the others who were critical of the neoliberal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on major issues, arguments, rhetorical logics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the two prominent scholars of this brand of feminism, Naomi Wolf and Camille Paglia. This article calls for new reflection on the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in the 1990s and beyond.

Key words: Madonna Feminism; victim feminism; femininity; body; sexual - empowered feminism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专题研究·

从性别视角看'95世妇会以来 中国妇女反贫困事业进展

姜秀花,倪婷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摘要: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筹备和召开,促使社会性别视角逐渐被引入中国妇女反贫困事业,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消除贫困中实现性别平等,制定和实施有利于消除妇女贫困的战略规划和妇女减贫政策,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妇女减贫活动,妇女贫困问题明显缓解,中国妇女反贫困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但问题和挑战依然存在,特别是将社会性别纳入反贫困的决策主流仍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关键词:反贫困;社会性别;妇女贫困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16-07

一、贫困问题性别视角的引入

贫困是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问题,由于社会性别制度等结构性原因,女性比男性更易陷入贫困,贫困程度更加严重且不易摆脱贫困,减少和消除妇女贫困成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美国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就在研究美国贫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贫困女性化”的概念,性别敏感的研究者开始对“贫困女性化”倾注了较多的关注^{[1][2]}。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分析,特别是对于贫困妇女的关注成为扶贫研究的重要取向^{[3](1995)}。1995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贫困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妇女占70%,贫困有一张显著的女性面孔^①。如果不将

消除性别歧视和反贫困相联系,消除人类贫困将面临巨大障碍。

减缓贫困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努力方向。从1985年起我国开始正式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地开展扶贫活动。1986年,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作为国家专门的反贫困机构,统一规划和指挥全国的农村反贫困工作,实行以促进贫困人口集中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来实现减缓贫困发生和消除贫困现象的战略。通过持续的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减贫计划,农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到1993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80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至8.7%^②。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贫困妇女同步脱贫。但在

收稿日期:2014-12-03

基金项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重点课题“中国妇女运动百年简史”

作者简介:姜秀花(1963-),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妇女历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妇女健康/生殖健康、性别文化与妇女发展研究;倪婷(1979-),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妇女历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妇女运动史、社会性别与教育研究。

8000万贫困人口中,妇女仍约占60%^[4]。可以说,从1985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的区域开发式、造血式扶贫活动并没有足够关注农户,也没有考虑到贫困中的性别问题,并不具备性别意识^[2]。

与1980年代国家扶贫工作的开展相呼应,贫困问题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但在中国早期的贫困问题研究中,贫困人口被假设为是家庭均质或社区均质的人口群体,贫困的性别差异被忽略^[2]。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的扶贫规划开始注意引入参与式方法,以满足贫困人口的不同需要,妇女成为参与式扶贫的重要的行为主体,小额信贷扶贫成为促进妇女参与扶贫的重要方式,妇女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被关注。与此同时,国外关于“贫困的多元性”^[2]的研究也逐渐影响到中国学界,学者关于贫困的界定也从仅限经济层面转向经济社会层面,对贫困概念认识的扩展加深了对有利于贫困人口脱贫的体制在消除人类贫困中作用的认识,为反贫困事业中性别视角的纳入提供了契机。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世妇会《行动纲领》的制定,对中国妇女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产生重大影响,妇女贫困问题以及贫困研究中的性别分析引起各方关注。

'95世妇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贫困问题放在关切领域的首位,指出:“当今世界上10亿多人生活于无法接受的贫穷状况之下,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多数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趋势是妇女更加贫穷,而贫穷的程度因区域而异”,进一步明确了全球贫困中贫困女性化以及女性贫困化的性别特质。而造成女性较之男性更加贫困的主要根源在于妇女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中的弱势和自身能力开发的不平衡。除经济因素外,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力方面的差异、刻板的社会性别角色定位、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性别观点未充分纳入经济政策主流、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充分考虑到生活于贫穷之中的妇女的具体情况,都构成了造成妇女较之男性更为贫困的结构性原因。消除妇女贫困的战略政策包括:赋予妇女权力,将性别观点

纳入经济政策制定各方面,确保妇女有平等权利和机会获得经济资源,等等。

《行动纲领》充分整合了国际社会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妇女贫困问题的认识,揭示了妇女贫困的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以及妇女多元贫困的现实,提出赋权妇女的策略主张,对于中国政府和学界重新认识中国贫困问题和妇女贫困问题意义非凡。中国对执行北京世妇会《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作出积极承诺:在“所有的政策和方案之中体现性别观点”,成为首先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国家之一。

199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新的关于贫困的概念——人文贫困,引入了人类贫困指数(HPI),分别由预期寿命在40岁以下人口比重、成人文盲比重、拥有医疗服务的人口比重、拥有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重、5岁以下营养不良的人口比重5个指标综合而成。同时,该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推进社会性别平等应成为所有国家根除人类贫困的战略之一。中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贫困学界逐渐吸纳北京世妇会《行动纲领》以及国际社会有关贫困及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理论,致力于在消除贫困中实现性别平等,特别关注妇女等特殊贫困群体,催生了新的综合的妇女反贫困战略,从单纯地消除收入贫困转向以提高贫困妇女发展能力为核心,更加关注导致女性贫困的基础性和制度性原因,制订和实施消除妇女贫困的战略与规划,制订有利于妇女减贫和发展的各种政策。同时,政府和企业、各类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妇女的多元贫困,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支持妇女减贫的活动,采取促进贫困妇女就业、改善贫困妇女的教育和卫生服务、促进妇女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等综合减贫措施,妇女贫困问题明显缓解,中国妇女与反贫困事业取得显著进展,为促进中国贫困妇女参与社会发展和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性别视角下中国妇女反贫困事业的进展

(一)制订书机有利于消除妇女贫困的倾斜政策

'95世妇会以来,中国政府扶贫开发政策中

越来越多地关注妇女参与扶贫并从反贫困中受益。《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鼓励妇女参与脱贫的政策与措施,并把全国妇联开展的“巾帼扶贫行动”纳入国家总体扶贫计划。要求妇联组织“动员贫困地区妇女积极参与‘双学双比’竞赛活动,兴办家庭副业,发展庭园经济;也要办一些劳动密集型和适合妇女特点的扶贫项目;组织妇女学习实用技术,提高脱贫致富的能力;配合教育部门扫除文盲;配合劳动部门组织妇女的劳务输出。”消除妇女贫困问题开始成为国家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贫困妇女与贫困残疾人等成为反贫困政策的重点人群,鼓励实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以消除贫困妇女发展的障碍,从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发展能力、劳务输出,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综合性妇女脱贫政策体系初具雏形。1995年,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促进妇女发展的国家级行动纲领,提出了缓解妇女贫困程度、减少贫困妇女数量的主要目标,要求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加大对贫困妇女的扶持力度,使贫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由此推动了一些决策部门也开始关注性别问题。1996年召开的全国扶贫会议提出的贷款重点面向贫困农户,推动扶贫到户和扶贫到村,使得贫困资源更加直接面向贫困人群,这一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政策中的引入,为赋权妇女及在消除贫困中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前提和契机。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反贫困政策措施中进一步关注到妇女贫困,将性别指标作为农村贫困监测的一项工作内容,并将减缓妇女贫困作为反贫困的目标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从2001年开始,国务院扶贫办针对全国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采用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的扶贫途径,并强调在其过程中关注性别平等。2003年国家统计局的《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把性别平等列入扶贫项目影响评估的一个方面,并开始发展分性别指标^③;2004年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中国政府发表缓解和消除贫困的政策声明,强调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积极支持贫

困妇女参与实施扶贫项目,妇女参与人数占所有参与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④。2006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2010年)》明确提出,要“实施妇女发展纲要,保障妇女平等获得就学、就业、社会保障、婚姻财产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加强妇女卫生保健、扶贫减贫、劳动保护、法律援助等工作”。2009年3月,农业部和全国妇联联合制订了《百万新型女农民培训计划》,要求农业部门积极支持妇联对广大妇女开展生产技能培训、转移就业培训等,增强妇女脱贫致富的能力,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计划培训中确立了女性占培训人员40%的目标。2009年7月,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全国妇联等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 推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经办小额担保贷款的金融机构要向符合条件的城镇和农村妇女发放微利项目的小额担保贷款,并由中央财政据实全额贴息^⑤。2009年,在中国第一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中国政府作出庄严承诺:“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尽快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问题,并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实现脱贫致富”,将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公民基本生活水准权,切实保障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2011年,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国家扶贫标准,扶贫标准较2009年提高92%,扶贫政策覆盖人群扩大到1.22亿人口^[5]。这标志着中国扶贫事业进入对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开发扶贫与救助扶贫相结合的新阶段,扶贫重点从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转到提高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来。

中国政府将妇女作为脱贫扶持的优先对象,把对妇女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2011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1~2015年)》明确提出:“促进妇女全面发展……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能力。加强妇女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卫生保健、扶贫减贫及法律援助等工作。”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中,将农村贫困妇女作为重点群体,要求

把对农村妇女的扶贫开发纳入规划,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加大支持力度。201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扶贫开发过程中要关注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加大支持力度。组织实施《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将“加大对农村及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妇女发展的支持力度……缩小城乡区域妇女在人均收入水平、生活质量、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将“妇女贫困程度明显降低”作为主要目标。这些政策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妇女参与经济活动和获得公共服务的机会,对缓解或消除妇女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对贫困认识的深化,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贫困往往与机会和权利的被剥夺以及由此引发的能力脆弱性密切相关,因此,扶贫应当注重增长权力。与以往单方面强调动员妇女参与经济发展的扶贫策略相比,1995年以来在扶贫中开始关注妇女权益,如2003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并对解决出嫁女、离婚和丧偶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明确规定,这些保护妇女土地权益的条款,有利于遏制妇女由于土地资源的丧失而造成的贫困^③。

(二)通过积极的行动干预减少和消除妇女的多元贫困

为帮助占贫困人口中近半的女性脱贫,在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支持下,国务院、财政部、农业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主要政府部门采取措施,面向贫困农村妇女开展科学文化素质、农业科技、创业、劳动力转移就业等多种培训;鼓励、支持以妇女为主的扶贫经济实体的发展;小额信贷项目中向同等条件下的贫困妇女倾斜;优先向农村妇女发放“贫困村互助资金”;在整村推进工作中鼓励妇女积极参与;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高其生活质量;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中设立适合妇女就业的培训课程,鼓励组织妇女劳务输出;扶贫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致力于扫除女性文盲;改善贫困地区妇女的健康状况,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两癌”检查等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多部委共同参与“改善中国最弱勢妇女和儿童群体的营养食品安全和食品保障状况”项目;加大对贫困留守妇女、“两癌”患病贫困妇女等人群的扶持救助力度等。民政部积极推动贫困妇女社会救助政策的落实,着力提高妇女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截至2012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中女性868.1万人,占40.7%;农村低保对象中女性1732.7万人,占33%^[6]。2009年,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实施妇女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1800多亿元,中央及地方落实财政贴息资金共计120多亿元,获贷妇女达360多万人次^[7]。妇女小额贷款担保项目使贫困妇女成为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有效地促进了城乡妇女的创业就业。在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和救助方面,2009年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项目实施,截至2013年底,已累计为2231万农村妇女进行了宫颈癌免费检查,对310万农村妇女进行了乳腺癌检查^[8]。为解决在项目实施中出现的患病贫困妇女的治疗难题,2011年,财政部实施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项目,每年拨付5000万元救助患有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贫困妇女^⑥,2013年,救助资金增长至1万亿元^[9],到2014年,20715名低收入家庭中的妇女和因病返贫的妇女接受救助^[10],有效缓解了妇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的发生。

这些政策措施均关注到了妇女多元贫困的现实,为贫困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并获得各种社会福利提供了有力支持,有效缓解了妇女贫困程度,减少了贫困妇女的数量。

(三)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积极赋权妇女

在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倡导下,非政府组织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注重从赋权的角度提高贫困妇女战胜贫困的自我发展能力。各级妇联组织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开展以小额信贷、科技扶贫、连环脱贫、劳务输出、拉手结对以及东西互助等为主要内容的“巾帼扶贫行动”^④。1999年,全国妇联和国务院扶贫办、农业部、科技部等共同推出的“巾帼科技致富工程”,以提高农村妇女文化科技素质为重点,建立科技培训、科技服务、科技示

范三大网络,把为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的服务提高到新水平;全国妇联和农业部联合制定“十五”期间“千万农家女百项新技术”推广培训计划,提出了推广重点农业技术、每年培训 500 万农村妇女的目标;在中国政府 2001 年以来开展整村推进扶贫战略中,全国妇联积极开展“巾帼示范村建设”,通过实施“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创建”“巾帼绿色家园行动”等,统筹资金、技术集中投入,重点扶持贫困地区妇女发展特色优势产业,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和妇女经济合作组织等方式,走产业化、组织化扶贫的道路。2009 年至 2013 年,全国各级妇联组织创建“巾帼示范基地”466 个,各类“妇”字号基地 20 多万个,新建全国“三八绿色工程”项目示范基地 187 个,县以上示范基地 1 万个^[8];各级妇联加大对贫困妇女的培训力度,组织妇女参与“阳光工程”、现代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等培训项目,实施“双学双比”“百万新型女农民培养计划”“雨露计划·腾飞工程——中西部地区万名应用人才助学行动”“‘5123’培训计划”“农村妇女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农村妇女培训计划,向贫困妇女开展农业科技培训、转移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应用人才培养,增强贫困妇女反贫困能力,增加其就业发展机会。2009 至 2013 年各级妇联组织在全国共培训女农民 500 万人、创业妇女 100 万人、女经纪人 20 万人^[8]。

此外,全国妇联等组织还特别关注贫困妇女中的特殊群体,重点推动解决贫困留守妇女儿童、残疾贫困妇女、特困单亲母亲、“两癌”患病贫困妇女以及艾滋病患病贫困妇女等特殊人群的困难。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以西部贫困地区妇女为主要对象,先后实施以单亲困难母亲为对象的“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以贫困妇女为主要对象的“母亲小额循环”项目、以贫困母亲及家庭为主要对象的“母亲邮包”项目、改善贫困地区妇女基本生活条件的“母亲水窖”工程、帮助贫困母亲脱贫致富的“幸福工程”、改善农村单亲贫困母亲居住状况的“母亲安居工程”、提高贫困边远地区妇女健康水平的“母亲健康快车”项目、“母

爱复明扶贫工程”“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专项基金”等公益慈善项目。包括妇联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努力,为贫困妇女脱贫致富提供了动力,并为改善贫困地区妇女基本生存环境、促进贫困妇女就业、提高贫困妇女健康水平等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妇女反贫困事业发展的成就与挑战

(一) 妇女反贫困事业成就显著

1. 女性贫困人口显著下降。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贫困妇女扶贫开发有效地降低了妇女贫困率。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国家扶贫重点县女性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显著下降,由 2002 年的 24.2% 下降到 2010 年的 9.8%。贫困程度的性别差距逐年缩小,2002 年,在国家扶贫重点县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女性的贫困发生率比男性高 0.7 个百分点,到 2010 年,女性人口贫困发生率比男性高 0.4 个百分点,为 9.8%,较 2009 年下降了 2.2%^⑦。根据联合国与中国政府联合发布的《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报告(2013 年)》,截至 2012 年,与贫困有直接关系的性别敏感性指标中,贫困人口减少一半、饥饿人口减少一半、男女儿童普及初等教育、消除中小学教育的两性差距、降低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2/3、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环境人口比例降低一半等指标已提前实现,到 2015 年让所有人包括妇女实现充分的生产性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到 2020 年使至少 1 亿贫困人口居住条件等各项指标的国家支持环境良好。

2. 妇女的福利得到改善,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高。随着对妇女贫困概念理解的扩展和性别意识的深入,一些关注妇女发展的扶贫措施有效促进了妇女的发展,贫困妇女的收入得到提高,贫困妇女的健康、教育等社会福利得到改善,妇女的人格和尊严得到更多的尊重,不同贫困妇女群体的性别需求得到一定的关注和满足,妇女的自我组织和发展能力明显提高,妇女的政治参与能力得到加强。例如西藏白郎县有关综合农村发展项目中引进的太阳灶的性别影响研究发现,太阳灶的使用减轻了贫困妇女劳动强度,并改善了妇女的生活卫生与环境,还增强了妇女之间的交流、自尊心等^[11]。针对四川凉山 10 户贫困妇

女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项目,使农民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自我组织以及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2]。国内开展小额信贷项目比较成功的UNDP四川仪陇项目中鼓励农村贫困妇女参与项目,妇女参与率高达90%左右。小额信贷不仅成功地帮助贫困妇女提高了经济收入,而且全面促进了妇女的发展^[2]。作为扶贫创新模式的村的发展规划,在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中,通过文献选择、相关人群讨论、最终由贫困农民确定的过程,选择出八大指标识别贫困村,女性长期患病率和中小学女生辍学率被列为指标^[13],体现了对“贫困是福利的缺失与不足”^[1]的认识,有利于综合治理妇女贫困问题。

(二)推进扶贫政策性别主流化将是妇女反贫困事业长期面临的挑战

虽然《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强调贫困妇女应是扶贫资源的获得者和扶贫成果的直接受益者,一些决策部门也开始关注性别问题,但是大部分发展政策没有充分考虑社会性别。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出台的若干个有关“三农”问题的1号文件及相关政策措施,普遍缺乏对社会性别议题的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在家庭基础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没有得到充分关注,难以满足贫困妇女个体的需求;农村扶贫开发规划虽然将妇女纳入了重点群体,但是在目标任务、扶贫措施等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对贫困妇女群体的特殊关照;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妇女贫困群体——农村留守妇女、流动妇女、失业妇女等群体的贫困问题,仍缺乏有针对性的专门措施;在政府贫困监测和扶贫评估体系中,缺乏系统的性别指标,难以全面把握妇女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的原因、扶贫政策及项目对贫困妇女的效果和作用等,不利于扶贫政策的修订和完善;扶贫项目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社会性别盲点,在一些地区,妇女尚未作为主体和决策者参与扶贫,贫困妇女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较少,缺乏决策权;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意识仍不利于贫困女性和男性获得公平的扶贫资源和社会公共服务机会,阻碍了妇女反贫困进程,影响了扶贫效果;妇女

的土地权益及相关经济权益依然受到传统观念挑战;妇女组织在妇女扶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扶贫项目管理中常常作为配角,对扶贫资金、项目和技术的决策和管理不够充分,等等。

四、结语

妇女贫困和贫困风险的性别差异与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性根源造成的“易受损害性”和社会排斥密切相关,妇女贫困不仅包括收入贫困,也包括因接受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不足造成的能力贫困、教育贫困,福利和保障不足造成的福祉贫困,妇女公共参与机会匮乏造成的政治权利的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和文化的贫困,休闲不足造成的时间贫困,等等^⑧。只有对妇女贫困问题的产生机制和贫困表现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在制定政策中体现更多的性别敏感性;在项目实施中切实关注妇女群体的性别利益和性别需求,减少因资源、机会、权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所造成的结构性贫困问题;关注妇女的各项权益,消除妇女多元贫困,改善妇女的社会福利;持续地对扶贫开发政策和扶贫项目进行性别评估,关注妇女的受益情况,自觉调整不利于妇女反贫困的政策和措施;注重赋权妇女,重视她们的经验,不断创新扶贫机制和模式,提高贫困妇女在减贫活动中的参与程度,提高她们的自信心、创造力和能动性;支持和鼓励妇联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参与扶贫项目和计划,更好地为贫困对象提供服务,在妇女减贫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鼓励贫困研究与扶贫实践的对接和相生相长。如此,才有可能在扶贫实践中将性别平等目标实质性地制度化,并构成一个多维贫困的研究路径和一个整合性的妇女反贫困的图式。

注释:

- ① 参见 UNDP 的《Human Development Report》,1995 年。
- 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年。
- ③ 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的《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对中国政府执行〈行动纲领〉和〈成果文件〉的评估报告——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紫皮

- 书》,2005年8月24日。
- ④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2005年8月24日。
- ⑤ 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研究会的《“北京+15”中国非政府妇女组织报告》,2009年9月。
-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2年第5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2012年0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3年第5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
- ⑦ 参见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的《2011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
- ⑧ 参见金一虹的《妇女与贫困研究综述(2006~2010年)》,出自肖扬、姜秀花主编的《中国妇女研究年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中)。
- [5]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人民日报,2012-02-23.
- [6]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认真履行成员单位职责 扎实落实两纲——民政部、人社部、农业部、卫生部贯彻落实两纲情况简介[J].中国妇运,2013,(4):23-27.
- [7] 黄小希.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1800多亿元[N].中国妇女报,2014-05-17.
- [8] 宋秀岩.在妇女儿童五项活动领导(协调)小组联席会议上的工作通报[J].中国妇运,2014,(2):7-13.
- [9]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2014年第63号[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http://zhs.mof.gov.cn/zhuantilanmu/caipiaoguanli/201408/t20140829_1133302.html,2014-08-28.
- [10] 彩票公益助力“两癌”救助项目[N].南方日报,2014-09-05.
- [11] 张雪梅,王莉,余璐,许荣霞.太阳灶对贫困妇女生活质量的改善——西藏白朗县的实证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5,(4):27-31.
- [12] 马林英.性别与发展的实践——分享“参与功能性脱盲脱贫的试点”项目经验[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40-43.
- [13] 李小云,李周,等.参与式贫困指数的开发与验证[J].中国农村经济,2005,(5):39-46.

参考文献:

- [1] 张雪梅,李晶,李小云.妇女贫困:从农村到城乡,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2000年以来中国“妇女贫困”研究评述与展望[J].妇女研究论丛,2011,(5):99-105.
- [2] 刘晓昀,李小云,叶敬忠.性别视角下的贫困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4,(10):13-18.
- [3] 林志斌.妇女与反贫困研究综述[A].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6~2000[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4.95.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J].中国妇运,1994,(12):3-12.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poverty Movement of Chinese Women since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JIANG Xiu-hua, NI Ting

(Women'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he 4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y on the anti-poverty movement of Chinese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devote themselves to realizing social equality while eliminating poverty, which also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policies to wipe out poverty among Chinese women as well as develop lots of targeted activities to support the anti-poverty movement among Chinese women. The issue on poverty among women has been solved gradually. Meanwhile, the anti-poverty movement of Chinese women has developed a lo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lenty of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is to take social gender a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the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ti-poverty movement of Chinese women. There must be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 anti-poverty; social gender; issue on poverty among women

·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20 周年专题研究 ·

男性参与的意义、现状与推动策略

方刚

(北京林业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 '95 世妇会强调了男性参与的重要性,但 20 年来男性参与在中国仍然做得很不够。男性参与的概念在 1994 年第一次被正式提出,此后不断受到重视,男性参与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是实现性别平等的重要力量。中国男性参与的理论与实践刚刚起步,需要加强。推动中国的男性参与,应该加强男性参与的理论研究,落实男性参与的现状与经验研究,并且在法律与公共政策、学校教育、大众传播、社会服务等领域制定和落实推动男性参与的具体策略,这些是弘扬'95 世妇会精神所必需的。

关键词: 男女平等;男性参与;男性气质;推动策略;'95 世妇会;《北京宣言》

中图分类号: C913.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5)01-0023-05

'95 世妇会的《北京宣言》中曾强调了男性参与对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意义。20 年过去了,中国促进性别平等的努力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笔者认为,未能充分唤起男性参与,是阻碍性别平等充分实现的原因之一。

在'95 世妇会召开 20 周年之际,再次明确男性参与的意义,思考男性参与的策略,无疑会对弘扬'95 世妇会精神,推进未来中国的社会性别平等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一、男性参与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

1994 年,“男性参与”的概念在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首次被正式提出,此次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专门对男性参与生殖健康做了论述:“应做出特别努力,强调男子应分担职责,促使他们积极参与负责任的生育、性和生殖行为,包括计划生育、产前和妇幼保健;防止性传播疾病包

括生殖道感染;防止非意愿妊娠和高危妊娠;共同管理和创造家庭收入,共同致力于子女的教育、健康和营养;确认和促进男女儿的平等价值;防止对妇女的暴力。”

1995 年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男性参与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北京宣言》第 25 条明确呼吁:“鼓励男子充分参加所有致力于平等的行动”。

'95 世妇会之后,男性参与推进性别平等的意义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2004 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 48 届会议呼吁政府、联合国组织、公民社会从不同层面及不同领域,包括教育、健康服务、培训、媒体及工作场所,推广行动,以提升男人和男孩为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作出贡献。

2005 年 8 月 31 日通过的《北京 + 10 宣言》第 25 条也写道:“关注男性的社会性别属性,承认其在男女平等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承认其态

收稿日期:2014-12-25

基金项目:联合国人口基金“男性反对性别暴力促进项目”(项目编号:CHN7U511)

作者简介:方刚(1968-),男,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性与性别研究。

度、能力对实现性别平等至关重要,鼓励并支持他们充分平等参与推进性别平等的各项活动。”

2009年第53届会议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进一步呼吁男女平等地分担责任,尤其是照护者的责任,以实现普遍可及的社会性别平等。

同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成立了“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凸显了对男性参与社会性别平等运动的重视。

2014年,联合国发起“HeForShe”运动,致力于倡导男性参与;同年11月,第二届全球男性参与大会在印度德里召开,这是继5年前里约会议之后,世界范围的又一次更高级别的男性参与大会,会议呼吁男人和男孩致力于终止性别暴力,促进性别平等。

二、男性参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男人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中。长期以来的父权文化建构了不平等的性别制度,男性更多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男性责无旁贷,有责任从自己做起,投身于两性平等和公正的事业。

事实上,男性参与具有必要性。男人就在那里,你没办法回避他们,他们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存在于家庭中。反对性别暴力、促进性别平等的任何一项工作,都不可能无视他们;离开人类社会中一半的成员谈性别平等,不可能成功。’95世妇会后,中国20年的追求性别平等的努力,一直都是女性在推动,很少见到男性的身影,无疑影响了许多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进与落实。

男性参与还具有可能性。男性并不是铁板一块,男性气质是多样的,每个男人的生命史都不同,他们对性别差异的态度也不同,男性主流仍然是向往平等和谐的亲密关系的。男人也有权利和使命参与到反对性别暴力、促进性别平等的工作中,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男性参与使用的是男人手中的权力。男人控制着体制中的权力,必须借助这种权力,使之转化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力量。如果有一个男性的领导人,男性的意见领袖甚至宗教领袖,在呼吁和致力于性别平等,必将影响到更多的人,特别是男人。这远比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单方面

的努力要更有效。男性参与性别平等的推进,更有助于体制的改变。

男性参与从改造个人做起,到改变体制和社会。男人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当男性参与运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力量时,社会就会发生改变。男性参与本身就是改造男性的榜样行为,当一个个男性成为促进性别平等的活跃分子时,男性参与的社会号召力便会呈现出来。

三、中国男性参与的现状

相比聚焦于女性的研究,目前中国针对“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研究与行动起步很晚,非常缺乏,而且存在许多争议。也正是在争论与思考的基础上,男性参与的重要性、定位,以及策略,变得日益受关注。2007年之后,一些较成熟的有关男性参与的论文开始发表,男性参与研究受到正视。

在男性参与的理论研究方面,笔者提出从改造男性气质视角推进男性参与。当男性气质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处于变动中时,改造非支配性男性气质,促进男性参与成为可能^[1]。

促进男性参与的一些具体研究,也有少量发表,比如:讨论如何通过男性研究在教育领域的介入推动性别平等教育的深入发展^[2],如何通过影响男性气质促进参与型父亲的形成^[3];应该通过公共政策促进男性参与^[4];反对家庭暴力立法中应该具备的男性气质视角^[5],等等。2011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进行了中国首次男性气质与性别平等的大型定量调查。

在推进男性参与的公共政策与社会行动方面,中共中央党校李慧英教授多年来积极推进“男性待产假”政策;2002年,北京“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志愿小组成立;2005年,“男性解放学术沙龙”成立,倡导男性参与;2010年,“白丝带反对性别暴力男性公益热线”开通;2012年,有学者组织“男性反对性别暴力承诺活动”。笔者亦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邀,于2012年成为他亲自领导的“联合起来制止针对妇女暴力运动男性领导人网络”成员,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该网络成员,使命便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男性参与,特别是在反对性别暴力领域的行动;同年底,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宣布成立,自我定义为全球

性的男性参与运动“白丝带运动”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中国男性参与研究和行动已经萌芽。但是,从事男性参与研究的学者非常少,虽然已经有一些零散的有关如何推进男性参与的研究,但尚缺少全面系统的论述。许多重视并希望推动男性参与的人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如何在制度与实践等层面推动与落实男性参与。

四、推动男性参与的策略

联合国及国际社会已经将“男性参与”视为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的重要策略,‘95世妇会20年的经验也显示,需要我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高度重视男性参与。基于当前中国男性参与研究与行动的现状,笔者在此提出从理论到实务推动男性参与的策略,希望对男性参与的进一步落实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一)加强男性参与的理论研究

社会性别理论和男性气质理论,将为推进男性参与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持。

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论述,认为父权制是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基础。男性在父权制中扮演什么角色,男性是否可以参与到反对父权制的运动中来,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男性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男性既是父权文化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这决定了男性参与的必要性;男性在追求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自身的解放,这决定了男性参与的可能性^[6]。

男性气质研究同样为男性参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男性气质是支配的、阳刚的、主宰的,在这样的男性气质之下,男性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有学者揭示了此前所定义的单一的男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支配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男性气质(Kessler, S. J., D. J. Ashenden, R. W. Connell, G. W. Dowsett, 1982)。非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是推动男性参与、促进性别平等的基础。

长期以来,许多女权主义活动家以道德倡导、女权理论来呼吁男性觉悟,促进男性参与。这没有错,但效果未必好。我们的主张是:要从男性自身的需求唤起男性参与的意愿,反思支配

性男性气质对男人的伤害;让男人知道,他参与推进性别平等,不只是为了女人和孩子,他自己也会从中受益。

男性气质理论可以用来研究男性参与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具体推进、操作策略。可惜目前这样的研究还非常缺少,对2006~2012年中国知网的文献进行检索,讨论男性气质与男性参与关系的论文,只有六七篇。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格外加强。

(二)进行男性参与的状况与经验研究

在推进中国男性参与的过程中,一定要汲取国际社会男性参与成功的经验,总结国内男性参与不足的原因,对现状进行分析,从而为男性参与具体策略的提出做准备。

瑞典是男性参与最受推崇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执政起,瑞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公共政策,推动男性参与,同时配合着大量的舆论宣传、民间倡导、社会服务,从而使得男性参与的政策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相结合。瑞典的成功经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汲取,并且有了各自的发展。瑞典的经验是中国推进男性参与时必须进行认真学习的。

2014年第二届全球男性参与大会上,许多国家都展示了本国的男性参与经验与成果,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未来推进男性参与的借鉴。

在加拿大,“白丝带运动”为全球的男性参与提供了典范,积累了推进男性参与的非常丰富的经验。“白丝带”已经成为男性参与的象征性符号,对此经验进行学习,将直接推进中国的男性参与。

考虑到男性参与同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的男性参与经验,同样是研究的重要内容。两岸三地文化背景相似,港澳台地区在男性参与上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大陆推进男性参与的参考。

在了解国际及港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大陆以往的男性参与尝试,对于提出本土化的男性参与策略具有重要帮助。

(三)在法律与公共政策领域推动男性参与

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所谓基本国策,属于公共政策的第二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元政策,第

三个层级是具体政策。基本政策承上启下,是各项具体政策制定的依据。联合国倡导“社会性别主流化”,强调的是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与公共政策当中。我们强调从男性参与角度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同样也要将男性参与的推进体现到国家的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中。

笔者一直主张,男性参与应该从制度和个人两方面入手。制度方面便是相关鼓励男性参与的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个人方面便是从帮助男性认识到父权制、支配性男性气质对男人和女人的伤害,从而使男性参与成为男性的自我要求。在强调个人改造的同时,不能忽视体制的改变,二者相辅相成,在过程中互相促进^{[7] (P165-172)}。这两个方面,制度是根本,但个人方面的改变,也离不开法律与公共政策的推动。

在现有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中,存在对支配性男性气质进行鼓励的情况,这不利于男性参与。比如,在离婚案件中,法官多数将孩子判给母亲抚养,背后的假设是男性不如女性适合抚养孩子;男性较女性晚退休5年的规定,背后的假设是女性比男性更适合承担家务劳动,等等。即使仅仅从推进男性参与的角度看,这些法律及政策也是需要修改的。我们需要全面检讨中国现有法律、公共政策中阻碍男性参与之处,同时提出可以促进男性参与的建议,如反家暴法正在全国征询意见,笔者主张,其中应该明确纳入鼓励男性参与反对家庭暴力的内容;推动出台“男性待产假”制度,以促进男性参与照顾婴儿、抚育孩子;呼吁设立“男性参与日”这一国家的公共假日,作为倡导男性参与的契机;推动在政府中设立“性别平等部”,等等。

妇联系统作为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组成机构,有必要在日常工作中加入推进男性参与的内容。

(四)在学校教育领域推动男性参与

学校教育是社会化的重要过程,男女平等的意识和能力必须从各级学校开始培养。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可以成为促进男性参与的课堂。

在学校教育中,应该遵循反对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反对性别气质二元划分的教育,反对支配

性男性气质的教育,反对“拯救男孩”“阳刚男生”“贤淑女生”式的教育,而鼓励性别气质的自主、多元发展。这样的性别教育,可以通过教材、教学等不同方式来落实。

在教材方面,检讨现有教材中阻碍男性参与的内容,比如一些小学教材的插图,都是女性在做家务、照顾孩子;为编写新教材提供尽可能多的全面建议,增加鼓励男性参与的内容,比如父亲与孩子玩耍、做家务,男性从事传统上由女性从事的工作等内容。

在教学方面,如体育课上,男生和女生从事同样的运动,男生也可以跳绳,女生也可以踢足球;增加男性幼儿教师的比例;从幼儿园到小学均增加社会性别平等教育的内容,等等。

在其他方面,如教师鼓励父亲来开家长会,检讨并改善公共空间(如卫生间)的性别配置,等等。在高等教育中,男性参与的教育可以浸透到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中。

(五)在大众传播领域推动男性参与

媒体是进行男性参与、男女平等教育的重要工具,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等新媒体形式应该受到充分重视。

我们可以做的是:调查、检省不同媒体节目中阻碍男性参与的内容,对于促进媒体内容的男性参与提出尽可能全面的建议;制定对媒体从业人员进行男性参与培训的内容框架;对于男性参与的事件给以关注和报道;鼓励媒体推出男性参与的标杆式人物,媒体进行宣传倡导,使公众具备学习的典范;鼓励多元男性气质的节目,如广告中男性可以从事传统的女性活动,女性可以成为领导但并不被“男性化”,等等。

中国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在2014年组织了10位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男人在全国四城市进行了“讲故事”活动,分享性别经验,倡导男性参与,经由媒体报道,出版和发行了该活动的纪录片和专著,也实践了在大众传播领域的男性参与倡导。

(六)在社会服务领域推动男性参与

香港地区的经验是,社会工作组织在推动男性参与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大陆,社会工作体系正得到快速发展,因此应该非

常重视社工在男性参与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一整套社会工作中如何推进男性参与的具体建议。

心理咨询师从业者在中国大陆正在快速增多,这也是一个潜在的进行男性参与教育的团体。我们应该针对心理咨询中如何体现社会性别意识,如何促进男性参与及男女平等进行研究。

反家暴法草案中有对预防与矫治施暴行为的规定,男性参与可以在家庭暴力的预防、处置等许多环节贡献力量。男性辅导员更容易与男性施暴者建立合作关系,许多女性受暴者也希望听到来自男性专业人员的意见,男性参与反家暴的工作也有助于自身性别觉悟的提升。

西方一些国家的男性参与组织,组织“好爸爸好父亲”培训项目,极大地促进了男性角色的改变。

国际社会的经验是,NGO 组织的社会行动一直在促进男女平等、男性参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中国大陆的性别平等 NGO 组织也非常活跃。在推进男性参与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国际经验,提出 NGO 组织推进男性参与的策略。比如,作为男性参与象征标志的“白丝带运动”,已经在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中国也有

了作为 NGO 组织的白丝带志愿者网络,如何更好地让这一网络在男性参与运动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实践。

总之,男女平等的实现离不开男性参与,男性可以而且能够成为促进男女平等的重要力量。弘扬'95 世妇会精神,推动性别平等,需要我们从各方面更加重视和推动男性参与。

参考文献:

- [1] 方刚. 从男性气概的改造到促进男性参与[J]. 妇女研究论丛,2007,(6):5-10.
- [2] 方刚,钟歆. 父亲类型研究与促进男性参与[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4):37-42.
- [3] 黄河. 男性研究对性别平等教育的意义[J]. 妇女研究论丛,2008,(2):40-47.
- [4] 罗晓娜. 论通过公共政策促进男性气质的改造与男性参与[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6):47-51.
- [5] 方刚. 反家暴立法应有男性气质视角[J]. 妇女研究论丛,2011,(6):16-20.
- [6] 方刚. 男性要解放[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3-24.
- [7] 方刚. 男性研究与男性运动[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Status Quo of Male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on Its Significance

FANG Gang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male participation was emphasized in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Yet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participation has not been good enough in these 20 years. The concept of male participation was put forward in 1994, and it has been paid great attention continually since then.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It is necessary and available to achieve male participatio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male participation in China are just starting, which need to be developed a lot. The promotion of male participation requir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the theories on male participation, on its status quo and the experience on it, as well a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f male participation in many fields, such as public policy, school edu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social service, etc. All above aims at giving full scope to the theme of the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Key words: gender equality; male participation; masculin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1995; *the beijing declaration*

· 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专题研究 ·

在校女大学生的择业倾向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北京市大学生的调查

侯典牧, 张丽琍

(中华女子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市30多所高校大学生就其择业倾向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女大学生把工作稳定排在首位;首选的就业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大部分认为工作与所学专业要有一定关联;期望的月薪集中在2500~5000元之间,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低收入家庭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高收入家庭选择准备出国的比例高;愿到基层就业的女大学生总体趋势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更看重第一份工作对自我成长的价值,而低收入家庭的相对看重先自食其力;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高,成绩排名靠后的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

〔关键词〕 女大学生;择业;就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28-07

一、前言

近年来,针对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少国内学者做了一些研究。但定量研究,即从男女大学生对比的角度进行大样本比较研究的较少。大学生就业难既有社会环境问题、学校教育问题,也有大学生自身择业倾向等问题。因此,本研究基于性别视角,以在校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从择业倾向的角度探讨分析目前女大学生就业中的问题,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女大学生的就业工作。另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女大学生的就业倾向特点,拟选择少部分男大学生样本作为对比,同时,进一步探讨家庭资本、个体人力资本等

因素与女大学生就业倾向的相关性。

二、研究方法 with 对象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的问题涉及毕业后的打算、考研原因、选择单位的性质、就业的领域与地区、到基层就业意向、薪酬期望值、工作与专业匹配度的倾向、工作的目的等重要变量。为了分析家庭资本、个体人力资本对女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家庭收入水平作为家庭资本变量,女大学生在班内学习排名作为个体人力资本变量。为了凸显女大学生的择业倾向特点选择了少部分男大学生样本做对比研究。

调查时间为2013年4月至9月间,所有问卷

收稿日期:2014-12-01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北京市女大学生就业与自主创业现状实证分析及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侯典牧(1969-),男,中华女子学院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从事女大学生创业就业研究;张丽琍(1962-),女,中华女子学院管理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领导科学、创业学研究。

由大学生访谈员亲自到北京各高校现场随机发放,并在大学生填写完毕后立即收回,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问卷的质量。该项调查涉及北京市30多所高校,共收到有效问卷1447份,调查对象的详细信息见表1,全部有效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分析处理。

表1 调查对象描述统计(n=1447)

一级类目	二级类目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缺失13)	男	589	40.7
	女	845	58.4
所在年级 (缺失10)	一年级	192	13.3
	二年级	192	13.3
	三年级	768	53.1
	四年级	275	19.1
	五年级	10	0.7
上学前固定住址 (缺失6)	农村	377	26.1
	城镇	305	21.1
	中小城市或县城	443	30.6
	省会以上大城市	316	21.8
年家庭收入 (缺失25)	1万元以下	221	15.3
	1万~2万	249	17.2
	2万~3万	199	13.8
	3万~4万	169	11.7
	4万~6万	168	11.6
	6万~8万	143	9.9
	8万以上	273	18.9
在学校的成绩 (缺失17)	本专业前25%	656	45.3
	本专业25%~50%	563	38.9
	本专业后50%	211	14.6
所学专业 (缺失3)	哲学	23	1.6
	经济学	182	12.6
	法学	88	6.1
	教育学	41	2.8
	文学	62	4.3
	历史学	25	1.7
	理学	74	5.1
	工学	432	29.9
	农学	10	0.7
	医学	50	3.5
	管理学	362	25.0
	艺术学	25	1.7
	其他	70	4.8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在校女大学生择业倾向分析

1. 毕业后的前途选择。大学生对于毕业后的选择,主要有六选项途径:出国或准备出国、读研、找工作、考公务员、自主创业、求职考研两手准备。从表2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女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找工作和读研,占总数的72.9%。男女生在毕业后打算上差异不太明显。

表2 毕业后的打算(女=843,男=588)

项目	出国或准备出国	读研	找工作	考公务员	自主创业	求职考研两手准备	其他
女	10.6%	34.0%	38.9%	5.7%	1.2%	8.4%	1.2%
男	11.1%	34.2%	38.8%	6.1%	1.9%	7.1%	0.8%

进一步对其中准备考研的学生考研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大学生选择读研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有66.3%的女大学生出于此原因选择读研;排在第二位的是对学术感兴趣,占20.0%。由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该项上男生与女生差别较大,选择对学术感兴趣的男生比例高于女生。女大学生选择考研的第三位原因是作为就业压力过大的缓冲,占19.8%。

表3 选择考研的原因(最多选两项)(女=409,男=280)

项目	对学术感兴趣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	对求职恐惧	顺应潮流	作为就业压力过大的缓冲	转换专业或城市	家长的期望	其他
女	20.0%	66.3%	6.6%	4.2%	19.8%	13.9%	13.0%	2.0%
男	25.7%	66.1%	4.6%	6.4%	19.6%	6.8%	11.8%	1.4%

2. 就业单位性质选择。就业期望单位的性质男女大学生差异比较大,女生排在首位的是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占42.7%),而男生排在首位的是国营企业(占43.0%)。可见女生把工作稳定排在首位,男生既看重工作的稳定性又看重收入。调查显示,工作稳定仍然是大家就业上的首选,大学生对国有企业及其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选择与这些单位拥有更大的工作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见表4)。

表4 就业期望选择单位性质
(最多选两项)(女=825,男=575)

项目	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	国营企业	私营民营企业	外资、合资企业	自主创业	没有特别要求
女	42.7%	38.7%	7.90%	35.0%	8.2%	16.4%
男	28.9%	43.0%	12.5%	28.7%	11.8%	17.9%

3. 就业领域的选择。由表5可知,男女生最愿意去的领域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教研部门、政府部门、商业外贸、金融证券。前两类部门工作稳定,后两类薪酬高。这与就业单位性质调查结果是一致的,进一步证明了大学生把工作稳定排在就业的首位。另外,女生排在前五、六位的是服务业和新闻出版;而男生排在前五、六位的是IT与通讯业和制造业。总体性别比较来看,目前大学生首先看重稳定和收入,其次才考虑性别特长。这种就业理念会极大地限制其人力资源潜能的充分发挥。

表5 最愿意去的领域(最多选3项)(女=843,男=588)

项目	女	男
商业外贸	29.1%	22.1%
制造业	5.6%	20.9%
教育、科技、研究	40.2%	33.0%
政府部门	34.2%	26.9%
金融、证券	24.3%	22.3%
建筑房地产业	7.4%	8.3%
交通运输业	2.4%	7.1%
销售业	5.6%	8.0%
服务业	12.5%	8.3%
农、林、牧、渔业	2.8%	2.0%
IT与通讯业	9.4%	21.9%
文化体育业	10.2%	6.1%
法律	5.0%	1.5%
电力、石化等能源业	4.6%	15.6%
生物医药行业	6.9%	3.1%
新闻出版	10.7%	4.8%
街道、社区	2.4%	1.9%
非营利、非政府组织	8.2%	4.9%
其他	1.5%	0.9%

4. 就业地区选择。由表6可见,目前大学生首选的就业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其次是中等城市,农村、乡镇几乎无人问津。这主要是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造成的。另外,不可小觑的是,选择到国外就业的比例也高于到国内小城市就业的比例。

表6 就业地区的首选(女=840,男=588)

项目	国外	经济发达的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包括县城)	乡镇	农村	其他
女	7.1%	62.1%	27.3%	1.3%	0.5%	0.6%	1.1%
男	8.3%	61.6%	24.3%	2.7%	1.0%	0.7%	1.4%

5. 到基层就业意愿。由表7可知,虽然决心到基层就业的学生比例非常低,但大学生中选择“有可能到基层就业”的人占一半以上,可见如果政府政策得力,还是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到基层就业的。

表7 是否愿意到基层就业(女=842,男=588)

项目	决心到基层就业	有可能到基层就业	暂时没有考虑	不会考虑到基层就业
女	2.0%	51.9%	40.3%	5.8%
男	3.9%	55.1%	31.1%	9.9%

6. 专业和工作匹配需求。关于求职时专业与工作性质的关系,大部分学生认为可以有一定关联,不一定对口(见表8)。

表8 在求职时您认为专业和工作性质的关系
(女=839,男=587)

项目	一定要找与专业对口的工作	可以有一定关联性,不一定对口	专业与工作性质没什么关系,关键是先找一份工作
女	8.0%	79.1%	12.9%
男	12.4%	73.3%	14.3%

7. 对薪酬期望值。由表9可知,总体来看,月薪1500元以下几乎是大学生们都不能接受的。目前大学生刚工作的月薪期望大部分集中在2500~5000元之间。男女生在高薪酬上的期望差异较大,期望6000元以上的女生只占9.2%,而男生则占21.5%。

8. 工作目的及对第一份工作的态度。由表10可知,目前大学生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其次才是赚钱。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

论,该调查数据揭示目前大学生就业的主导需求是高层次地实现自我价值,但这种价值追求会被工作稳定的首要选择所限制。

表9 期望刚工作的月薪(女=844,男=589)

项目	1500元以下	1501~2000元	2001~2500元	2501~3000元	3001~4000元	4001~5000元	5001~6000元	6001元以上
女	0.4%	3.3%	11.5%	20.7%	23.1%	20.3%	11.5%	9.2%
男	0.8%	2.2%	8.7%	15.8%	20.5%	17.8%	12.2%	21.5%

表10 工作的目的(允许选2项)(女=839,男=587)

项目	实现自我价值	为了赚钱	为了生存	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	为人类做贡献	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富强	获得权力的手段	其他
女	75.4%	44.2%	37.9%	11.9%	7.2%	3.6%	0.7%	1.0%
男	64.3%	44.9%	37.6%	11.9%	10.9%	5.6%	2.2%	0.7%

进一步对其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所持态度进行分析,由表11可知,当前大学生非常在意第一份工作对自己职业生涯成长的价值,尤其是女生,占39.1%,她们很在意第一份工作对自己职业之路的积极意义。这与工作目的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目前大学生非常看重工作对自我成长及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作用。

表11 对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所持态度(女=839,男=587)

项目	女生	男生
非常看重,应该精挑细选,不能委屈自己	17.5%	22.7%
干什么都行,先实现自食其力,并尽早积累实践经验	19.8%	25.2%
在哪工作不重要,但干什么很重要,毕竟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啊	23.6%	23.0%
我并不急着挣钱,但很在意第一份工作对我职业之路的积极意义,它能够让我学到东西,享受职业的快乐	39.1%	29.1%

(二)家庭资本、人力资本与女大学生择业倾向的相关分析

1. 家庭资本与女大学生就业意愿。本文通过调查女大学生的家庭年收入来间接判断女大学生的家庭资本,分析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就业倾向的关系。

(1)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前途选择。从表12我们可以看出,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女大学生选择找工作的比例最高,占45.6%;而年收入在8万元以上高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只有33.8%选择在毕业后直接找工作,而有35.0%的会选择出国或准备出国。女大学生毕业后的6种不同前途选择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出国是成本最高的,需要有一定的家庭资本为基础;而找工作是成本最低的,还能带来一定的收入,减轻家庭负担。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数据显示,中低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选择读研的比例高,高收入家庭的选择出国的比例高。

表12 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前途选择的分析(n=827)

项目	1万元以下	1~2万元	2~3万元	3~4万元	4~6万元	6~8万元	8万元以上
出国或准备出国	4.4%	4.4%	11.3%	5.8%	5.2%	16.3%	35.0%
读研	31.6%	40.0%	34.7%	34.9%	29.9%	16.3%	21.9%
找工作	45.6%	37.5%	38.7%	39.5%	43.3%	41.9%	33.8%
考公务员	5.3%	4.4%	8.1%	4.7%	9.3%	4.7%	4.4%
自主创业	0.9%	0.6%	1.6%	1.2%	2.1%	2.3%	0.6%
求职考研两手准备	11.4%	11.9%	4.8%	11.6%	10.3%	7.0%	4.4%
其他	0.9%	1.3%	0.8%	2.3%	0	1.2%	1.9%

(2)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意愿。从表13中可以看出,有可能到基层就业的女大学生总体趋势表现出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年收入8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选择不会考虑到基层就业的比例最高,为10.6%。可见国家或地方制定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政策,应重点围绕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大学生来设计。

表 13 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基层就业意愿分析

项目	1万元以下	1~2万元	2~3万元	3~4万元	4~6万元	6~8万元	8万元以上
决心到基层就业	1.8%	0.6%	4.0%	1.2%	3.1%	0	3.1%
有可能到基层就业	62.8%	56.3%	54.0%	57.6%	49.5%	45.3%	41.0%
暂时没有考虑	30.1%	41.3%	33.1%	37.6%	42.3%	50.0%	45.3%
不会考虑到基层就业	5.3%	1.9%	8.9%	3.5%	5.2%	4.7%	10.6%

(3)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薪酬期望值。由表 14 总体趋势来看,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女大学生刚工作月收入 4000 元以上薪酬期望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

表 14 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刚工作薪酬期望分析

项目	1万元以下	1~2万元	2~3万元	3~4万元	4~6万元	6~8万元	8万元以上
1500元以下	0.9%	0	0	0	0	1.2%	0.6%
1501~2000元	3.5%	3.8%	2.4%	2.3%	2.1%	3.5%	5.0%
2001~2500元	13.2%	15.6%	11.3%	5.8%	17.5%	10.5%	5.6%
2501~3000元	21.9%	22.5%	21.8%	23.3%	21.6%	14.0%	19.3%
3001~4000元	23.7%	23.1%	23.4%	19.8%	20.6%	23.3%	24.2%
4001~5000元	15.8%	16.3	21.0%	26.7	23.7%	22.1%	21.1%
5001~6000元	11.4%	10.6%	12.1%	11.6%	8.2%	11.6%	14.9%
6001元以上	9.6%	8.1%	8.1%	10.5%	6.2%	14.0%	9.3%

(4)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的态度。从表 15 总体趋势来看,家庭年收入高的

学生更看重第一份工作对自己成长的价值,低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相对看重先自食其力。

表 15 家庭年收入与女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的态度分析

项目	1万元以下	1~2万元	2~3万元	3~4万元	4~6万元	6~8万元	8万元以上
非常看重	19.5%	14.4%	13.0%	23.5%	21.6%	18.6%	17.5%
干什么都行,先实现自食其力	28.3%	19.4%	22.8%	17.6%	16.5%	10.5%	20.6%
在哪工作不重要,但干什么很重要	21.2%	27.5%	30.1%	18.8%	24.7%	20.9%	19.4%
不着急赚钱,在意自己的成长	31.0%	38.8%	34.1%	40.0%	37.1%	50.0%	42.5%

2. 人力资本与女大学生就业意愿。本文主要通过调查女大学生在学校的排名来间接判断女大学生的个人人力资本,分析女大学生成绩排名与就业意愿的关系。

(1)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前途选择。从表 16 中得出,专业成绩排名后 50% 的女大学生选择找工作的比例最高,达到了 48.8%,成绩越好的女大学生找工作的比例就越小。这主要是由于专业成绩排名前 25% 的女大学生选择读研的比例高,达到 37.4%,可见成绩好的女大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较高。相对来说成绩低的学生选择创业的比例最高(见表 16、表 17)。

表 16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前途选择分析

项目	本专业前 25% 名	本专业 25%~50% 名	本专业后 50% 名
出国或准备出国	11.1%	10.2%	8.8%
读研	37.4%	30.3%	31.1%

续表

项 目	本专业前 25% 名	本专业 25% ~ 50% 名	本专业后 50% 名
找工作	33.4%	44.3%	48.8%
考公务员	5.8%	5.0%	5.0%
自主创业	1.4%	0.6%	2.5%
求职考研两手准备	9.7%	8.0%	3.8%
其他	1.2%	1.5%	0

(2)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就业单位性质选择。如表 17 所示, 成绩排名后 50% 的女大学生选择民营企业的比例高于成绩排名前 50% 的女大学生, 而成绩排名前 50% 的学生选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的比例高于成绩排名后 50% 的学生。目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营企业进入难度大, 民营企业进入难度小。内在揭示成绩好的学生在选择如意单位性质上更自信。

表 17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就业单位性质选择的分析

项 目	专业前 25%	专业 25% ~50%	专业后 50%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46.3%	40.8%	31.3%
国营企业	39.5%	38.5%	35.0%
民营企业	8.0%	6.1%	15.0%
外资、合资企业	33.8%	37.3%	32.5%
自主创业	8.5%	7.3%	11.3%
没有特别要求	13.7%	18.5%	21.3%

(3)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择业时是否要专业对口。表 18 显示, 专业成绩排名前 25% 的女大学生更看重工作与专业的一致性。

表 18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择业时是否要专业对口

项 目	本专业前 25% 名	本专业 25% ~ 50% 名	本专业后 50% 名
一定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	10.5%	5.0%	6.3%
可以有一定关联性, 不一定对口	77.4%	81.1%	79.7%
专业与工作性质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先找一份工作	12.1%	14.0%	13.9%

(4)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薪酬期望值。表 19 显示, 女大学成绩排名前 25% 的学生与后 25% 的

学生在 5000 元以上的薪酬期望上差别比较明显, 成绩排名前 25% 的学生对薪酬期望值也高。

表 19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薪酬期望值分析

项 目	本专业前 25% 名	本专业 25% ~ 50% 名	本专业后 50% 名
1500 元以下	0.2%	0.6%	0
1501 ~ 2000 元	2.1%	4.6%	4.9%
2001 ~ 2500 元	12.3%	10.2%	12.3%
2501 ~ 3000 元	20.0%	19.2%	30.9%
3001 ~ 4000 元	24.8%	21.1%	23.5%
4001 ~ 5000 元	17.9%	24.1%	16.0%
5001 ~ 6000 元	12.5%	11.1%	7.4%
6001 元以上	10.2%	9.0%	4.9%

(5) 成绩排名与工作目的。由表 20 可见 3 个成绩组排在前三位的工作目的都是实现自我价值、为了赚钱、为了生存, 但所选比例差别比较大, 成绩前 25% 的女大学生的这 3 个比例分别为 80.6%、41.7%、37%, 成绩后 50% 的学生这 3 个方面的选择比例为 73.4%、50.6%、44.3%。比较来看, 成绩前 25% 的女大学生更看重实现自我价值, 成绩后 50% 的女大学生比前者更看重赚钱和生存。

表 20 成绩排名与女大学生工作目的的分析

项 目	本班前 25% 名	本班 25% ~ 50% 名	本班后 50% 名
为了生存	37.0%	38.5%	44.3%
实现自我价值	80.6%	70.2%	73.4%
为人类做贡献	6.7%	9.0%	3.8%
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富强	2.8%	4.7%	3.8%
为了赚钱	41.7%	45.3%	50.6%
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	11.3%	12.1%	8.9%
获得权力的手段	0.7%	0.9%	0
其他	0.9%	0.9%	1.3%

四、结论

该研究通过调查问卷, 分析了女大学生 9 个方面的择业倾向, 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女大学生就业的关系。

(一)择业倾向

大部分女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找工作和读研,其中选择读研的大部分原因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出路”。从性别比较来看,目前大学生首先看重稳定和收入,其次才考虑性别特长。这种就业理念会极大地限制其人力资源潜能的充分发挥。目前虽然大学生首选的就业地区是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但如果政府政策得力,还是可以吸引大部分尤其是家庭收入低的学生到基层就业的。大部分学生认为工作与所学专业要有一定的关联。刚就业期望的月薪大部分集中在2500~5000元之间。大学生工作的首要目的是实现自我价值,因此非常在意第一份工作对自己职业生涯成长的价值,但这种价值追求会被工作稳定的首要选择所限制。

(二)家庭资本、人力资本与择业倾向的关系

1.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选择找工作的比例最

高;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中低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选择读研的比例高,高收入家庭的选择出国的比例高。有可能到基层就业的女大学生总体趋势表现出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因此国家或地方制定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的政策,应重点围绕中低家庭收入的大学生来设计。家庭年收入高的学生更看重第一份工作对自我成长的价值,而低收入家庭的女大学生相对看重先自食其力。

2. 学校成绩排名越靠前的女大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比例越高;成绩排名靠后的,选择找工作的比例高。成绩好的学生在选择如意单位性质上更自信。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对薪酬期望值也高,看重就业岗位与专业的一致性,同时更看重实现自我价值;成绩靠后的女大学生比前者更看重赚钱和生存。

An Analysis on the Tendency in the Occupational Selection of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Based on the Survey among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Beijing

HOU Dian-mu, ZHANG Li-li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By questionnaire method, the survey of the occupational selection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in more than 30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Beijing indicates that most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take the stability in jobs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y prefer working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Most of them require a more or less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work and their majors with the expected monthly salaries from 2500 RMB to 5000 RMB, of whom the primary working objective is self-fulfillment. Mor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choose to work after graduation in low-income families, yet more intend to study abroad in high-income families.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nnual income of family, the number of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work in grassroots decreases.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high-income famil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growth in their first jobs, yet the ones in low-income families aim to earn their own livings according to their first jobs. The girls who do well in study and exams may mostly choose to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yet those who do not well enough in academic achievements may probably decide to work after graduation.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 occupational selection; employment; influence factor

· 女大学生就业创业专题研究 ·

构建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朱广花, 赵晓琳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随着高等院校的扩招, 大学毕业生急剧增加, 大学生就业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为解决大学生就业, 我国在实践中形成了国家政策支持、高校牵头搭建就业平台和毕业生自主竞争为主的就业促进机制。该机制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女大学生基于传统性别文化形成的就业弱势仍需要更为有效的社会支持, 应该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女大学生就业。

关键词:女大学生; 社会性别; 就业促进机制; 社会性别分析

中图分类号: C91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838(2015)01-0035-05

一、研究思路

本文立足于济南市长清大学城, 以山东女子学院毕业生为主要调查对象, 对国内外就业制度进行研究, 分析女大学生就业的状况与特殊需求, 同时调查研究用人单位对学生的招聘标准、素质要求, 以及实习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 探讨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相关各方的联动, 提升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质量, 拓宽女大学生的就业渠道。尽早建立可行的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

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且也是当前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微观上讲, 就业是求职者之间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社会经验等的竞争; 从宏观上看, 就业难是我国人口压力较大、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体制改革中体制性裁员等社会因素所致。大学生就业难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专业设置、就业制度、劳动力市场

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解决这些存在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尖锐矛盾, 一直是我们社会、政府、高校和个人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在理论上, 本文试图以社会性别理论为指导, 分析当前的大学生就业机制, 探讨如何从制度上加以矫正, 以推进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向更深入的应用性研究发展, 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主流化。本课题具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 试图利用法学、社会学、统计学学科的相关知识综合研究当前女大学生就业机制中存在的性别问题, 通过对多所高校就业促进的个案分析当前就业促进机制对女大学生的促进效果, 从社会性别角度关注当前就业促进机制的缺陷, 提出关于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构建更为合理的促进机制, 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率。

在方法上, 采用深度访谈、小型座谈会以及

收稿日期: 2014-11-27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构建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的调查与思考”(项目编号: 11CSHJ07)

作者简介: 朱广花(1977-), 女,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女性权益保护研究; 赵晓琳(1980-), 女, 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讲师, 主要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研究。

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以自编的《女大学生就业促进调查问卷》为研究工具,对部分驻济高校2070名女大学生就业情况进行调查。主要调查问题包括女大学生就业现状、择业过程、家庭、学校、社会和有关职能部门对本人就业的帮助。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传统性别角色的影响、女大学生就业心理、职业期望与就业力、高校就业指导、社会保障机制、法律与政策这几个层面探讨和建立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为解决我省女大学生就业问题提供可行的对策与途径。

有关材料主要通过山东省各高校负责大学生就业工作的人员获得,通过文本分析,结合大量实证性研究,整合成较为系统的女大学生就业机制研究成果。

二、当前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的效果分析

当前就业促进机制包括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和高校的就业指导等方面的内容。

从法律层面看,支持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主要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就业促进法》《劳动法》,规定了禁止就业性别歧视以及相关法律责任的内容。法律规定了平等就业权,但是反对性别歧视的配套规定以及较为实用的、有力的惩罚措施缺乏,难以保护女性的就业权。

从政府层面,推行生育保险制度,监管法律的实施。我国通过《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构建了生育保险制度,该制度对女职工生育期间的休假时间、经济补偿和医疗保健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设立社保机构管理的生育保险基金均衡企业生育费用负担。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基金数量不足、监督不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不足、对违法单位的处罚不重的滞后现象。

高校目前的就业制度主要有开展就业指导、创业指导和择业观教育,举办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与社会联合推行女大学生就业援助。目前各地的就业援助形式一般都是高校与社会联合进行。具体操作就是高校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向提出申请的待业女大学生提供免费的推荐服务,高校与政府、社会协作建立人才储备制度,形成多种形式的“人才储备中心”,为女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和一定的经济帮助。从女大学生

群体就业的效果来看,上述各方面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关键问题是市场选择,应该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以就业为导向进行教育改革,在教育教学中渗透社会性别观念。因此,当前男权文化下的教育教学模式是女性就业的较大障碍。

社会性别主流化要求改变男权文化下的价值观,并树立男女平等的价值理念,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女性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结构性调整改变原有的性别角色分工,让女性平等享受社会发展成果。要在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下实现女大学生的平等就业,就要把妇女及其他弱势、边缘群体等纳入社会机制运作的主渠道,从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四方面做好工作,最终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三、构建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的探讨

(一)政府方面需实施的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

1. 实施高等教育改革。首先,高等教育的学科结构需进行适度改革。现有的学科结构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经济发展,必须适时调整。虽然教育部对高校的学科专业进行过调整,但是由于各高校办学水平不一,且扩招后高校招生质量和数量不等,学科调整和专业设置仍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对于不同层次教育需实施不同的政策。其次,严格专业、学科设置审批制度。对于高校上报的招生计划和专业设置,应根据每年市场劳动力需求的分析和预测,严格进行审批,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逐步规范高校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设置招生专业及人数。再次,在实施高等教育学科及专业设置改革的过程中,应纳入社会性别意识,重视女大学生的性别教育,构建高校女性学知识系统与理论体系,重视女性学课程设置,促进高校合理设置女性学课程教育,贯彻落实高等教育性别平等原则,帮助女大学生成长成才,提高其社会竞争能力。

2.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政府需要加强宏观调控,在协调三大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增加不同层次的就业岗位。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吸纳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第三产业能容纳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而中国的第三产业不发达,层次低,女大学生就业优势领域未全面形成。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主要是金融、法律、会计、新闻、卫生保健、社区服务、创意文化等现代生产服务业,能吸纳大量高端女性专业人才。中国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商贸、批发零售商业,以及餐饮、旅社、洗浴等生活服务业,不需要很多女大学生。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还需要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调整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积极发展高端服务业,如商业、金融、旅游、文化产业等行业,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层次。

3. 提高就业类法律的性别敏感度。尽管我国早就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但女大学生就业中依然存在性别歧视和偏见。究其原因主要是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不健全,《妇女权益保障法》是我国有关妇女法律的核心,但是其中关于劳动就业权利的规定比较笼统;《劳动法》《就业促进法》虽然明确了女性的劳动保护、劳动禁忌、平等就业等内容,但是没有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概念、表现形式、法律责任以及惩罚措施,对违法行为如何监管缺少制度性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由于执法与监督力度不够,无法对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行为构成真正的打击。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不力导致就业性别歧视普遍存在。因此,完善就业类法律,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反歧视措施,要有较为有效的惩罚标准,减少目前就业领域形式平等外衣下的性别歧视。健全有关妇女的法律,要突出平等的就业权,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概念和法律责任,保障女性在就业、晋升、培训等方面与男性机会均等,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完善女性劳动权的程序保障,监督和保证法律实施,提高劳动纠纷案件判决的执行力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应当建立法律的社会性别审查机制,使法律具有性别敏感度。在高校就业指导培训中,应当增加法律教育的内容,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应对与就业相关的法律事务的技能。

4.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的全面发展离

不开妇女的发展,女大学生就业是妇女发展的一部分,应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划。明确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政府责任,尽早完善促进女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特殊优惠政策,尤其是最影响就业的生育保险制度。现有的生育保险制度不够健全,企业为避免额外支出女职员生育期间的人工成本而尽量少招聘女生的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政府应该站在国家的高度认识到女性生育不仅是私人的事,也是全民族、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应当在全社会宣传这一观念,并提供制度支持。

第一,应该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生育基金规模,扩大受益人群。合理的生育保险制度应当保障合法的生育不受歧视,让国家、社会、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起性别差异给各方面带来的影响,即要有一种合理的补偿办法,适当减少企业负担。同时加强监测评估,使女性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实践中得到有力保护。第二,成立专门机构审查就业歧视案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奖惩权,奖励社会性别责任强的企业,处罚性别歧视的企业,通过行政审查保证就业平等。第三,推进家务劳动社会化,在养老育幼的问题上增加政府投资力度,让大部分职业女性能够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增强其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第四,根据各地区的现实情况制定女大学生就业援助制度。

(二) 社会层面的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

1. 文化建设中积极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坚持不懈地宣传男女平等的理念是一项长期的文化改造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构建男女平等的文化是大势所趋,作为占全国1/2人口的女性,不仅承担了重要的家庭社会责任,而且在很多领域日益成为社会主力军,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受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社会对女大学生的期望较低,几乎把建功立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男性身上,导致女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不受重视。因此,主流文化应当从公民权利、义务、社会发展战略等各个方面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要积极倡导进步的性别文化,主流媒体应该加大对女性正能量的宣传,让人们看到女性自立自强的一面,看到女性对社会发展做出

的贡献。文化宣传要有性别意识,应努力抵制传统刻板印象的束缚,拒绝和消除性别偏见,营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以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理念逐渐被了解、认可,但是我们需要更为有力的倡导和推进。政府应当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政府的支持下,妇联、高校、主流媒体以及其他关注女权的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应该有较好的联动,共同倡导先进性别文化。近年来,高校与妇联机构联合组织的社会性别培训就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规模较小,受益群体范围较窄。如果社会各界都积极倡导先进性别文化,广泛宣传一种公平就业、人尽其才的大学生就业氛围,就会慢慢消除用人单位的性别偏见,改善女大学生就业的舆论环境。

增加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与决策的机会,塑造女性的主人翁形象。提高量化指标,比如提高女性参政指标,列出具体的执行时间表和性别比例,在国家公务员招聘中增加女性名额,杜绝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这样既能起到示范作用,也会增加女性的就业机会,最为重要的是有利于为女性提供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

2. 建立专门的女大学生就业服务中介机构。由高校、社会性中介机构和用人单位一起构建女大学生就业服务体系,协同为毕业生提供咨询服务、信息服务、指导服务等多项服务,逐步形成良性运行机制。另外,用人单位在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应当强化社会责任感,公平公正地对待女大学毕业生,为女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公益部门也是扩充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平台,公益部门的就业潜力巨大,需要政府的着力扶持和加强,也需要社会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倡导社会广泛建立以职前培训为主的职业培训机构,专门针对女大学生开展就业培训服务,对女大学生的形象礼仪、就业技巧、实践能力、自身权益等多方面进行培训,增强女大学生的自信心和就业能力。

(三) 高校应建立女大学生就业促进机制

1. 高等教育要有性别意识。当前高等教育改革正在进行,我们认为高校的教育改革应当注

重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要与市场接轨,专业教育应与市场需求、职业能力培养密切结合。教育教学改革各项政策与实践必须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使女性能够平等地享有符合自身要求的教育服务,专业要根据女性教育特点和当前社会需求设置,人才培养要注重女性素质教育、学生艺术才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使女性受教育者能够开发自身优势。学校要培育男女平等的校园文化,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提高学生的社会性别意识。学校应当成立专门的机构来促进女大学生就业,要在就业指导中纳入性别等方面的分类指导,进一步提高就业指导的针对性。高校应加强与用人单位和社会性培训机构的合作,建立女大学毕业生培训基地,使就职培训适合社会需要,增强她们的就业能力,通过培训拓宽她们的就业面,使她们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从而顺利就业。

2. 设计相关评价指标。高校要面向市场,践行以人为本的教育人才培养方案,根据社会需求和发展趋势来设置专业和人才培养方案,增强专业设置的灵活性。要有针对性地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建立开放的、灵活多变的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来说,要制定两类指标,一是教育面向市场的评价指标设计,二是专业与市场结合的评价指标设计,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高校应紧跟社会需要培养人才的思路,从市场需求入手,不断优化学科专业设置,改善课程结构。在人才培养方案上,要充分考虑女性教育特点和社会需求,做到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识教育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内与课堂外相结合,增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投入,培养女大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不断提升女大学生综合素质。要重视对女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使她们能够适应市场的竞争和发展。

3. 调整人才培养思路。招生与就业直接相关,共同决定了高校的生存和发展。所以,高校应该调整人才培养方针,学习企业的产品营销思路,要像企业推销产品一样把自己培养的毕业生推向用人单位,关注毕业生择业的人才市场,建立完善的就业服务制度,努力拓宽就业渠道,提

高就业率,确保毕业生充分就业。女大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女性看重稳定的工作,不敢尝试自主创业,对公务员以及事业单位工作过分推崇。高校应加强社会性别培训,帮助女大学生更多地了解社会、接触社会,自立自强,根据女性人才特点建立一种女大学生营销机制,从女大学生入学之初一直到毕业,通过性别教育、优秀女性事例教育等方式,培养女大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其就业能力。

4. 进行全程职业教育,建立全程就业服务体系。有的学校推行的“四年职业规划项目”值得借鉴。具体来说,大一时就开始对学生进行职业教育,让学生接触和了解所学专业的就业状况,提出自我调整的必要性;大二时要求学生通过测试了解自己的性格、兴趣和专长,确定适合自己的职业类群;大三时进一步让学生了解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和人才市场总需求情况,参加就业实习和现场招聘会,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充电,为就业做准备;大四时也就是毕业季,学校要辅导学生做好毕业生推荐表,讲授求职技巧,对个案进行具体指导。通过这样的全程职业教育,能帮助女大学生尽早认清社会就业现状,确立就业目标,努力增强就业能力。

5. 建立毕业生推销模式。学校要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为毕业生创造更多的实习机会。对毕业生的调查显示,毕业实习十分关键,在实习工作中,学生能够很快察觉自己在知识掌握、工作能力以及与他人相处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实习,学生可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弥补课堂上理论学习的不足之处。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政法学院2010级毕业生中,有近20%的学生因实习表现优秀,而直接签约实习单位。

目前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多数都要求求职者有工作经验,这一要求影响了应届毕业生的求职。学校可以通过建立稳固的就业实习基地,既帮助学生积累工作经验,也促进其就业,还可以与用人单位实施“联合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学校明确培养目标,灵活安排教学计划,进行对口培养。积极探讨“订单式人才培养”,按用人单位关于毕业生知识结构、职业技能等各方面要求,学校协同用人单位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在后期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校企双方共同参与管理,学生毕业后直接到订单单位就业。在这种毕业生营销模式中,高校要重视女性人才的推销,建立专门的女大学生实习就业模式,切实做好女大学生就业工作。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System for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ZHU Guang-hua, ZHAO Xiao-lin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ersonnel system, the employment system of college students guided by the market,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recommended by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wo-way selected both by the students and the employers.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the enrollment scale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the number of the college graduates increases a lot. The issue of the employ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rise great attention in the society. The employment promotion system has been built up with the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the employment base set up by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individual competitions of the college students, which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employment issues of the college graduates. However, as for the employment disadvantages of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owing to gender inequality, some more effective social supports are required to be offered. More effective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employment of the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Key words: female college student; gender; employment promotion system; gender analysis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城镇已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研究

——基于时间利用的分析

杨玉静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摘要: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从时间利用的视角分析城镇已婚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状况发现,婚姻和生育是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工作时间的刚性减少了女性对家庭的时间投入,城镇已婚在业女性比男性面临更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公共服务的供给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矛盾和冲突。在政策方面,建议推动用人单位公平对待职业女性,有条件地实行弹性工作制;政府要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水平;同时倡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

关键词:城镇已婚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分配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40-07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我国单位办社会的体制不复存在,许多家庭服务的功能转嫁到家庭本身,女性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照料责任。虽然中国的生育率一直在下降,家庭规模在减小,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在提高,但由于老龄化、家庭照顾的市场化和私人化,对独生子女的高期望,传统大家庭支持可获得性的降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等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存在,家庭照料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更加明显,甚至有部分女性在生育以后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在家料理家务的女性之所以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劳动,

77.1%的被调查者认为并不是她们不想出去工作,一个主要原因是“家里有孩子需要照顾”,“家里有老人/病人需要照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67.5%的已婚女性目前或曾经因结婚生育/照顾孩子、照顾老人/病人、支持配偶发展等“家庭原因”而中断职业发展^[1]。

从时间利用的视角分析城镇已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对于了解职业女性的双重负担状况、为促进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提供政策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二、相关研究回顾

对工作与家庭冲突研究比较多的是在管理学领域,国内外学者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后果,以及公司、企业应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举措等

收稿日期:2014-12-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ZH020)

作者简介:杨玉静(1974-),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性别与政策、婚姻与家庭研究。

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已有的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结构、组织管理实践、性别、人格、产业制度环境、社会文化等都会对工作家庭冲突产生影响;工作与家庭冲突最终会影响个体和家庭的健康,导致各种负面组织行为并影响组织绩效;面对影响组织绩效的负面组织行为,组织会设计多种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如时间管理、弹性工作制、家庭照顾福利、培育工作-家庭文化等,并将它们正式化与制度化,降低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水平^[2]。

伴随工作-家庭冲突研究的同时,平衡工作与家庭的研究则强调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相互促进与和谐共融。针对女性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有研究者从对国外相关政策的分析,提出了帮助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政策需求和建议。和建花、蒋永萍从支持妇女就业、平衡妇女家庭与工作矛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世界发达国家家庭政策加强政府对公共托幼事业的责任的发展趋势,并探讨了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托幼政策与托幼现状,对完善公共服务政策提出了建议^{[3][4]}。刘伯红、张永英、李亚妮通过对中国人口、家庭发展与变化趋势及家庭照顾特点的分析,解释了女性工作与家庭关系冲突的原因,并从政府责任、公共政策、立法、社会风尚、统计与研究等方面提出平衡女性工作与家庭的政策建议^[5]。

西方学者对于已婚女性时间分配的研究更多地侧重家庭的性别分工。性别角色理论^[6]和相对资源理论^[7]都从家庭内部分工解释了已婚女性的时间分配;之后的社会性别理论、互动理论和综合理论把对已婚女性时间分配的原因分析由家庭内部上升到更加宏观的社会体制层面^{[8][9]}。利用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数据,石红梅探讨了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问题,发现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受到社会文化观念、家庭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及个人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特征的综合影响^[10]。基于对职场女性领导者的访谈资料,陈雪飞、张妙清就女性领导者如何融合家庭内外进行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外女性领导者在管理时间的方式、对自己

家庭角色的描述以及影响她们感知工作-家庭冲突的因素等方面存在差异^[11]。

已有研究对本文具有很多借鉴意义,鉴于实证研究的缺乏,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分析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状况和趋势,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三、数据与方法

由于农村在业女性大多从事的是农业劳动,没有进入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其劳动时间具有灵活性的特点,在时间分配上,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程度不及城镇职业女性,所以本文只对城镇在业女性进行研究。另外,由于婚姻对女性时间分配的影响较大,进入婚姻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增加,工作时间与家务劳动时间、休闲时间的挤压可能会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重点关注城镇已婚在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冲突。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所做的3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1990年、2000年和2010年3次调查均对时间利用进行了调查,但3次调查的方式略有不同,为便于比较,本文只考察城镇在业者在工作日的的时间分配情况,并将时间分为五类:(1)用于生存和发展的工作/学习时间,即有酬劳动时间;(2)工作/学习往返路途时间,即通勤时间;(3)用于再生产的家务劳动时间,即无酬劳动时间;(4)用于身心发展的休闲娱乐时间;(5)因生理需要而产生的睡眠时间。

本文将运用交互分析的方法探讨近20年来城镇在业者各类时间分配的变化趋势及性别差异;分析不同女性群体工作与家务劳动时间分配模式的不同;针对城镇已婚在业女性所面临的工作与家庭平衡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

本文选取1990年、2000年和2010年18~64岁城镇在业者样本,样本分布状况见表1。其中分别有2940、6030、6071个已婚样本。

表1 1990~2010年18~64岁城镇男女在业者样本分布状况

	总样本	男性	女性
1990年	3397	1848	1549
2000年	6961	3424	3537
2010年	7230	3992	3238

四、描述性分析结果

(一) 20年来城镇在业者时间分配的变动趋势及性别差异

从图1可以看到,城镇在业者的各类时间分配呈现出“三升两降”的趋势。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作占用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特别是最近10年,城镇在业者的工作时间增加了27分钟;同时由于城市的扩张、道路的拥挤、房价的上涨,居住地与上班地点的分离,人们用在工作路途上的时间也增加了,尤其是最近10年增加的较多;虽然睡眠时间也有所上升,但3个时点的数据均显示不足8小时;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并没有带来休闲娱乐时间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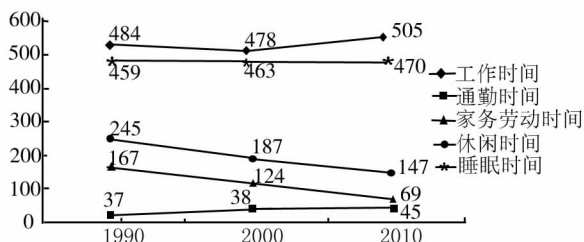


图1 1990~2010年城镇在业者时间分配的变动趋势(分钟/天)

分性别来看,两性时间利用的变动趋势与总体一致,也是“三升两降”,但是两性对各类时间的分配有较大差异,男性用在有酬劳动上的时间始终超过女性,而女性花在无酬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大超过男性,休闲时间却比男性少。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城镇女性在业者的工作/学习时间比10年前增加了39分钟,大于男性工作/学习时间增加的幅度(13分钟),但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仍多于男性;两性用于有酬劳动的时间差异在减小,但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仍相差一个小时,这说明虽然女性的工作负担在加重,但仍然要承担主要的家庭照料责任,“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依然没有根本改变(见图2)。

对比图2和图3可以发现,城镇已婚在业男性的工作/学习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女性已婚者的工作/学习时间减少了,家务劳动时间增加了,说明婚姻对于城镇男女在业者时间利用的作用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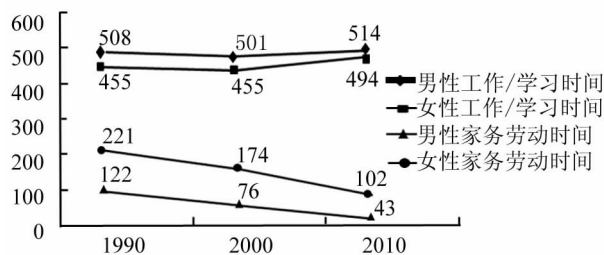


图2 1990~2010年城镇在业者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分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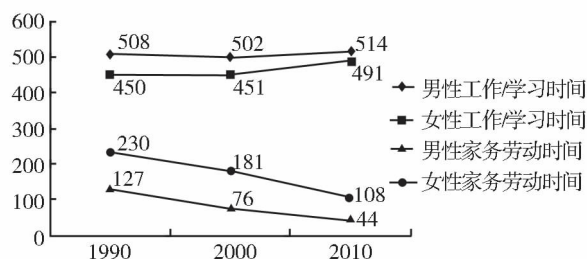


图3 1990~2010年城镇已婚在业者时间利用的性别差异(分钟/天)

(二) 婚姻对两性工作与家庭时间分配的不同影响

从2010年调查数据来看,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城镇在业女性的时间分配存在较大差异。表2显示,与未婚女性相比,在睡眠时间差异不大的情况下,由于已婚女性要在家务劳动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因而减少了工作/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已婚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比未婚女性少29分钟,但家务劳动时间却多64分钟,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更多;由于没有配偶一起承担家庭责任,离婚和丧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均高于已婚女性;另外,离婚女性的工作时间略高于已婚女性,其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冲突可能要更大些,但这并没有减少她们的休闲时间,离婚女性的休闲时间比已婚女性多9分钟,她们牺牲了更多的睡眠时间。

从性别差异看,婚姻对于男女两性的时间分配起着不同的作用。未婚男女的工作/学习时间没有差异,未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仅比男性多17分钟,但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比男性多64分钟,而工作/学习时间则少23分钟;不管处于哪种婚姻状态,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均比男性多,在平衡工作与家庭时间的过程中,她们牺牲了更多的休闲时间。

表2 2010年不同婚姻状况的城镇在业者时间分配的性别差异(分钟/天)

	未婚		已婚		离婚		丧偶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工作/学习时间	520	520	514	491	512	493	470	484
通勤时间	54	53	47	41	46	42	40	33
家务劳动时间	27	44	44	108	68	114	103	122
休闲时间	163	157	156	132	164	141	136	138
睡眠时间	475	476	470	473	453	449	464	451

(三)生育对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时间的影响

生育是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面临的巨大挑战,有无未成年孩子、孩子的数量以及年龄状况,使在业母亲在工作与家庭的时间安排上也会有所不同。

表3显示,家里未成年孩子越多,在业母亲的家务劳动时间越多,睡眠时间越少;有一个孩子的在业母亲比没有孩子的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增加30分钟,睡眠时间减少了31分钟;但是,她们的工作/学习时间和休闲时间并没有减少,在业母亲只是牺牲了更多的睡眠时间。而有2个和3个及以上孩子的在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增多,工作/学习

时间明显减少,休闲和睡眠时间也显著减少。

表3还显示,有0~2岁孩子的城镇在业女性工作时间最少,睡眠时间也较少(不足8个小时),家务劳动时间较长,这可能是因为孩子在3岁之前需要更多的家庭照顾,女性因怀孕、产假、哺乳等需要而减少了工作时间;有3~5岁孩子的在业母亲家务劳动时间最少,睡眠时间最多(8.2小时),还可以把较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学习中,这可能是因为托幼服务替代了部分家庭照料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在职母亲的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孩子上小学乃至中学以后,在业母亲的工作/学习时间和家务时间都增加了,她们或许是双重负担较重的一个群体。

表3 2010年未成年孩子的数量、年龄与城镇在业母亲的时间分配(分钟/天)

		工作/学习时间	家务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睡眠时间
孩子数量	没有孩子	493	76	133	501
	1个孩子	495	106	135	470
	2个孩子	473	128	123	469
	3个及以上孩子	475	127	116	454
孩子年龄	0~2岁	489	100	124	466
	3~5岁	493	90	122	494
	6~12岁	500	110	115	477
	13~17岁	497	114	133	465

已婚女性与丈夫处于同一家庭生命周期,同样外出工作,但生育对两性时间利用的作用却存在较大差别。2010年调查数据显示,不管家里有几个未成年孩子,也不管这些孩子的年龄有多大,在业父亲的家务劳动时间都没有多少差异,家有不同年龄孩子的在业父亲工作时间也没有差异(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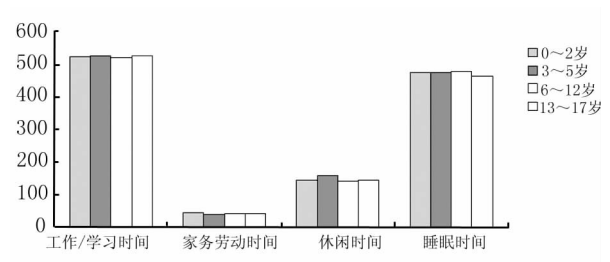


图4 2010年未成年孩子的年龄与在业父亲的时间分配情况(分钟/天)

(四)不同职业发展环境中的已婚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利用差异

不同职业、不同单位类型和不同单位所有制中的已婚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结构呈现出不同特征。

从表4可以看出,各类负责人的工作/学习时间最长,平均每天8.4小时,睡眠时间最短,只有7.4小时,但休闲时间最长;相对来说,女性专业技

术人员的工作/学习时间较少,家务劳动时间还比各类负责人少10分钟,工作与家庭的冲突相对较小;生产运输工人的工作/学习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都比较长,工作与家庭时间的分配模式与各类负责人相似,但休闲时间却比各类负责人少32分钟,她们的工作与家庭冲突相对较大。从总劳动时间(含通勤时间)来看,生产运输工人最长,其次是各类负责人,再次是商业服务业人员。

表4 2010年城镇不同职业已婚女性的时间利用状况(分钟/天)

	工作/学习时间	通勤时间	家务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睡眠时间
各类负责人	503	42	104	155	446
专业技术人员	485	48	94	131	479
办事人员	501	44	96	128	483
商业服务业人员	493	35	117	132	466
生产运输工人	499	43	109	123	477
农业生产人员	393	43	138	146	474

表5显示,在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已婚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结构类似,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时间均比较长,但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女性的休闲时间长,睡眠时间短,事业单位女性则相

反。在社会团体及基层自治组织工作的已婚女性工作/学习时间和睡眠时间均最短,休闲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均最长。单位类型为个体工商户的已婚女性通勤时间最短,但工作与家务时间都比较长。

表5 2010年城镇不同单位类型已婚女性的时间利用状况(分钟/天)

	工作/学习时间	通勤时间	家务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睡眠时间
党政机关/人民团体	503	48	108	140	468
社会团体及基层自治组织	474	40	124	157	464
事业单位	500	46	101	125	486
企业	492	46	97	127	471
民办非企业	484	47	113	129	486
个体工商户	501	36	110	130	470

从表6可以看到,在睡眠时间差异不大的情况下,港澳台/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和通勤时间最长,家务劳动和休闲时间最短,工作与家庭时间的矛盾较为突出;而集体经

济单位女性的情况正相反,工作/学习和通勤时间最短,家务劳动和休闲时间最长;国有和私营/个体经济单位女性的工作与家庭时间结构差异不大。

表6 2010年城镇不同单位所有制已婚女性的时间利用状况(分钟/天)

	工作/学习时间	通勤时间	家务劳动时间	休闲时间	睡眠时间
国有经济	495	45	102	133	478
集体经济	466	42	124	154	472
私营/个体经济	498	46	100	121	474
港澳台/外商投资经济	514	63	88	118	477

(五) 城镇已婚在业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分配的地区差异

中国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京津沪和东、中、西部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差别,对各类时间的分配存在一定差异。调查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较多,而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沪地区,女性的工作/学习与中部女性一样,但京津沪女性的通勤时间却最长,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女性多21分钟和19分钟,这可能与大城市交通拥堵、居住地与工作地点距离较远等因素有关。西部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最少,比京津沪女性还少1分钟。相对而言,除了通勤时间较多、睡眠时间较少以外,京津沪地区已婚在业女性的总劳动时间最少,工作与家庭时间的冲突并不明显,这似乎并不符合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特点;从各类时间的分配看,东部地区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关系较为紧张。

从性别差异看,京津沪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与男性差异最小,中部地区男女家务劳动时间相差最大;西部男女两性的工作/学习时间相差最少,男性比女性多15分钟,而京津沪地区两性的差异最大,男性的工作/学习时间比女性多34分钟。

五、总结与讨论

已婚女性参与市场劳动后,具有与男性相同的时间构成模式,但在传统家庭分工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已婚女性的时间分配不仅仅涉及个体的发展,还涉及家庭的健康发展。通过对已婚女性的时间分配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反映女性个体生活方式的变迁和现状,也可以反映女性在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中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比较3个调查时点的数据发现,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城镇在业群体的工作/学习时间、通勤时间和睡眠时间增加了,家务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但休闲时间并未增加;性别比较发现,男性的有酬劳动时间始终多于女性,而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也一直比男性多,虽然近10年女性的工作/学习与男性的差距缩小了,但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仍然较大,与男性相比,已婚在业女性的双重负担更重,双重角色的冲突更强烈。

处于不同婚姻状态的在业女性时间分配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已婚女性和离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时间冲突较为明显。婚姻和生育对男女两性时间利用模式的作用不尽相同,已婚在业女性牺牲了更多的休闲时间来平衡工作与家庭;未成年孩子的数量和年龄对在业母亲的时间分配影响较大,但对在业父亲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孩子越多,在业母亲的家务劳动时间越长,但只有1个孩子并不会减少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在业母亲的工作与家庭时间冲突最多的不是在孩子幼儿期,而是在孩子上小学以后。

从职业和单位环境看,女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与家庭时间冲突较小,各类负责人和生产运输工人的工作与家庭关系较为紧张,但各类负责人有较多的休闲时间,相比而言,体力劳动者的负担较重;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已婚女性工作/学习时间较长,其工作时间的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家务劳动时间的投入,社会团体及基层组织已婚女性的工作/学习时间最少,家务劳动和休闲时间最长;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单位对员工的时间管理模式也不同,相对来说,港澳台/外商投资经济单位女性工作与家庭时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另外,城镇已婚在业女性时间分配的地区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程度与个体时间分配的相关关系,东部地区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关系较为紧张,但中西部女性的工作和家庭时间分配与京津沪地区并没有明显差异,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与个体时间分配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研究发现,婚姻和生育是在业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也是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主要原因,但进入婚姻以及生育本身并不会大大减少女性的工作时间,而只是增加了她们的家务劳动时间,为了平衡工作与家庭,女性往往会牺牲自己的休闲时间。因此,政府及其他社会力量需要推动用人单位在就业、晋升等方面减少对女性的隐性歧视,这是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压力的一个重要前提。另外,用人单位工作时间的刚性会大大减少女性的家务劳动

时间,造成工作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在一定条件下实行弹性工作制。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功能的弱化,缓解女性工作与家庭冲突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增加家庭照料服务的供给和水平,尤其是要对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此外,在家庭中倡导男女共同承担家庭责任,鼓励男性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对于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玉静,郑丹丹. 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地位[A]. 宋秀岩. 新时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研究[C].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
- [2] 张勉,魏钧,杨百寅. 工作和家庭冲突的前因和后果变量:中国情景因素形成的差异[J]. 管理工程学报,2009,(4):79-84.
- [3] 和建花. 法国家庭政策及其对支持妇女平衡工作家庭的作用[J]. 妇女研究论丛,2008,(6):70-76.
- [4] 和建花,蒋永萍. 从支持妇女平衡家庭工作视角看中国托幼政策及现状[J]. 学前教育,2008,(8):3-6.
- [5] 刘伯红,张永英,李亚妮. 从工作与家庭的平衡看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0,(6):12-28.
- [6] Parsons Talcott, Bales Robert F. .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6.
- [7] Blood Robert O. Jr. , Wolfe Donald M. . *Husbands and Wives: The Dynamics of Married Living* [M].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0.
- [8] Maret, E. , Finlay, B. .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mong Women in Dual-earner Families*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1984.
- [9] Edwards, J. R. , Rothbard, N. P. . *Mechanisms Linking Work and Family: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Construc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 [10] 石红梅. 已婚女性的时间配置研究[D]. 厦门: 厦门大学博士论文, 2006.
- [11] 陈雪飞,张妙清. 女性领导者融合家庭内外的跨文化比较[J]. 妇女研究论丛,2011,(2):5-11.

**A Study on Work – family Conflict among Urban Married Wome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ime Utilization**

YANG Yu-jing

(Women'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third phase of the survey on the social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work – family conflict among the urban employed and married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utilization. The study reveals that marriage and fertility are the big challenges that those women are facing while balancing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 The enormous working hours reduce the time women devote to their family. In fact, the urban employed and married women are involved in greater work – family conflicts than men. And public service may alleviate these conflicts to some extent. This paper suggests employing fair treatment between the employed men and women and conditionally implementing flexible schedule in the related policies. It also advises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better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s well as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s and that th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re needed to be shared.

Key words: urban married women; work – family conflict; time utilization

· 女性与社会发展研究 ·

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优化研究

和建花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摘要: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宏观环境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即国家和政府层面的有关留守儿童的法律政策环境;人口迁移流动背景下留守儿童减量化措施所构成的制度和规划性环境;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解决背景下农村儿童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所构成的农村社区儿童工作环境;留守儿童问题及工作相关媒体宣传倡导所构成的传媒环境。针对上述4类环境及其优化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环境优化

中图分类号:C9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47-05

随着农村留守儿童群体问题的突显化,目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领域已相当繁荣。但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宏观环境的系统研究还相对有限。

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要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也把健全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作为重要工作指标。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在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机制和体系的大框架下,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宏观环境进行研究,为满足留守儿童现实和长远的需求提供政策参考。

本文将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宏观环境分为4个部分(见图1):(1)国家和政府层面有关留守儿童的法律政策环境(简称“法律政策”);(2)人

口迁移流动大背景下留守儿童减量化措施所构成的制度性、发展规性环境(简称“减量运作”);(3)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解决背景下农村儿童工作特别是社区工作所构成的社区儿童工作环境(简称“儿童工作”);(4)留守儿童问题及工作相关媒体宣传倡导所构成的传媒环境(简称“媒体宣传”)。

其中,法律政策是顶层设计,对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至关重要;留守儿童减量化措施以减轻留守儿童社会问题为目的,通过系列配套措施来缩减留守儿童的规模总量,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基本思路;而农村社区是家庭、学校、幼儿园以外儿童生活的重要场所和环境,农村儿童工作在现阶段较为薄弱,社区儿童工作是留守儿童工作的又一重要抓手;传媒则通过“上传下达”作用成为连接政府和公众的纽带和桥梁,在宣传和督促政

收稿日期:2014-12-15

基金项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儿童工作部2014年课题“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研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2014年立项课题“社会性别需求与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研究”

作者简介:和建花(1964-),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女童、家庭教育、儿童心理与教育、学前教育等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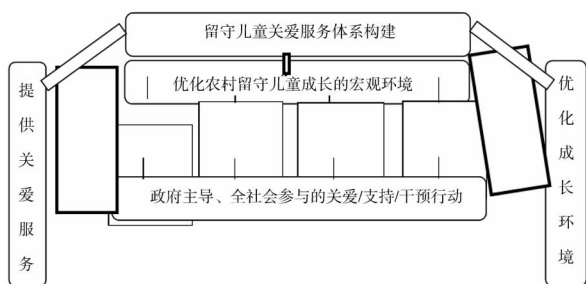


图1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构建与宏观环境优化
策、呼吁社会关注、形成舆论环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影响留守儿童成长的重要文化环境。

一、农村留守儿童相关法律政策及其完善

(一) 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完善

1. 完善儿童监护制度。《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明确了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其中,《民法通则》第十六条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可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二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其第十六条还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让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监护单独居住;不得放任不管,放弃监护职责。

上述法律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照料权益的规定不足表现在3个方面:(1)对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委托监护人的条件未加以明确规定,并且对如何有效监督未加以规定。(2)我国监护制度主要强调亲属监护,而组织和国家监护相对薄弱,对解决部分确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问题不利。(3)没有将监护与亲权分离,明确父母与一般监护人之间的区别,强调父母作为亲权人在对子女保护、养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留守儿童的

父母也没有做出相关规定,导致即使留守儿童父母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养育义务责任,法律也往往无法干预和救济。

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补充立法,强化父母对子女的监护、养育和教育义务与责任,以此杜绝“只生不养”或把孩子的监护、养育、教育问题转嫁给家里老人、社会和政府的现象。(2)完善委托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规定法定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委托监护人的条件,以及对监护人和委托监护人进行监督的制度。同时,法律也需对代理家长的角色与职责范围进行明确界定。(3)需规定和完善组织和国家监护职责的适用范围,解决家庭监护确有困难的留守儿童及其他特殊弱势儿童的监护问题。(4)针对近年来社会影响极坏的针对儿童包括对留守儿童的暴力特别是性侵害问题,应加大对相关法律的宣传特别是高院等颁布的条例的宣传,并对施暴者严惩不贷;还需尽快完善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将监护人等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暴力纳入家庭暴力内容。

2. 促进家庭教育立法。家庭是儿童成长过程中最早接触,也是最具持续性、对儿童影响最为直接的教育环境。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其他教育环境所无法比拟和取代的影响和作用。同时,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家需要通过法律政策的制定来支持家庭教育。就留守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家教缺位,因此家庭教育立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行为。从国际视野来看,家庭教育支持已经开始进入某些国家的公共政策视野及国家层面的政策领域,有的国家对家庭教育有法律规定内容^[1]。

我国先后通过《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确立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家庭教育内容纳入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和地方还先后制定了“九五”“十五”“十一五”家庭教育工作规划,确定了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全国妇联还牵头成立了由25个部委组成的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各省区市成立了各级家庭教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4]。然而,目前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纲要对家庭教育的规定还不充分具体,不能满足家庭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无法解决新时期家庭教育出现的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这一巨大难题。因此,亟需家庭教育专门立法,并在其中对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进行一定的规定。

(二) 国家层面的政策措施及其完善

十余年来,国务院通过下发或发布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纲要,强调要加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卫生保健、关爱服务、学前教育问题。

2006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农村留守流动儿童工作。2008年中央1号文件强调,农民工输入地要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就学,农民工输出地要为留守儿童创造寄宿和监护条件。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今后10年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并针对留守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动态监测机制、改善农村学生特别是建设留守儿童寄宿条件等方面做了具体规定。2010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在儿童与教育中提出要确保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41号)指出,要创造更多条件,着力保障留守儿童入园;发展农村学前教育要充分考虑农村人口分布和流动趋势,合理布局。

现有国家政策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对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规定仍然空泛而不具体;(2)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有待增强;(3)户籍制度的限制有待突破;(4)留守与流动儿童政策有待更好地衔接。

二、控制和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产生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留守儿童群体数量已达6102万,占农村儿童的37.7%,男童占54.1%,女童占45.9%^[2]。

(一)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留守儿童问题的总根源是农民工问题,而农民工问题又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与城乡户籍制度壁垒的产物。为此,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同时,逐步推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等与户口性质相关的行政、社会管理制度配套改革,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管理体制。

(二) 减少农民外出和鼓励农民工返乡

尽管中央加大了对“三农”的扶持力度,新农村建设有所成效,但长期实行的户籍制度,加上城乡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异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农村发展程度依然有限。为此,国家要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投资和支持力度,建立高效农业,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民就近就业,并让外出农民工愿意回乡就业创业。

(三) 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促进农民工及其子女平等融入城市,加快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市民化进程,使留守儿童能够进城,成为流动儿童和城镇儿童,是使农村留守儿童减量的又一个重要途径。从我国农民工流动的一些主要特征看,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3]。为此,政策环境需要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上提供更好的保障,完善覆盖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系,扩大农民工及其子女与城镇居民共享义务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和文化活动等公共服务的项目和范围。

三、加强农村儿童工作

(一) 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扶持力度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出台了一系列与儿童教育有关的强有力的法规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义务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农村职业教育也获得了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而从2010年开始,农村幼儿教育也迎来发展契机,2010年底《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目标,并专门指出创造条件保障留守儿童入园。同时,幼儿教育发展规划也纳入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把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并着力保证留守儿童入园。

调查发现,农村义务教育有长足进步,学前教育状况有所改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载体,特别是针对留守儿童的活动载体建设有所进展。但是,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等软件支持依然缺乏。

在农村教育扶持方面,建议国家和地方政府,一是继续加强农村义务教育,确保并大力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继续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和培训制度;二是加强对社区教育的支持,并发挥好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作用,更好地为农村留守儿童构筑弥补家教缺失的其他教育体系网络;三是加强对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支持,提供更多的亲职教育培训机会和条件。

(二)以农村社区儿童工作为抓手加强留守儿童工作

留守儿童工作是社区儿童工作的重要内容和领域,社区工作做好了,儿童及其家庭的很多困难和问题就能在社区层面得到解决,而不会上升到群体事件和社会问题。为此建议,一是把农村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统筹安排新农村建设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保障农村社会工作的运作经费,把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社会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纳入地方与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农村工作的考核范畴。二是农村社区工作需要从倡导社区建设理念、制定发展规划、改善资源配置、建设队伍方面加强社会工作的可持续性。调查中发现,目前很多农村社区有了一些儿童活动载体和活动场地,如儿童之家、儿童家园、儿童活动中心,同时有了一定的资金配备,很多地方的硬件设施得到了解决。但是,人员队伍等软件却非常缺乏,而且活动的长效机制也远未建立健全。因此,亟需加强社区儿童工作专业队伍的建设,并解决好社区儿童工作的长效机制问题。同时,在专业社区工作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证专业水准,预防将来农村社区出现社区儿童工作者遍地开花、鱼龙混杂的现象。

四、加强农村留守儿童相关传媒倡导和媒介素养教育

(一)加强传媒对留守儿童群体及问题的宣传

传媒既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公器,在反映国家政策、传播主流价值取向、引

导舆论、影响政策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新闻媒体对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童工作的宣传、报道,对公众了解留守儿童群体及其问题,对留守儿童工作的开展、对政策的不断修正完善,最终对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媒体也参与留守儿童问题的社会建构,影响公众对留守儿童形成特定的印象,而这种社会舆论、社会整体印象,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构成了一种社会氛围和环境,并进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留守儿童的生存发展。

由于留守儿童议题的特殊性和长期性,近10年来,留守儿童议题在主流媒体的新闻议程中占据了较为重要的地位。综合一些研究对主流媒体关于留守儿童报道的结论^{[3][4][5][6]},近10年来媒介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有如下主要特点:(1)媒介议题紧密围绕党和国家政策议题进行,确保了政策的下达,以及对公众舆论的正确引导。(2)报道内容中政府的政策措施、工作总结、关爱活动较多,而对留守儿童实际问题报道较少。(3)一些负面报道有时将留守儿童群体整体与“问题儿童”等同化,并因此也削弱了传播的可信度和力度。(4)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报道存在内容雷同、片面、模式化和标签化,缺乏深度报道评论,并集中于节假日等弊端。

因此,为提高传媒对农村留守儿童群体报道的效果和力度,更好地优化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传媒环境,提出以下建议:(1)媒体应以公心、社会责任感和追求公平正义的使命感,关心农民、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命运,长期规划、持久聚焦、深入挖掘报道留守儿童政策及留守儿童群体。(2)媒体要增强“把关人”意识,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营造有利于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舆论环境。(3)媒体自觉利用“上传下达”的社会公器作用,督促政府、呼吁社会维护留守儿童权益。(4)在宣传倡导政策和工作成绩的同时,多报道留守儿童群体的多面形象和存在问题,多为留守儿童发声,为他们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和传媒环境。(5)增加留守儿童群体形象的多面性和立体感,重塑符合实际、客观真实的留守儿童形象。

(二)净化网络环境和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在信息科技高度发展的当今时代,大众传媒

尤其是电视、网络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工具和手段,并成为儿童健康成长的一个重要环境。然而,目前一些大众传媒的“低俗化”“娱乐化”倾向也较为明显^{[7][8][9]},对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影响留守儿童对事物和价值的认知。

农村留守儿童一方面家教缺位,远离父母的监督、管理和引导;另一方面又因亲情缺失,在实际生活中接触的群体有限,较为缺乏沟通交流对象,因此媒介交流也往往成为他们寻求慰藉、排遣孤独的选择^[7]。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儿童网络利用的日渐普及,农村留守儿童使用电脑上网和手机上网的机会增多,相当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拥有手机。这一方面方便了与父母的联系,但另一方面,在目前网络环境面临较大问题的形势下,手机上网的留守儿童由于没有父母的监督、引导而面临更大风险。因此,需要净化网络传媒,给儿童提供一个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安全的网络世界。

为此建议:(1)传媒加强自律,传播正能量,引导留守儿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鼓励自立自强。(2)努力为儿童开发提高综合素质、陶冶情操的系列媒介产品,加强公共图书馆对农村儿童包括留守儿童的服务,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好的成长土壤。

(3)加强留守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4)政府部门加强对媒体的管理、监督,保证传媒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传媒环境。

参考文献:

- [1] 和建花. 法国、美国和日本家庭教育支持政策考察[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4, (2): 100 - 106.
-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与基本思路[J]. 改革, 2010, (5): 5 - 20.
- [3] 樊拥军. 关爱留守儿童报道如何改进提升[J]. 中国记者, 2012, (4): 70 - 71.
- [4] 钱洁, 齐学红. 谁定义了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与大众媒介的一次对话[J]. 上海教育科研, 2011, (2): 12 - 14.
- [5] 陈世海, 詹海玉, 陈美君, 文四海. 留守儿童的社会建构: 媒介形象的内容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2): 45 - 51.
- [6] 曹钦. 留守儿童的媒介形象分析——以《中国青年报》为例[J]. 东南传播, 2013, (1): 105 - 108.
- [7] 郝放. 传媒与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J]. 新闻爱好者, 2012, (12): 6 - 7.
- [8] 郑素侠. 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与媒介素养现状研究[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3): 157 - 160.
- [9] 杨靖. 媒介暴力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J]. 当代传媒, 2012, (4): 59 - 61.

The Study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Growth Environmen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HE Jian-hua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Beijing 100730, China)

Abstract: The macrocosmic growth environment of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four kinds as follows: the first one is the leg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suppor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second is the systematical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composed by the reduction measures of these kinds of children in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 third one is the community service environment for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in the background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s in the issues of agriculture, farmer and rural area; the fourth one is the media environment concerning the media publicity of the issue of the left - behind children. This thesis tries to analyze the four environments above and their optimizations respectively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solutions.

Key words: rural area; left - behind child; care service system; environmental optimization

· 女性文化研究 ·

乡村社会的性：一种有缺口的禁忌

宋丽娜

(河南农业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乡村社会的性是一种有缺口的禁忌。性别角色是性正当化的表现^[1],性的日常化彰显了其规范性的一面,性教育机制则是留给性的社会出口,这是性的多重社会属性。乡村社会中的性必须要正当化、日常化、禁忌化,正当化的性体现了社会的正面价值,日常化的性则让性具有了丰富的实践感,禁忌化的性创造了神秘感,并且建构了伦理界限。乡村社会的性就是一个从价值层面到规范层面、从规范层面到实践层面的综合体系。

关键词:乡村社会;性;性别角色;性教育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52-05

一、导言

关于性的话题,社会上的性解放、性伦理、性道德、性教育、同性恋、婚外恋等热议焦点不断。性不仅仅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不仅仅是私人的,也是社会的;不仅仅关涉到个人的生物体验,也与人的感情与精神世界紧密相关;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体验,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组合。也就是说,性具有个体和社会的双重属性。性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之一,这本身已经充分说明了性的社会属性。然而,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讨论性并不等于研究性,社会公众的讨论也并不必然涉及到性的社会属性,热闹的性讨论也许依然与严肃的“性社会学”相距甚远。这里,笔者希望借助社会上关于性讨论的话题,把关于性的研究还原到原点,在乡村社会的语境中来探讨性所经历的话语演变,以及性对于乡村社会的意义;并且以自身的农村社会调查经验和所能获得的资料来

发掘性的社会属性,借此机会建构乡土中的“性社会学”。

社会学研究中的“性”与功能主义传统密不可分,社会学把性行为看成是一种维系社会秩序的变量,在某方面的社会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涂尔干(2006)^[2]关于性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他对于乱伦禁忌起源的解释上:对血液的通行观念是与图腾信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产生了各种仪式,而仪式的日常化与性的结合就是所谓的“外婚制”,由外婚制衍生出来的乱伦禁忌等观念至今仍然是人们道德观念的一部分。涂尔干把性作为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分系统,并且认为性是集结各种社会现象和观念的结点,要解释性以及与性有关的行为和观念,必须要解释关于性的社会系统。马林诺斯基(2002)传承功能主义的学术传统^[3],认为,乱伦禁忌的关键在于维护家庭和维护社会秩序。世代间的性关系,一定会

收稿日期:2014-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的婚恋模式及其风险应对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CSH029)

作者简介:宋丽娜(1983-),女,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社会性别与农村研究。

带来关系的严重紊乱甚至颠覆。在社会学家的解释系统中,性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关于性的问题衍生出了乱伦禁忌、性伦理等社会规范,也派生出了性教育、婚外性等社会问题。然而,以上社会学家的论述都是以简单社会的经验材料为依托,也即他们都采用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事实上,复杂社会和文明社会的性与简单社会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是如何运作的?苏力认同功能主义关于性的社会解释:“性无疑是社会中最具有构建和扩展秩序的变量。”进而他认为,“这种性禁忌关心的是小型社区中的秩序和安定”^[1]。

与功能主义不同,还有一些另外角度的相关研究。潘绥铭(2007)^[4]提出要建构性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主体性,要有其本土的发展空间。刘中一(2011)则具体对乡村社会的性进行了讨论,在他看来,性的乡村社会表达是关于权力与文化的,他对一起乡村通奸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其中有着权力、知识与驯顺人群的再生产机制^{[5][6]}。

与以上的研究有所区别,本文中,笔者把性及与性相关的各事项还原在生活情境(即乡土社会)中,把性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生物属性,以及道德属性共同置于一个乡土社会的文化网络中来讨论。也即,本文关注的不仅仅是性和性事件本身,本研究更注重“乡土社会”的性。乡土社会的性既是普遍的,又是稀缺的;既是随意的,又是严肃的;既是一种仪式,又是一种禁忌。乡村社会中性的张力巧妙地把乡土社会构成一个社会,在其中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乡土社会有特定的性教育渠道,性的传承对于其中的农民来说就是一种有缺口的禁忌。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笔者对豫东曹庄的调研。笔者在2009~2011年数次在曹庄调研,累计调研时间3个月,其中有大量关于性话题的资料。本文就是根据这些经验材料提炼而来的。

二、性别角色

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是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性别角色就是性的隐喻,由性而导致的社会功能的释放就是性别角色。性别角色要求男女各司其职,并且要有相应的社会

姿态和社会形象。性别角色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边界,这种边界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边界,是农民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建构并不断再生产的文化产品,或者明确也或者并不清晰,性别角色有时也可发展成为禁忌。乡土社会中的禁忌是一种负向的社会控制,也即“不能做什么事情”,如果做了成为禁忌的事情就会受到相应的社会惩罚。性禁忌和性别禁忌背后是性伦理在起作用。

在乡土社会,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从小就被灌输给孩子们。许多孩子在孩童时期都会玩“过家家”的游戏,男孩扮演父亲、女孩扮演母亲,模仿大人的行为模式。学校中的教育也使得男女之间的界限截然分开。而乡村社会中真正进行第一次性别启蒙的事件应该是相亲和定亲仪式。曹庄一带的农民有定亲和早婚的习俗,有些孩子很早——小学、中学时代就会被父母安排相亲和定亲,当地农民认为定亲越早越好,因为儿女的婚姻大事被认为是为人父母的重要人生任务,这个任务越早完成越好。相亲和定亲的仪式具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其中建构了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比如,相亲的时候男女双方的至亲会为当事人出主意,评价对方,这个评价的过程就建构了一定的性别标准,男孩子是否稳定可靠,家庭条件是否适当,女孩子是否漂亮可人,能否踏实“过日子”等。一般情况下,男女青年双方在择偶的时候更加看重彼此的外貌、性格,以及内涵;而双方的亲属则要考核对方的家庭条件、生活环境等。当事人讲究“感情”的成分更大,而亲属的考核为婚后性别角色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意见,不过归根结底,当事人还是要回归日后漫长的家庭生活,因而他们能够各自扮演令人满意的家庭性别角色才是一个根本的标准。性别角色扮演的高潮是男女之间缔结婚姻,男娶女嫁,男人成为一个家庭的支柱,而女人则要依附于男人及男人所在的家族和村落,女人要融入男人的生活,男人养家糊口,而女人照管家庭^[7]。

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是公开的,可是其中的内核——性,很多时候是隐秘的、稀缺的、严肃

的、害羞的。在曹庄,白天是开放的,夫妻之间要各行其道,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各自有各自的休闲圈子和谈话对象,吃饭的时候和晚上才是封闭的,属于家庭生活和性。白天陌生人在村庄中调研,根本无法判断谁与谁是一家子,哪怕同样是在公众场合休闲娱乐,你也会发现,每个群体有其各自的圈子:中老年男子组成一个圈子,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谈论农事或者一起打牌;青年男子又组成一个圈子,他们多数谈论打工之事与外界的见闻,倾向于村庄之外;中老年妇女之间则是关于家长里短的闲聊;而年轻的小媳妇们则自觉在一起谈论新奇之事与家长里短。性别和年龄的区分是不同社会圈子的基本标准,而这其中,性别的区分又尤为重要。妇女不能闯入男人的圈子,否则很可能被认为是“疯”,当然,一些有知识有能力的妇女则偶尔可以介入男人的圈子;而男人也不能整日与妇女“混”,否则就会被人看不起,认为这不是一个男人的所为。性别角色是一套关于男女之间的行为规范,它意味着男女之间要各行其道,要有各自的社会姿态。

然而,性别角色的扮演归根结底却要归结到性。性别角色扮演的最终目标在于服从于“性”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其中家庭便是这种秩序最重要的表达。家庭把男女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生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男女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家庭功能。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使得男女之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常规,成为一个规范和一种模式。对于社会而言,由男女组合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家庭成为社会有机组成的最小细胞,家庭规范了社会上关于性的秩序,使得性的社会后果——生育有了持久有效的保障^[8]。

从社会性上来说,只有家庭生活才是男女之间性的出口。乡村社会中,夫妻之间的亲密在家庭范围内被认为是正当的,在任何公共场合都不被允许。夫妻之间的亲密不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来,否则就会被人指指点点,如果有人不在乎也不行,因为这种行为会成为人们饭后闲谈的笑料。虽然农民对于此的谈笑往往并不带有道德评价的意味,但是当事人还会感觉因为个人隐私被公开而“不好意思”,熟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不

愿意这样被人谈论,于是,夫妻之间在公众场合的亲密行为也成为一种禁忌。

不仅仅是夫妻之间在亲密行为上要有所顾忌,其他性别角色之间也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大伯子与弟媳之间就有禁忌,大伯子不能开弟媳的玩笑,不能对弟媳谈论任何关于男女关系的事情。在弟媳的眼中,大伯子要维系一个正面的、严肃的、负责的形象。与此相对,年长或者长辈的女性则可以与年幼或者晚辈的男性开一些较为开放的玩笑,他们之间性的隐喻似乎可为人所接受,比如在哥哥早逝的情况下,嫂子与其弟弟缔结婚姻就被认为是应当的。乡村社会关于性的规范服务于性的家庭属性。

性隐秘在家庭之内,受家庭规范的制约;性成为一个核心,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双重核心。男女之间的性别角色是性的社会属性的正当化延伸。

三、性的日常化

性别角色代表了一种正向的社会控制,是性在乡村社会中的延伸和外显。性在乡村社会也是日常化的、普遍的,甚至是粗俗的。

乡村社会中性的日常化在于它通常与恋爱、生育行为和婚姻生活联系在一起,而恋爱、生育和婚姻是农民日常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曹庄,往往初中毕业辍学在家的青少年就已经有相当部分的人开始谈恋爱,而且这种恋爱的进行往往是双方父母催促的结果。他们如果到了20岁左右的时候还没有订婚,或者没有男女朋友,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当地农民看来,过了20岁还没有订婚就很难再找到伴侣了。这是因为,当地农民都在自觉推动早婚的实践:父母总要为子女的婚姻大事操心,而在父母看来是越早越好。农民对于恋爱和婚姻的推动自然促发了性在乡村社会的扩散。而事实上,青少年之间的性行为往往是在父母的监控之下进行的。对于男孩,父母的监控往往不那么严格,在他们看来,男女未婚同居男孩不会吃亏,所以即便是自家儿子把未过门的媳妇领回家居住,或者在打工地同居,他们也并不会过多干预;对于女孩,父母的监控则要严格许多,因为女孩一旦未婚怀孕,

她们在结婚的时候可能得到的彩礼就会打折扣,而且女孩未婚怀孕在当地依然是丑事,所以,父母甚至在女孩与某男孩订婚之后依然不太愿意让女儿与男孩一同外出打工。

农民对于恋爱、生育与婚姻的讨论极其自然,是其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如果在合适的年龄里没有订婚和生育,他们会极其着急,就像是一项神圣的人生任务未完成,会感到不安。性是隐秘在以上行为背后的事件,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却总是没有人愿意公开讨论它。恋爱通向婚姻,也通向生育,其中的连接点就是性。在农民看来,恋爱是重要的,婚姻是重要的,生育更是重要的,似乎只有性是无足轻重的;而谈恋爱是正常的,婚姻是正常的,生育更是正常的,似乎只有性是不那么正常和自然的。以上的行为总是离不开性行为,性行为的扩散随着这些行为的普遍化而扩散。只是,恋爱、婚姻和生育的日常化和普遍化,与性行为的隐秘与禁忌形成了结构上的张力,这是两条不同的社会通道。

在乡土社会,已婚的男女对于性的谈论是相当赤裸裸的。大部分的男性农民都有随地大小便的经历,相当一部分的中老年男女都有开黄色玩笑的经历;而女人在哺乳的时候露出乳房,谈论乳房也是极其正常的事情。女人的乳房和乳汁甚至成为公共调侃的对象。

性通过恋爱、婚姻和生育行为在社会中成为正常的、普遍的现象。这种性质与农民对于性本身的禁忌、严肃、隐秘等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乡村社会的性教育机制

性是普遍的、日常化的,同时又具有严格的禁忌,是隐秘的。性在乡村社会中通过一定的出口表达出来,这少有的出口就是乡村社会的性教育机制。

从小生活在曹庄的农民在儿时几乎都有“听墙根”的经历,也就是在别人的新婚之夜躲在窗口或者附近的地方听新郎新娘的动静。在村民看来,听墙根是村庄中小孩子的专利。有知情人透漏,听墙根短则持续半个小时,长则几个小时。曹庄的孩子从小一起凑热闹去听墙根,他们从小

便知道,男女新婚之夜会发生一些事情,如果有幸听到了,他们便会兴奋不已。如果在此过程中还发生了什么趣闻,这个听墙根的经历便会成为这些小孩们日后成长经历的一部分,甚至作为整个村庄的社会记忆流传下来。听墙根的经历告诉了孩子们,婚姻与性关联在一起,婚姻是性的合法保证,婚姻之内的性甚至可以冲破禁忌而成为一种“半公开”状态,这便是性的社会释放的正常渠道。除此之外,乡村社会还会流传一些关于性事件的特例,这同样构成了性的社会释放渠道。

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村庄中流传的性故事都是个人的隐私,然而,在乡村社会,这些少数的轶事却总是能够很快传播开来,成为一种公开的秘密。隐私在村庄中并不是一种权利,而发现隐私并且传播隐私反而成为一种权利,因为生活在村庄中的人是没有权利和能力来限制别人传播什么事情的,村民要做的只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成为这饭后的谈资。

在性故事半公开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悖论:性是有禁忌的、隐秘的,可是在某些情况下性又是公开的、被传播的。这其实便是村庄中的性教育机制。通过性故事和听墙根等,村庄中生活的孩子从小便知道了性的存在,并且有可能通过特定的渠道学习到一些关于性的知识;而同时,他们又亲身经历了村庄中对于性的禁忌,感受到性故事的主角在村庄中所承受的社会压力,这会在一定程度上警戒自身:性不能随随便便,一旦自己成为性故事的主角,自身便可能永远带上一个有关于此的社会标签。简言之,这种性教育机制一方面传播了性知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性禁忌,同时,乡村社会的性教育也通过一个自然的过程完成了性的代际传承。总之,乡村社会的性教育实现着五大社会功能:第一,传播性知识;第二,传播性禁忌;第三,为婚姻制度和生育制度做相应的社会准备;第四,对未来的性生活给出一个总体性的方向;第五,维护性伦理,构建性道德。

乡村性教育和性传承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这是一种传统的性社会学。性不仅仅关涉到个人

与隐私,也是存在于社区和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是与恋爱、婚姻、生育等一整套社会制度关联的总体性社会呈献。在乡村社会,性既是日常化的又是禁忌的,这其中的张力通过一定的通道释放出来,是有缺口的禁忌和有禁忌的日常生活。这一整套社会机制是相互嵌入相互配合的。显然,对于乡村社会,这套关于性的社会机制维系了关于性的基本社会特性,规范了性行为,保留了性的社会属性,对乡村社会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五、性的社会属性

乡村社会的性是一种有缺口的禁忌,性别角色是其正当化的表现,性的日常化通道彰显了其规范性的一面,性教育机制则是留给性的社会出口,这便是性的多重社会属性。乡村社会中的人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性”,一方面要使其正当化,另一方面又要使其日常化,同时还得使其禁忌化。正当化的性通向社会的正面价值,日常化的性则让性具有了丰富的实践感,禁忌化的性创造了其神秘感,并且建构了伦理界限。于是,乡村社会的性就是一个从价值层面到规范层面,从规范层面到实践层面的综合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乡村社会的性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嵌入更大的社会体系和文化系统,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

然而,以上的阐释更加适用于稳态的乡村社会;转型期的乡村社会中,性并不必然会保留其原有的社会属性、发挥正向的社会功能。转型期

的乡村社会,流动性增加,开放度增加,打工经济的兴起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深刻影响到了性。新时期的农民对于性的认识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乡村社会中离婚、婚外情等关乎性的社会事件不断出现,性的社会属性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进行性的社会属性的阐释之后,这是另一个值得有关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 [1] 苏力. 纲常、礼仪、称呼与秩序建构——追求对儒家的制度性理解[J]. 中国法学, 2007, (5): 39-51.
- [2] 涂尔干.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78.
- [3] 马林诺斯基. 文化论[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39-43.
- [4] 潘绥铭, 黄盈盈. 主体建构: 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J]. 社会学研究, 2007, (3): 75-84.
- [5] 刘中一. 性的乡村社会表达: 基于北方乡村几起性事件的典型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3): 89-91.
- [6] 刘中一. 权力、知识与驯顺人群的再生产——基于一起乡村通奸事件中规训实践的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 163-168.
- [7] 杨华. 隐藏的世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 293-336.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52-158.

Sex in the Rural Society: a Deficient Taboo

SONG Li-na

(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6, China)

Abstract: Sex in rural society is a deficient taboo. Gender role manifests the legitimacy of sex, and the daily channel of sex demonstrates its normalization to some extent. What is more, the education mechanism on sex is the means of letting people get to know about it, which shows its multiple social attribute. In the rural society, sex must be a legitimate, common yet taboo item. The legitimate factor of sex offers a positive value to the society; the common factor means its practical sense; and its taboo factor creates its mysterious sense and constructs the ethical limits. Sex in the rural society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which covers the perspectives of value, norm and practice.

Key words: rural society; sex; gender role; education mechanism on sex

女性功利性择偶及文化背景分析

冯爱红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太原 030024)

摘要:当前女性择偶功利性特征显著,择偶途径公开、多元,参与人员众多,择偶标准注重物质经济条件,并存在“急婚”“恐婚”等择偶焦虑心理。经济条件虽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和婚恋观,但特定的社会性别文化、婚姻制度、婚姻价值观念以及社会舆论氛围却是形成女性功利性择偶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功利性择偶;婚姻制度;性别习俗;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D6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57-05

近年,大龄青年婚恋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13年末,笔者所在高校工会女工委联合太原市多家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了一场青年交友联谊会,100多位男女青年(其中女性占多数)及其父母对婚姻的功利性选择及焦虑态度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及思考。婚姻不是个人私事,选择谁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并不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喜好和意志。世俗社会通过权利、金钱、就业等决定了两性在家庭及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角色,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往往妄图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本文基于几位当事人的征婚经历,探讨并说明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婚姻价值观以及风俗习惯、社会舆论氛围等是形成当代青年女性功利性择偶的客观社会基础及文化背景。

一、女性择偶途径、标准及心态的功利性特征

(一)多元、公开的“交友”途径,参与人员众多,亲朋好友齐上阵把关

青年恋爱方式经由旧时代“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进入到“两情相悦、自由恋爱”的新阶段后,现在又现“媒人”介绍、“父母四处张罗”热潮。小付,2011年博士毕业成为大学教师。由于常年在外,生活漂泊,工作不稳定,耽搁了恋爱成家,现在年过30岁,“结婚”成为家人和自己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在“联谊会”上,小付及其父母、大姨、大姨夫、表姐一家齐上阵,共同挑选“意中人”。这种方式现在很普遍,如风起云涌的交友类电视节目、交友网站、互联网及各类征婚广告等,各种不同交友媒介充当红娘、月老,使青年人恋爱更加直接、便捷,恋爱交友途径、方式日趋多元。

报刊、杂志开启了媒体公开征婚的先河,而电视、网络直接把征婚搬上屏幕,甚至网恋也大肆流行。中国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交友网站较往年大规模增长,使用率达19.3%。《2009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粉皮书》随机抽样调查了世纪佳缘网站上7.8万名会员,年龄覆盖23~35岁适婚青年,结果显示,互联

收稿日期:2014-12-06

作者简介:冯爱红(1967-),女,太原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性别研究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网已经成为人们寻找、结交结婚对象的首选方式之一,96%的被访者表示可以接受通过互联网寻找结婚对象^[1]。青年人交往借助现代媒介不断掀起“新式”征婚、相亲潮,把征婚者本人,及其父母、亲属和朋友等都裹挟了进来。这一变迁,使曾经那种建立在男女共同学习、劳动、工作过程中“两情相悦、自由恋爱”的“感觉”被弱化,而物质层面的内涵与要求却日益凸显。在现场,“亲友团”不仅为当事人呐喊助威,更要帮当事人挑选、确定恋爱对象,如同“联谊会”上的小付。曾经认为“土”和“落伍”的相亲模式,现在居然很时尚、新潮,用小付的话讲,“让亲人朋友帮忙把关,这样势必将风险控制的最稳妥合适的范围内,婚姻会更多些保障”。

(二)赤裸裸地谈征婚条件,择偶标准明确、具体,直接与物质条件相连

全国妇联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联合某婚恋网站发布的《2010年全国婚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女性择偶更追求对方经济实力,而男性更追求女方外貌;7成女性认为男性必须有房才能结婚。女性追求经济实力与男性追求外貌特征,均是一种功利性的择偶表现。在“联谊会”上,笔者亲见征婚者赤裸裸地直接表白择偶标准,目标对象明确、具体,条件很现实。对女性来说,如工作、收入、房、车等是必须要求男方满足的条件。闫×,高校教师,自身工作、收入都不错,但要求男方必须“有房子,工作单位稳定,收入起码跟自己差不多,家里最好不是农村的,不要有经济负担”。另一女性,小陈,闫×同事,说到自己跟闫×都已33岁,这个年龄找对象是不是不能太挑了,小陈直言不讳:“房子是必需的,如果男方家在太原,有旧房,面积小点都行。起码是本科学历(闫×、小陈均是博士),有稳定工作、正常收入,家人性格好,容易相处。这条件还算太挑?”婚姻离不开物质经济基础,但在交友会现场直接明了地提物质条件,难免给人以“物质女”的功利印象。“联谊会”上,闫×和小陈都一无所获。

100多人的“联谊会”结束后,组织者告诉笔者:“可能有那么两三对儿彼此有点意思会交往下去。大家刚见面,要不不好意思说条件,要不

条件提得太直白,这恐怕都影响联谊效果”。恋爱对象的选择不同于商品买卖,明码标价显然行不通,但仅仅为了相识、联谊,大家没必要到这里来。通常,所谓功利,即过分注重物质条件和某些外在表征。这包括相貌、学历、能力、家庭背景、身体状况、户口、职业、住房、个人收入、地域等多种因素。自古以来寻找配偶时物质条件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还应考虑双方精神层面的需求,比如理想、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等,但这些方面的内容在征婚现场往往似蜻蜓点水,根本不足以与物质偏好相抗衡。有女青年斩钉截铁地说:“除了理想、兴趣,属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还有个人人品、气质、情感等,我也考虑,只不过这些因素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我认为在现实社会,成熟的婚恋观是需要首先考虑物质基础的,因为婚后将面对具体实在的生活内容,经济收入、住房、职业,以及孩子出生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会很麻烦,这些问题最需要解决好。”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人们在当代社会非常现实的功利性婚恋观。

这些年,电视、网络征婚及各种“富豪相亲会”中女性的表现,事实上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接受薪水“女高男低”,相当一部分女性认为择偶对象必须有车有房,而且在择偶时敢想敢说敢干。女性择偶挂钩于物质经济,房子、存款与性格、人品并驾齐驱,“富二代”是最受关注的婚恋对象^[2]。笔者在女性学课堂上随机调研,超过半数的女大学生坦诚愿意嫁给富二代,理由是可以少奋斗很多年;三成多女大学生认同“学得好不如嫁得好”,追求“高富帅”。

(三)急婚、恐婚与婚恋焦虑现象增加,征婚主体趋于年轻化

社会生活中的流行语言往往是社会变革的一面镜子,不同时期的语言反映着特定社会生活的景象。近些年,关于恋爱、结婚等有“闪婚、毕婚、恐婚、婚活族”这样一些新名词出现,这些名词反映了嬗变中的青年婚恋观,也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急婚心理。一般来说,男性22~30岁是婚恋活动的参与主体,而女性比男性通常低2~3岁,这与我国《婚姻法》法定结婚年龄有关,也与传统

习俗有很大关系。但现在所谓的“剩男”“剩女”增多,无论男女,一旦接近30岁还没有结婚甚至没有确定恋爱对象就变得很焦虑,对婚姻要求提速,迅速加入征婚者行列。在校“联谊会”上有二十五六岁左右的年轻人,当问她们为何参加这样的活动时,她们回答“不小了,得赶紧找呀”。这些较年轻女性的加入,一方面说明相亲有年轻化、低龄化趋势;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婚恋竞争,使年龄稍大些的女性的危机感更强。

在征婚中,家长比子女更加焦灼不安,上述小付一家便是典型的例子。据小付父亲说,“每周末公园自发形成的帮子女相亲聚会,我和老伴已经成了常客”。现在好多城市公园自发形成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父母帮子女相亲大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许多中老年人儿女婚事忙碌操心,这也是现在急婚、恐婚、婚恋焦虑现象加剧的表现。

二、形成女性功利性择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

(一) 婚姻制度习俗对女性的束缚

婚姻是一种男女之间择偶的制度性安排。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婚姻制度起源于财产私有、男性统治和财产在父系血缘间传承的需求,因此婚姻一开始就在男女两性间通过社会安排而结合,它不完全是个人事务。通过社会安排,婚姻让男性和女性结成高度社会化的生活合作关系,同时承担高度社会化的社会责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享有一定的社会资源。对个人而言,经过漫长的历史文化变迁,始终没能改变婚姻社会性对个人婚姻的束缚,并且还形成强大的文化认同与文化强制,如“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习俗,这些观念对男女适龄青年提出了必须结婚的要求。

在“联谊会”上,包括社会上的各种征婚活动中,一旦走进征婚行列的男女青年,一般都是到了结婚年龄而尚无合适对象却不愿放弃任何机会的人,他们普遍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要结婚成家”。小付、闫×等明确表示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持赞成态度。不仅如此,因受“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观念的影响,她们中相当一部分人这些年饱受各种逼婚、催婚、问婚等折磨,或父

母、或家人、或朋友总会在有意无意间“善意”地问起或提及婚恋的事情,让她们倍感苦恼与无奈,所以,“巴不得赶紧找个人嫁了”。

婚姻历来被看成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个人,而且往往涉及家庭幸福。在传统文化视野中,婚姻还承担着生育的功能,婚姻的价值立足于此,要求女性必须在合适的年龄段完成婚姻的使命,否则,“年龄不等人”。女性身负生育重任,生育将延续整个家庭的血脉,也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这给女性造成很大精神压力,也导致了“急婚”行为的产生。

(二) 作为生活资本——婚姻的功利性价值

从理论上讲,婚姻是男女双方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结成夫妻并承担相应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制度。但对个人而言,婚姻是结成夫妻的男女双方,包括双方家庭在结婚前后通过物质、情感等多方面投入,产出的一种社会资本^[3]。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认为投资婚姻是一个人获取幸福生活的工具和必要手段。观察发现,男女结合组成家庭,夫妻双方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发展机会、财富等会远远高于单身男女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发展机会和财富,且拥有财富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单身男女单枪匹马的个人奋斗。有学者研究,仅仅从积累财富的角度看,投资婚姻是人生最大的一笔投资,美满的婚姻是积聚财富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夫妻两人过日子比一个人奋斗可以更快地积累家庭财富^[4]。不可否认,今天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但同男性相比,无论整体社会地位还是单纯拥有财富量的多少,女性都显著落后于男性。因此,期待婚姻作为生活成本投入进而获得高质量生活回报,甚至追求婚姻生活更高“附加值”,这种婚姻对女性不可避免地具有功利性意义。有学者对25年来青年人择偶标准变化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自1994年以来,征婚者对于经济收入的价值评价显著提升^[5]。女青年希望通过婚姻,找个有经济实力的老公,以满足自身的各种消费需求,对男方学历和家庭背景也有更多考虑,认为学历、收入高,家庭背景好意味着家底殷实,家庭社会地位优越,是女青年的理想选择^[6]。

当婚姻与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个人生存发展机会等结合更为紧密时,婚姻更具现实意义,对

处于劣势的女性更具有吸引力。第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关于“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说法,男性40.7%、女性48.0%持认同态度。与2000年相比,男女两性对此认同的比例分别回升了10.5%和10.7%个百分点^[7]。世俗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是由权利、金钱等决定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物质至上的社会风气,使爱情和婚姻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三)择偶梯队效应,男性优质资源稀缺

婚姻是获取权利、资源、地位的新渠道,但中国历来有从生理性别上确定女性地位的民俗传统,女性家庭成员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8]，“男主女从”的文化观念自然形成婚姻配对的“男高女低”模式,也称之为择偶梯队理论。女性习惯于在择偶时往上找,倾向于选择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等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的男性;而男性在选择恋爱对象时又恰恰相反,较倾向于选择各方面条件低于自己的女性。按照择偶梯度效应,男性往下找,目的是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控制权,在家庭中建立并维护男性的绝对尊严与地位;而女性往上找,就是要寻找依靠,借助男性的优势地位建立自己“稳定”或“幸福”的家庭生活,并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地位和尊严。处于社会底部的,如农村或城市贫困男性,自然没有女性愿意选择。而如果女性自身各方面条件较好,本身已经处于社会生活中的较高阶层,再往上选择,优秀的男性资源势必更稀缺、有限,造成择偶资源紧张。学校“联谊会”上女性无一不是高学历,甚至一些女性还具有高职称,她们本身职业地位、工资收入等条件优越,但在择偶时仍将目标定为比自己更优秀的男性,或者最起码条件应跟自己差不多。几位女博士坦言,“学历不一定必须是博士,但起码应该是本科以上,工作单位、工资收入等就不能差了”。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心理上的不安全感,普遍认为依赖或借助男性的力量可以获得相应的生存条件和资本,甚至过上更为富足、体面的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享有一定的声望和地位。这些年一些明星美女争嫁“豪门”,一夜间名声鹊起,身份地位尊贵无比。这些例子似乎告诉女性嫁“优质男”更容易获得成功,获得社会尊重。另外,“男主女从”“男强女

弱”符合传统性别文化对两性性别角色的评价标准。一位单身女性,即使个人事业很成功,也无法获得拥有美满家庭的优越感及成就感。

(四)女性“年轻貌美”最具婚恋竞争性

尽管从社会经济地位看,男性一般在婚姻中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在婚姻市场上,女性“年轻貌美”是最有力的竞争性条件和资本,过时将贬值。许多25岁左右的年轻女性迫不及待地参加征婚,有些甚至在大学期间就多次相亲。她们之所以成为“急婚”一族,原因复杂。有的年轻女孩儿正如前所述唯恐优质男性旁落他人,很早就考虑找对象。当今女性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女大学生就业竞争力不及男生,就把结婚当成缓解就业压力的最佳途径,以结婚实现“曲线就业”。女大学生“急婚族”日益壮大,一些女大学生刚毕业就结婚,被称“毕婚族”。另外,这种“急婚”现象,还有一个原因,即女性的“年轻”。曾有学者研究表明,在择偶中,女性的资源跟男性相比还包括肤色、长相、体型、相对年龄以及持家能力等,这使一些女性可以以她们的美貌换取男性的家世、成就或向上流动的潜力^[9]。关于美貌,人越年轻,越有优势;随着年龄增长,长相、体型、美貌等这些优势将渐渐消失,甚至不存在。所以,按照传统观点“年轻貌美”是女性婚姻中最有竞争性的条件,促使女性试图以年轻的资本寻求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按照传统两性的审美标准,男性往往凭借其才情、权势、地位和金钱占上风,年龄偏大,这些方面成就可能会越大,对女性也越具吸引力。而对女性的审美却停留在其自然属性上,女性往往凭借其美丽外表向男性展示,而男性也更关注女性外貌。自然,在青春年少时,女性最具性魅力,也最具备外貌的审美价值。现在大学校园里,各种淑女班、礼仪班、形象气质学习训练班异常火爆,许多女大学生不惜花大力气注重修饰打扮,购买高档化妆品来展示自己的年轻及提升所谓的“品味”,目的就是吸引所谓成功男士的眼球。甚至有调查研究认为,“拥有财富和地位的男性与拥有青春美貌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的结合是资源的最佳配置”^[10]。这说明男性以貌

取人、女性以色事人的审美观仍为主导价值观。

(五)大众传媒舆论为复杂婚恋观推波助澜

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我国传媒事业取得显著发展,它的发展对文化传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近几年,街头巷尾百姓热议的征婚类电视节目,如“非诚勿扰”,在观众中享有高知晓率及关注度。伴随着节目的播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的物质至上的择偶观受到社会上一些青年女性的赞赏和追捧。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热播影视剧,如《蜗居》中“小三”海藻放弃深爱自己但却一无所有的小男生,而选择了事业成功、能够屡屡帮自己解决人生难题的宋思明。青春偶像剧《裸婚时代》,看似主张对抗物质,相信真爱,但片子中面对现实生活里必备的房子、车子,以及婆媳关系等现实问题,演员的真情演绎,自然又把人带回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纠结、矛盾与困惑中。《咱们结婚吧》更是写大龄单身女性最终经历几多波折与恐婚男恋爱结婚。剧中涉及当代青年急婚、恐婚现象,包括结婚与生育、就业与工作等矛盾问题,让人看后唏嘘不已。

各种婚恋节目信息量大,参与人员成分复杂,当事人的婚恋价值观形形色色,经媒体广泛传播而在社会上引起热议,一些年轻女性对片中、剧中人物效仿、学习。许多影视剧本本身立场、观点模糊,剧情追求离奇曲折,脱离现实,给当代青年造成较大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媒体经常对一些影视体育明星、艺人嫁豪门、奢侈婚礼等八

卦大肆渲染、深度报道,这种报道更是推波助澜,使各种复杂、多元婚恋价值观大行其道。大众传媒营造了复杂的社会文化氛围,对当代女青年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 [1] 易运文. 当代男女婚恋观有什么轨迹[N]. 光明日报, 2010-01-28.
- [2] 2010年中国青年网民婚恋观调查报告[EB/OL]. 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view/a3c0f836a32d7375a41780c4.html>.
- [3] 谭琳, 李军峰. 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 (4): 5-11.
- [4] 乔磊. 婚姻是美国女性最大的投资[EB/OL]. 和讯网, 2012-03-27.
- [5] 曾燕波. 青年八大热点问题[M]. 上海: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37.
- [6] 曹彦. 当前女青年婚恋观的偏差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J]. 青少年研究, 2011, (3): 25-28.
- [7]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课题组.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 (6): 7-17.
- [8] 董晓萍. 说话的文化——民俗传统与现代生活[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2. 11.
- [9] 张国刚. 家庭与社会[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64.
- [10] 秦美珠. 女大学生急婚行为的动因分析——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1, (1): 24-29.

An Analysis on the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 of Women and Its Cultural Background

FENG Ai-hong

(Taiy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aiyuan 030024,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the utilitarian characteristic of women's mate selection is significant. The means of mate selection become open and multivariant with too many participates in blind dates. Furthermore, the standards of mate selection always emphasiz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each other. There are even various anxieties in mate selection, such as "urgency of marriage", "fear of marriage", etc. Although the economic factor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mate selection, which change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love and marriage, the specific social gender culture, marriage system, marriage values and social public opinion mainly result in women's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 and their psychological imbalance.

Key words: utilitarian mate selection; marriage system; gender custom; cultural background.

·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

莫言长篇小说叙事与女性化思维之隐在关系论

王洪岳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莫言长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在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创作中别具一格,主要体现在其借鉴了中国古代绘画的散点透视法,并结合了幻想式心理分析方式和齐文化中鬼神信仰叙事,这样就增强了其长篇小说既丰富又独特的叙述张力。这种以散点透视为核心的多维叙述方式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女性化有着隐秘的内在关系。这是莫言长篇小说叙述的美学特点,符合现代小说艺术的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莫言;长篇小说;叙事;女性思维;新散点透视法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62-06

莫言的长篇小说叙述方法有着很别致的地方。细究之,就在于他采用了一种既不同于西方现代派小说的纯粹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等意识流手法或哲理小说创作方法,也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叙述加“绞麻花”式叙述相结合的创作手法。这种方法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又充分借鉴和融合了多种技巧和方法后所形成的新的叙述方式,其背后既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心理特色,又有着很强烈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独创性。

中国绘画自有其独特而内在的画法,这就是“散点透视”。散点透视不是单一焦点透视的产物,而是多点“游移”的视觉感受重新组合的结果(如《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等)。中国传统小说中有此类安排,即不能在同一时间或叙述中齐表诸事,只能按照一定的叙述顺序(叙述时间顺序),花开两朵(或几朵)各表一枝,从而达到使

小说叙述摇曳生姿、交错延生的艺术效果。

西方传统长篇小说与其绘画在内在肌理方面是一致的,其焦点透视般(聚焦)的叙述具有空间的深邃感和聚焦的空间感,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哈代等人的小说景物描写、人物描写与叙述的基本走向便是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的文学翻版,这是文学对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近代科学方法和绘画艺术加以运用或汇通的结果。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意识流(心理分析)小说虽然打破了这种聚焦方式,但是却把叙述的基本“点”立足于某个人物的大脑(心理),由此生发出对世界、人生、存在等各方面的看法、场景、心理、人格等等。这在根本上看还是一种有一个“焦点”的叙述方式,只不过是聚焦透视法的现代心理变形而已。

我们不能确定莫言长篇小说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对散点透视这种中国传统绘画方法和技巧进行了运用,但我们能够在其中寻绎到一种

收稿日期:2014-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作者简介:王洪岳(1963-),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美学、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类似于散点透视的方法或思维方式。当然他不是简单地套用散点透视法,而是配以凸出的幻觉或梦幻手法(而这样的叙述往往打乱了叙述的时间顺序或逻辑,带来了某些事件、情节、故事的特别强调,在这些地方反复回忆、勾陈、萦绕、跌宕起伏,就大致构成了莫言长篇小说叙述的基本特征)。这显然造成了其小说叙述的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而不同于西方焦点透视的方法。金汉先生早在1986年莫言尚未创作出其长篇小说的时候就提到,莫言小说里有“那打破时空观念,多元、多维、‘散点透视’的立体时空叙事结构”^[1]。莫言长篇小说的散点透视特点愈加明显和突出,当然其叙事不能说没有聚焦,但往往比较飘忽和游移,并不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不能使整个篇幅都集中于某一焦点进行叙述,正如中国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或者说其聚焦是非典型的、发散的、多点的,各种聚焦方式——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等——交错甚至杂糅,往往在不经意间叙述的视角就跳到了另外的“点”上。这种叙述方式尤其体现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莫言的长篇小说当中。比如,《天堂蒜薹之歌》,名义上是写震惊全国的社会事件——山东某地发生的蒜薹事件,但其实是写蒜薹事件及其背后深层的体制制度和政教伦理给农民带来的戕害与恐惧,是对农民精神和心理世界的深层揭示与描写,它已经属于现代主义文学的范畴,而不是有人认为是那样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作家调动了当时他已经掌握的各种叙述技巧,除了少量篇幅和文字类似于零聚焦或全知视角的叙述之外,占分量最多、也最为重要的就是“散点透视”,并结合了包括内聚焦、内心幻想或梦境描写等叙述手法。小说中的叙述“视点”不像焦点透视手法那样“聚焦于”一个“点”(消失点),而是有多个“视点”。这些“视点”包括高羊(被捕、卖蒜薹、被挤进县政府而打砸、被关进看守所、埋葬母亲遗体、老婆住院生儿子等),高马(与金菊恋爱、私奔逃亡、被抓回遭毒打、被追捕、怀孕的金菊上吊自杀身亡引发他的愤怒砍杀乡政府大院里的植物发泄、最后再次逃跑时被枪

杀等),四婶(稀里糊涂地冲击县政府而被捕、被关押进看守所、为儿女操办三连环的换亲最终鸡飞蛋打、老伴儿四叔被撞死、俩儿子分家、女儿金菊自杀等),金菊(她同高马的恋情及悲惨的遭际、怀了孕而得不到任何的照顾、她与肚子中的胎儿的“对话”、最后悲苦绝望而上吊自杀),还有回乡探亲的军官,瞎子张扣的说唱及报章上对蒜薹事件的报道,视点众多,但散而不乱,原因就在于这种散点透视法同人物幻觉化、心理化的视点紧紧围绕事件中人物的悲惨遭际和卑微而屈辱的精神状态而展开。前面4个基本的叙述“视点”作为小说这种文字排列所构成的时间的综合艺术来说,不是静态的,而是游移的、滑动的。而且这些游移的“点”不仅仅局限于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而更多是对人物的感觉世界和其内心世界的刻写。对于感觉世界和内心世界也不是那种条理化的心理描写,而是如梵高绘画般的起伏与飘忽、充满了激情般的律动和主观化的色彩感。但莫言对感觉、幻觉、梦幻的描写并非仅仅取法于西方作家艺术家,而更为重要的来源当为中国自己的传统。这既有齐文化瑰丽奇特的想象力之赐,也有唐传奇以降的小说传统之滋养。中国人专意于小说之开始的唐传奇中就有很多关于梦的篇章,真假难辨、虚实相融,颇为可观,这种传统直到《聊斋志异》仍不绝如缕。感觉、幻觉、梦幻、魔幻叙述在莫言的短中篇小说中比比皆是,在其长篇小说中更是频繁出现,不但增加了小说纵横捭阖的自由度,增强了小说的艺术张力,同时也赋予了小说对于社会和人性的“真实”性描写的审美效果。这是深具现代性的小说写法和小说观的表达,而非德国汉学家顾彬所说的那样,讲故事的莫言小说是落后的、背时的。《天堂蒜薹之歌》中随着蒜薹事件的发酵,在其中四叔之死的场景就逐渐成了一个交汇点,不但通过在场者高羊的眼睛和感觉多有描述,而且不在场者四婶的幻觉也总是出现老伴儿惨死的场景,四婶梦幻中出现了四叔之死的种种可能的情节。这是以幻写实的艺术手法。此外,还有全知视角叙述四叔之死,这是“假实证幻”^[2]的艺术手法。对于四叔惨死场景的多重多侧面多维度的描写

体现了叙述者刻意反传统美学的姿态,而追求审美与审丑合一的生命全息式、包容式的美学(感性学)意向。蒜薹事件在小说中被分解为诸多的点与块——人物和小事件,这些人与事就是叙述的点或块,一个个点与块的叙述,无论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实在的还是虚幻的,全知的还是限知的,均构成了小说对一个个场景或梦境的具体而微的透视方式。这类似于散点透视的视点之于中国绘画的景象,众多的景象(场景、幻境、梦境等)构成了小说的文本内容。这种复杂的、立体的、全息的叙述方式实际上是借鉴并改造了“散点透视”的叙述方式,已经不同于古典小说那种“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绞麻花”式叙述,而是既有一定的外部情节的全知叙述,更有大量从某点(某人物)出发的内心意识流般的限知叙述,从而写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底层农民的贫穷悲苦与精神被扭曲的真实存在。这说明,现代主义小说同样和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可以对现实和人的存在的真实性进行深入的揭示与批判。

此种散点透视叙述方法和感觉-幻觉式叙述方法结合的根源在于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具体体现在思维的儿童化、感觉化、混沌式甚至女性化的思维方式。并且由于莫言较少受到当时的正统教育而恰恰避免了教条化、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等僵化思维模式的影响。而且其长篇小说的创作在其短篇、中篇小说基础上进行,这使其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与突出这种儿童化、感觉化、混沌化和女性化思维方式的特长,避免了小说艺术形式被理念化、概念化、公式化、模式化的弊端,由此也尽量避免了“实用理性”(李泽厚语)的浸染和侵蚀。实用理性是一种以实现自己利益、判断和处理利害关系为鹄的的所谓理性,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带有很浓厚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在当代的翻版即是日益织就的“政教伦理”之网,简而言之就是处理中国式关系网的关乎利害算计的理性),它既非康德所指称的真理性的理性(诉求)或纯粹理性,也非康德和基督教作为真正道德之基础的实践理性。因此,莫言少年失学因而较少受到这种实用理性、政教伦理教育和影响正

是其不幸中之大幸,这使其保持和较易进入一个以感性、感觉为主体,以混沌式思维为特征,以生命的全息展现为目标的小说创作的新境地。

这种混沌式、全息式思维与女性化思维息息相关。当代文化人类学者户晓辉研究员在《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一书中,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主要是食物来源)的不同比较分析了中欧两大民族之间的文化和审美心理的不同取向。中国民族不同于欧洲民族,前者为女性化特征明显的民族(一般来说,其谋生以土地耕作、采集、农业为主,食物以谷类为主,其人体光洁无毛或少毛。因此,其民饮食文化发达,整个文化偏于女性化和感性化);后者为男性化明显的民族(一般来说,其谋生以渔猎、航海、商业贸易为主,食物以肉食为主,其人体胸毛乃至整个体毛发达。因此,其民性爱文化和身体美学发达,整个文化偏于男性化和理性化)。而感性的、感觉至上的、变幻多端的、跳跃性的思维是一种无理性或非理性思维的方式,它更多地属于女性和儿童。女性化的文化正表现为这种感性化、感觉化、变幻多端和跳跃性等方面,而与理性相去较远,因此以感性、感觉为内容和基础的心理美学发达^[3]。总之,作为思维方式,西方民族偏于理性,带有男性化的特点;中国民族偏于感性,带有女性化的特点。上述特点体现于近现代长篇小说创作当中,就带来了中西方小说艺术的重大区别。西方偏重于或宏大或细腻的精雕细刻式叙述,故事的推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结构严谨,如司汤达的《红与黑》,那种叙述及结构的精妙、严谨出神入化。而中国则偏重于散漫的、游移的、跳跃性的叙述视点和游记式的编年史叙述结构,如刘鹗的《老残游记》没有一个贯穿全文故事情节^[4],小说虽然是以一个人物(老残,有时候又有一个代述人申子平替老残叙述,其实是老残的耳目和延伸)来进行(限知)叙述,但其游走的观察视角类似于散点透视的叙述推进方式,如长幅画卷那般展开,只不过《老残游记》作为小说时间因素(叙述线索)往往压倒空间因素,空间的挪移为叙述时间服务,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自然要求对情节(时间)这种要素的关注必须超过对场景(空间)的展示。这依然带有我们民族散点透视的思维特征。

莫言长篇小说继承了古代中国绘画和近代中国小说叙述的艺术手法,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手法,创造了类似于散点透视又超乎其上的新型的叙述方式。其之所以有这种儿童化、感觉化、混沌式甚至女性化的思维特征,就源于先民文化乃至生理基因,也与莫言个人的身世经历关系密切。民族文化中占居主流的儒道等诸家不是论语式的说话、聊天语体,就是朴素的辩证关于道的玄学或天马行空般的浪漫畅想,而民间百姓依靠鬼神信仰或成仙成道长生不老向往而得到慰藉或寄托。莫言无疑打上了上述文化的基因。从其个人的成长史来看,他11岁即失学,在山东高密东北乡广袤的草甸上孤独地放牧着牛羊,他的世界是靠听觉、味觉、视觉、嗅觉和肤觉等各种感觉感官来捕捉的,可谓全息的混沌的充满生命整体感受的世界。他说过自己小时候常常是“用耳朵阅读”的,他靠调动自己的所有感官来感受、体验这个完全不能给他带来童年温馨和幸福的世界。十一二岁的莫言为了一个红萝卜而遭受几百号人的批斗和羞辱,遭受父亲和二哥的毒打,他的母亲为了一点粮食也受尽屈辱,被逼下跪,遭人打骂,他的上中农的家庭出身和大爷爷的地主身份、堂叔出走台湾等等,都给少年时代的莫言带来了屈辱、卑微、压抑的切身感受。他在家中排行老么,一直受到众多的祖辈、父辈、兄长、姐姐、姑姑等的或关爱或压制。在日本人侵略掠夺的时候,听到口风的爷爷早就跑得无影无踪,只有他的奶奶管戴氏勇敢地留下来照顾老人和幼小的孩子们;母亲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的形象和父亲那种无处宣泄的怨怒都倾泻到孩子们身上的做派等等,都给少儿时期的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印记。从大的方面来看,纵观近代史,就是我们民族遭受列强欺侮、屠戮、剥夺的历史,尤其是从《马关条约》到全面抗战,往深处想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男人们活得不像男人所致,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劣根性,而这劣根性笔者以为主要体现在中国的男人们身上。这一切使少年管谟业形成了对男人和女性角色的鲜明的对照性看法——整体上看,这让他对女性的看法远远好于对男性的看法,他笔下的女性(奶奶、母亲、姐姐等等)都是敢爱敢恨、勇敢追求自己幸福和性爱的角色,而男人们则

多为窝囊、懦弱、病怏怏的样子。在社会上,在公社里,莫言是最小的社员,早年的饥饿、孤独、屈辱、恐惧还有长相丑陋等等使他倍感无望和苦闷。这一切都导致了他不能够明显地在大人和长者面前自由而理性地表达自己,孤独和恐惧使他只能在广袤的田野里同牛羊和鸟儿甚至小草树木河流池塘等自然物对话(这也养成了他的万物有灵论的泛神论思想),尤其是傍晚返家时夜幕降临,要靠自言自语不断地诉说或歌唱来摆脱孤独和恐惧,从而小小年纪就成了话痨。为此他说过,小时候最难受的是听到母亲叹息,因为母亲因为他的话痨或者因家中断粮而担惊受怕。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于是他就转而缄默“莫言”、善于幻想、想象;但话痨的毛病和心理得以补偿、转化,在后来的写作(作品)中则显得没有节制、滔滔不绝。这看似两个方面、两种性格特点,实则与他少年时代所遭受的经历有关,仍然是一个方面的不同侧面的体现。然而,不曾想缄口“莫言”、自称“令人讨厌”的管谟业最终阴差阳错地、也许是必然地成为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大作家莫言。

说莫言的长篇小说叙述有一种幼稚化、混沌化、女性化特征,这里丝毫没有贬低和污蔑女性的意思。恰恰相反,这既是对莫言长篇小说创作美学特征的一种描述和判断,也是对其成就的褒奖性评价。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伦理——实用理性(如上所说乃一种伪理性,实则还是反理性或无理性)过于发达,导致了对整个社会的感性、情感、艺术创造力的压制、封闭、窒息状况。且不论古之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就说现当代的重男轻女,妻子必生育了男孩才不再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莫言借《天堂蒜薹之歌》人物之口提到了国人生育观、男女观的悖论: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牲口生雌的、母的,不希望它生雄的、公的;却都希望自己的女人生儿子,但是生儿子又必须靠女人。这种悖论般的、畸形的生育观和人性观几千年来一直陈陈相因,至今还紧箍咒式地控制着中国的男男女女,岂非荒唐至极邪哉?!因此,张扬包容的、感性的也就是女性化的思维精神及小说叙述方法,正可以冲破父权—男权制度及其观念对于国人的身体压迫和思想禁锢,从而使被束缚

的心理、精神、思维获得自由、活力和创造力。古代真正的大艺术家们无不是试图冲破这种桎梏的先行者。莫言亦是如此。

由是再观莫言长篇小说那种经过改造了的散点透视的叙述方法,会进一步发现其所包含的那种儿童化、童稚化的叙述姿态正好可以解构中国正统的、成人化的、说教式的叙述模式;其感觉化、梦幻化的叙述生成机制,正好可以解构固化的伦理理性、政教伦理的(伪)道德化叙述模式;而其女性化的叙述方式正好可以解构那种男性的、男权的等级化叙述模式。如果再考虑到其民间狂欢化叙述对于打破庙堂的、钦定的、等级制的叙述“法则”的作用,就更能清楚地发现莫言长篇小说叙述方式恰恰与母性的或女性化的叙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女性化叙述是伴随着新生命的降生而呈现出美丑与共、感性至上、生命为本的美学特点的。《四十一炮》采用的是儿童叙述视角和姿态,讲述“我父亲”和“我母亲”的故事;副线写一个老和尚强烈追逐“食”与“色”的传奇人生。《丰乳肥臀》更是这种小说观、美学观的集中体现。小说中母亲上官鲁氏生孩子和上官家的毛驴下崽同一时间发生,而上官家的人们关心的不是人的诞生,而是小毛驴的出生。人的生命和血污,毛驴的生命与血污,全都搅和到一块,整个全息式地显现了,人并不比动物高贵多少。而小说中上官鲁氏唯一的儿子上官金童一直处于吃奶、寻乳、恋乳的儿童心理状态,虽然其肉身早已成人,但其心理、精神发育一直处于柔弱的、阴性的儿童状态。《生死疲劳》采取了3个叙述线索或角度——蓝千岁、蓝解放和“莫言”,均为第一人称;而有时候又用了类似于全知的叙述方式,写了高密东北乡1947年至2000年,地主西门闹、农民蓝脸的生存挣扎与抗争的故事,重构了既是地主又是善人的西门闹、全省乃至全国唯一的单干户蓝脸、老革命但脑筋僵化的村支书洪岳泰、地主崽子又成雇农继子的西门金龙(蓝金龙)等的“个性化历史”。情节和叙述都具荒诞性和悲剧性。仅以第四章和第五章为例来看该小说的叙述特点:其叙述视角腾挪转换,让人眼花缭乱,第四章开头:“1954年10月1日,既是国庆日,又是高密东北乡第一家农业合作社成立的日子。那天,也是莫言那

小子出生的日子。”这里第一句似乎是全知叙述,第二句就是带有一种评价性的叙述句。紧接着就是叙述者“我”(西门闹第一次转世轮回的小毛驴),本来这可以成为限知叙述或聚焦叙述,但是由于“我”(西门闹,有时候又自称西门闹——因为“只要沉浸在西门闹的记忆里,这些人我全都认识”)又可多面多重的变换,可以自由地描写、叙述、抒情和议论,变成了似乎是全知叙述。不过,西门闹及后来的西门牛、西门猪、西门狗、西门猴和转世成人的大头儿蓝千岁这一叙述者及其的变形体的叙述本身即带有某种荒唐性,再加上往往沉浸到回忆中充满冤情的西门闹的叙述,就把现实和历史、今生与来世、写实和虚幻、常态与变态的界限彻底打破了,带有卡夫卡式的变形叙述、马尔克斯的魔幻叙述,但根子还是源于中国民间佛、道教思想基础上的鬼神叙述,从而取得一种化腐朽为神奇、化沉重为轻盈、化神圣为狂欢的多声部艺术交响效果。在写完“蓝脸家那头驴会飞的传说,至今还被西门屯里那些老人们提起”之后,第五章的结尾还加了一句“当然,在莫言那厮的小说里,更被描写得神乎其神”,这种元叙述色彩更是增加了叙述的复杂性。总之,小说中驴、牛、猪、狗、猴和大头婴儿蓝千岁的“六道轮回”式叙述,再加之“莫言”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出现,使叙述出现了“复调”或多层次,不仅挑战了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叙述法则,也是对中国传统小说叙述的极大挑战和丰富,从而兼具和融合了“魔幻”(幻想)与“志异”的写作手法。《蛙》以书信和戏剧的形式,写了姑姑大半生的节生和接生的医生生涯。这部小说同样有散点透视般的叙述方法和人物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的内在视点叙述相结合的特点。给人看病夜晚返家的姑姑碰到了铺天盖地的无数青蛙的阻碍,这样的场景壮观而又使姑姑感到震惊不已。如果说姑姑作为医生工作的前半部分为带有男权化、体制内的科层理性所制约,专门为完成政府计生任务而拼搏奋斗,那么其后半部分则试图回归、还原自己作为产科女医生、女人的角色。晚年的姑姑开始了对节育、为执行上级政策而实施种种逼迫怀孕妇女堕胎(虐杀胎儿)方式的痛苦忏悔,这与她的侄儿、作家蝌蚪的忏悔相互辉映。之所以在宗教意识很不发达

的情况下,以科学理性及科层理性起步的医生姑姑晚年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忏悔意识,究其根源乃在于中国人的“信仰本根,夙在巫鬼”^[2]。愈近晚年,姑姑的灵魂愈得不到安宁,大量青蛙铺天盖地般地挡住了她返家的道路的场景,让她胆战心惊,于是她思想中释道、鬼神、因果报应等因素逐渐占了上风,她开始抛弃曾经坚信不疑、执行不误、视若真理的政策、路线、方针、原则,而接受或采纳了超理性的、能够抚慰人心的佛教神灵思想,从此她开始拥有了心灵的安宁和迟来的爱情。这恰恰是她走出男性主导的科层、体制化理性,走出男尊女卑的伦理理性,走向正常女性角色所带来的必然善果。这是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地方,中国文化和文学由此拥有了具有厚度的忏悔维度和具有深度的反思维度。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莫言明确指出:“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这对于打破无神论给文学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造成的干扰,对于丰富文学的精神品格、促进艺术表达的多样化,无疑具有很重要的导向作用。《蛙》正是体现莫言万物有灵论思想的杰作。

莫言长篇小说的叙述方法与女性化的思维方法的关系并非显在的,而是隐性的,是我们通过分析其长篇小说叙述文本而发现的叙述特征。长篇小说作为当代最能建构和贮藏各种艺术手法和技巧的宝库,是经过了后现代洗礼的当代人审美的重

要资源。而莫言的长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言,叙述的“结构就是政治”。这句话也可理解为,政治不仅仅是激烈的斗争,而是包括思维变革、艺术变革、方法变革与技术变革在内的生命存在的全息运动。莫言长篇小说那种游移的散点透视叙述和潜伏的、内在化的、幻觉化的叙述相结合的艺术特质,所体现的正是反叛日益科层化、理性化尤其是土产的伦理理性(实用理性)的艰难努力的艺术结晶。莫言虽为男性作家,但是其长篇小说所表现的女性形象的大胆、泼辣、真诚、率性与男性形象相对来说的畏缩、彷徨、自私、虚伪等性格特点,以及文本的叙述特点及背后的思维方式、审美方式无不有着浓烈的女性化色彩,从中也可看出他的长篇小说贯穿了一种为女性、女权辩护的意识。

参考文献:

- [1] 金汉. 评近年小说新潮中的莫言——兼论当今“新潮小说”的某种趋优走向[J]. 浙江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7, (1): 44-50.
- [2]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51-57.
- [3] 户晓辉. 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0-42.
- [4] 徐鹏绪. 论《老残游记》的艺术形式革新[J]. 东方论坛, (2): 52-58.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arration of Mo Yan's Full-length Novels and His Feminized Thoughts

WANG Hong-yue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on mode of Mo Yan's full-length novels is quite unique among those in the contemporary vanguard novels in China, because it employs the cavalier perspective in the painting in ancient China with the means of imaginary psychoanalysis, and it utilizes the narration mode under the belief of the supernatural beings in Qi Culture of ancient China. As a result, the unique and colorful narration mode in his full-length novels comes into being. This multi-dimensional narration mode with the cavalier perspective as the core connects with the feminization in Chinese-style thoughts in a secret and internal way. Thi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in the narration mode of Mo Yan's full-length novels conform to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 art of novel, which is worth being discussed a lot.

Key words: Mo Yan; full-length novel; narration; feminized thought; new cavalier perspective

·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

从“女人”到“人”

——论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宁明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从“我奶奶”到“母亲”再到“姑姑”,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大都行为泼辣、敢做敢当,从传统习俗来看,其行为不符合传统认知,甚至可以称得上叛逆。但是,她们内心却有各自对爱情、生活、事业的独特认识和坚守。但在其作品中,“我奶奶”终究还是一位符合男性审美和对女性美好期待的女子;“母亲”则凸显了其背后的象征意义,是一个承载着时代变迁仍旧不折不屈、仁爱宽厚的地母形象;“姑姑”身上的职业标签、人性的本真则超越了其性别身份,让莫言的创作实现了从“写女人”到“写人”的转变,这其中既包含了时代的价值观,也反映了莫言本人对人生、对生活认识的变化,亦是他创作日臻成熟的体现。

关键词:莫言作品;女性形象;叛逆和顺从;从“女人”到“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68-05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中,“我奶奶”“母亲”“姑姑”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占据了十分耀眼的位置,她们大都风风火火、敢做敢为,甚至很多时候比身边懦弱的男子更有担当,所以经常有人认为莫言有种女性崇拜情结。对此莫言本人也表示认同,他说:“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的遗憾是我还没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2]。这些女子在家庭或社会生活中也经常有一些大胆的表现,她们的行为可以称得上叛逆,可与此同时她们又是爱情的守护者、大家族的支撑者和孝顺的女儿、慈爱的母亲。所以,这些形象灵动的女子的行为究竟是叛逆还是顺从,描摹这些女性形象的真正动因是一个值得研

究的主题。

一、行动的叛逆

所谓叛逆,顾名思义,就是反叛的思想、行为……忤逆正常的规律,与现实相反,违背他人的本意,常常做出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我奶奶”戴凤莲作为一位裹着尖尖小脚的旧式女子,本该遵守“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的三从四德,听从父亲的安排嫁给单家儿子了此一生。可是,她不甘与那个将死的麻风病人共度一生的命运,在洞房中怀揣一把剪刀保卫了自己的贞洁,却在红高粱地里把自己交付给了曾经杀人的穷小子余占鳌,并在公爹和丈夫被杀之后,公然与余占鳌同居并且生下了他们的“私生子”。此外,对于自己那个贪财的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作者简介:宁明(1973-),女,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父亲,她也是毫不留情:“我没有你这样的爹,从今往后不许你踏进这个门槛!”^{[2](P113)}在生活中,她敢于冲破传统,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濒临死亡之际,她对上天的诘问很好地表达了她的心声:“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2](P64)}

毫无疑问,她的行为既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也不符合传统上人们对女性贤良、顺从等的期望。可是,她那种敢于抛却世俗束缚、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做法却很好地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满足了长期精神压抑之下人们对自由和自主的向往,可以说她是1980年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典型女性形象。

比“我奶奶”幸运的是,“母亲”上官婉儿嫁给了一个还算正常的丈夫。可惜丈夫不仅生性懦弱,不能担当起家庭的责任,还没有生育能力。为此,没能为婆家“传宗接代”的她备受欺凌。自古以来无论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中,和她境况相同而默默忍受一切的女子不在少数。可她并没有就此逆来顺受,而是开始寻求另外的一条救赎之路——向其他男人“借种生子”。她的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传统上对妇女贞德的要求,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荡妇”的标签。可她却能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镇静地在世事多变的年代里执掌着一个大家庭,不为外界的影响所动,过着自己认同的生活,她的行为也不能不称之为叛逆。

与其他两位来自旧式家庭的女子不同,“姑姑”出身好、样貌好、人品好,是被当时其他女子羡慕的对象。可是,年幼时她就有过被日军俘虏的经历,在母亲、奶奶都慌作一团时,小小年纪的她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与智慧,最终得以安全回家。在“文革”中被冤枉批斗时,她拒不服软,弄得自己头破血流。作为妇产科医生,她敢于同不懂科学技术的接生婆对抗,敢于采取强硬措施处置对抗计划生育政策的乡亲,即便那是自己的亲戚或本家。可以说,她不畏强权、不惧武力,是一位敢于坚持原则的人,与传统认识中的弱女子格格不入,也自然成为

了某些人眼中的叛逆者。

这几位女子生活的时代不同,她们的人生经历也各有千秋,可是她们都做出了一些与自身所处时代的价值观、道德观相悖的行为,以世俗和传统的眼光来看,她们的行动是不合常理的,也是叛逆的。

二、内心的坚守

尽管这些看起来行为大胆、不惧世俗的女子都有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汉子”气质,内心里却都有各自坚守和信服的宗旨,她们的精神气质也必然受到了时代文化的影响。

“我奶奶”与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生下了他们的私生子,甚至听任余占鳌杀死了单家父子成为单家酒坊实质上的主人,这一系列看上去似乎“不忠”“不仁”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源于父权社会压迫下的无奈之举,是她对余占鳌男性权威的认同和服从。少女时代的她只是一个听话、顺从,对未来生活有些小小憧憬的普通女孩,她想象着出嫁后自己相夫教子的美好生活。可是,父亲的贪欲打碎了她所有的美梦,她顺从的结果只是促成了她成为财大气粗的单家的牺牲品。在对黑暗前景的恐惧中,她被迫拿起剪刀自卫,保住了自己的贞洁,也保住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她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在当时的女性间确是极为罕见的,这也是人们所期盼的那种生命的力量和自由酣畅的感觉。

可是这位勇敢的女子却在被余占鳌强奸后,自愿屈服于他的男性力量和男性权威,她的美丽和叛逆似乎都更好地印证了余占鳌的勇敢和男性魅力。“我奶奶”在一次视察酒坊时,面对闯入者余占鳌炫耀的男性力量,充满豪气的她立刻变成了一位顺从的小女人,任由余占鳌在酒坊中率性而为。当他当着酒坊工人的面问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否是他的时候,她流着眼泪说:“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当酒坊的工头罗汉对余占鳌的做法质疑时,她抽泣几声,说:“我不管,我不管,他愿意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2](P133)}。此时,那个大胆智慧的戴凤莲已经变成了一个任由男人主宰命运的娇弱女子。而且尽管余占鳌的“花心”让她十分难过,她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对余占鳌爱情上的忠贞,这是她内心对爱情、对家庭责任的认同和坚守,也是作

家在凸显余占鳌这样一位有血性、有胆识,充满阳刚之气的男性时的有意而为。

同样,“母亲”的“借种生子”行为实际上也是对压制女性的旧俗、传统屈服的无奈之举。尽管是丈夫上官寿喜不能生育,可是却是“母亲”承受了所有的屈辱和欺凌,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妇女一直所遭受的不公和压制。面临着来自婆家、乡邻的诸多压力,屈辱的“借种生子”成为“母亲”在那个社会生存立身的唯一出路,这种打破伦理纲常的行为进一步揭示出“母亲”行为的无奈和传统旧俗的荒谬之处。“母亲”的艰难选择并没有给她带来能为上官家传宗接代的男孩,她接连生下了来自不同父亲的7个女儿。这些女孩子的出生进一步恶化了母亲在婆家的地位,她的第八次生育恰逢家中的黑驴生产,全家人都去忙活那头在家庭中更为重要的牲畜去了,任由怀着双胞胎的母亲在痛苦中挣扎,一个不能生育女孩的女人的价值已经低于一头可以产崽的驴子了,女人已经被物化为了具有某种价值的物品。蔡荣认为:“母亲身上体现了很多女性的传统美德,比如勤劳、执着、无私的爱和对家庭的奉献……可是她自身却没有任何的自主能力,她的身体只是为本土男性和外来者之间的争斗和比拼提供了场所,为中国男性面对自己的无能,最终重新夺回权力提供了地方。”^[3]尽管处于这样的境遇,“母亲”却以坚韧不屈的精神支撑起了那个屡经磨难的大家庭,她的坚强与决断彰显了她丈夫的懦弱与无能,她的形象再一次验证了莫言笔下男人的“种的退化”。

“母亲”的儿女们来自不同的父亲,她们选择的丈夫有土匪、地主、共产党人,也有外籍飞行员……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力量和派别,可是在“母亲”眼中,这些外界的争斗似乎都与她无关,她以地母般博大的胸怀庇护着儿女们和她们的后代,她以坚忍不拔的勇气承受着来自家庭、国家的各种痛苦和磨难,她摒弃政治上的争斗,以宽容大度救护处于弱势的“敌人”。她所坚守的是对孩子们的母爱,对他人的仁爱。如果说母亲象征着祖国,那么发生在上官家族的一切就超越了个体意义,代表了20世纪大半个国家所经历的磨难和转折变化。

不同于“我奶奶”和“母亲”的出身卑微,作为抗日英雄的女儿,“姑姑”幼年时和母亲、奶奶一同被日军软禁,她表现得不卑不亢。青年时,在王小倜叛逃台湾之后留下的日记中,她被描绘为“红色的木头”,这其中虽有对其不谙风情的嘲讽,也暗示了她内心对共产党的政策、方针等的笃信和追随,可以说,她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典型。后来,被黄秋雅污蔑同王小倜有勾连,她与其斗撒泼,最后用血书写下“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的誓言。文革中,被诬告同县委书记杨林通奸被批斗时,为了自己的清白和声誉,她不顾身体的痛苦与折磨拒不认同莫须有的罪名,头破血流仍坚持自己的无辜,令批斗者胆寒,不得不放弃对她进一步的折磨。就是这样一位无条件忠于党、忠于国家的人才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不顾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威胁,亲自上阵以铁的手腕强制推行结扎、流产等措施,以至被大家认同为“杀人恶魔”。面对来自亲侄子的诘问,她说:“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4]所以,在被村民包围时,她仍可以镇定地指挥一切,她相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造福国家人民的,这正是她内心一直坚守的行为准则。纵观姑姑的大半生,她一直坚守着内心的原则,她的坚持源于对党、对国家的一切做法、一切准则的无条件的服从。

从“我奶奶”“母亲”到“姑姑”,她们内心有对爱情忠贞的坚守,有对仁爱的认同,也有对国家事业的一贯服从,她们在追求自由、爱情和事业的道路上,在叛逆的外观下各有自己固有的坚守。

三、从“女人”到“人”

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人们期待精神上的解放,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人们以“文革”为明靶,思考社会、政治对人性的压抑,人性在外界高压下的扭曲和变形。莫言深切感

受到了大众的疲弱与畏缩,他想在这个时代寻找到一种“纯种高粱”式的气概与精神。“我奶奶”身上那种泼辣大胆、追求自由的行为正好契合了人们的这种期待,成为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典型人物形象,她身上折射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的“我的身体我做主”的宣言是当时人们对自由意志、自由精神渴盼的心声,所以,她的形象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人物的代表。可是,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男性作家,莫言又不自觉地用一些传统女性的美德来描绘、塑造她。她的“小脚脸俊”符合人们对传统女性的审美要求,她红高粱般热烈成熟的躯体使她成为男人们向往的尤物。尽管与余占鳌的越轨行为似乎显示了她勇敢不羁的行为,但在很大程度上她还是被描绘为一位符合传统认知的“贤妻良母”。她操持着酒坊,管理着一个大家庭,养育着儿子豆官,在“丈夫”余占鳌改变酿酒流程、领着一帮人揭竿而起抗击日军时,她都义无反顾地站在他的身后支持着他,甚至在为他送饭的途中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她的美丽、勇敢、热情和贤良衬托了余占鳌的男性气概,将其凸显成为一位充盈着昂扬生命力的男性形象。小说中“红高粱”的形象同“我奶奶”的女性形象缠绕在一起,不可分离。她与“我爷爷”的爱情始于红高粱地,她的生命也消逝于红高粱地。同“我奶奶”一样,红高粱地被描绘为“异常的美丽”“难以形容的美好”,它是人们想要的东西,是父老乡亲所热爱的东西。可以说“我奶奶”代表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双重要求:一是她“传宗接代”的社会功能;二是男人们追求向往的对象。“奶奶的早逝让她所代表的矛盾的价值得以永存。已经完成了生育子嗣任务的年轻身体的逝去,让她能够作为男性希望得到的偶像而永存。”^[5]可以说,从形象到行动,作家在创造“我奶奶”这一人物形象时突出了她的女性特征和女性魅力,留给当代文坛的是一位勇敢、美丽的女性形象。

在《丰乳肥臀》的扉页上,莫言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母亲在天之灵”,可见,作品中的“母亲”不再只是一个具象化的人物,而是代表着作家的母亲、天下的母亲,甚至是祖国母亲。她留在人们记

忆中的形象也不是具象化的面貌或身材,而是作品名字中的“丰乳肥臀”。而丰乳肥臀并非母亲独有的形象特征,她的女儿们,她的婆婆,甚至诸多的女性都具有这样的身体特征,因此她的女性形象就不再只是具有个人意义,而是代表着广大的女性形象。母亲被迫“借种生子”的做法,是对传统价值观的抨击和对女子在世俗压力下痛苦生活的同情,而唯一儿子的外来血统则是对“出身论”“血统论”的无情嘲弄。他直至成年时对母亲乳汁的依恋,他无法独立承担的男性责任,都说明了这唯一男性继承人的无能和疲弱,表达的是莫言对一向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抨击。同时,母亲对后代均给予无私的奉献,她养育土匪沙月亮的孩子,她抚养共产党人鲁立人的孩子,她哺育大地主还乡团团长司马库的女儿,甚至不辞辛劳地带大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司马粮。在她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母性的光辉和仁慈。她遭受的磨难和痛苦,就是广大母亲们所经受的一切,她历经磨难依然能够勇敢站立起来,代表的是一种野草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母亲们的坚韧和不屈。“母亲”家族在20世纪风云变幻中经历的一切,代表了普通百姓的生活万象,是一个时代民族风貌的展现。所以,在“母亲”身上,女人的意义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女人”背后的指涉意义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内涵。

“姑姑”的身份标签是妇产科医生,尽管她因为接生了一万多名婴儿,被感恩的村民们称之为“送子娘娘”,可这个称呼只是出于敬意和感激,却非对性别的强调和突出。从姑姑幼年时在日军营地表现出的勇敢,到青年时初次用新法为产妇接生展现的镇定,她的性别身份都不重要。唯一需要体现她女性身份的是她的爱情与婚姻,可是在爱情上她也未能以女性的柔美取胜,被恋爱对象王小倜称为“红色木头”,这次失败的恋爱也致使她大半辈子孑然一身。她50多岁嫁给泥塑艺人郝大手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爱情,而是寻求一种心灵的依托,找到一种“拯救”自己的出路。在她身上,“妇产科医生”这一职业身份已经超越她的性别身份,将“送子娘娘”和“刽子手”这两种矛盾的身份集于一身,也造成了她晚年一直挣扎并寻求救赎的困境。她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行走在公社所属的

各个村落,接生呱呱坠地的婴儿,挽救身处险境的孕妇,她所到之处得到的是村民们热情的款待和诚挚的敬意,她享受到了职业的崇高感和来自百姓的尊重。可是,在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下,她以强硬方式推进结扎、人流等措施。此时,在人们的心中她已经异化成了杀人的“刽子手”,她得到的再也不是热情的迎接,而是人们的冷言冷语和讥讽嘲笑。但她深信这一切都是正义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所以,她可以勇敢地承受这似乎不公平的一切。直至退休当天晚宴之后回家的路上,她路遇一群纠缠自己的青蛙,在她的心中那些小东西像极了向她索命的小娃娃,她恐惧万分,落荒而逃,一路狂奔扑进了泥塑艺人郝大手的怀中,才找到些许的安慰。至此,退休象征着她职业身份的结束,她已经蜕变回一位普通的人,一位有内心的悲欢喜乐的人。“青蛙索命”的偶遇也让她静下心来深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并开始怀疑自己一直笃信的事业和信仰,她挣扎在“犯罪”与“救赎”的边缘。作为一个人,她再也无法享受内心的平静与美好。嫁给如同女娲造人一样用生命捏制泥娃娃的艺人郝大手,姑姑似乎找到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她亲自学习捏制娃娃,为它们每一个命名,编造各自的故事,让它们在泥塑的胚子里获得“新生”。在做这一切

的过程中,她所思考的“罪”与“罚”是人性的问题,她的挣扎是一个人内心的斗争,无关职业也不关乎性别。

可以说,从“我奶奶”到我“姑姑”,莫言走过了创作中的30年,他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文坛的狂热和激情,走过了迷茫并突围,走到了21世纪创作的成熟和练达。他也走过了从写“女人”到写“人”的历程,实现了从写故事到写人性的突破。在他的笔下,人性的善与恶、悲悯与杀戮超越了性别、民族和国家,从而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和内涵,也让其作品跨越文化之隔走上了世界文学的舞台。

参考文献:

- [1] 莫言. 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M].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 5.
- [2]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9.
- [3] 蔡荣. 外来他者的问题:《丰乳肥臀》中的父亲、母亲和私生子[J]. 现代中国,2003,(1):108-137.
- [4] 莫言. 蛙[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121.
- [5] 吕彤邻. 红高粱:跨越的界限[A]. 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对立:中国当代实验小说[C]. 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5. 51~74.

A Discussion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Masterpiec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Study of "Woman" to the Analysis of "Human"

NING Ming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rom "my granny", "my mother" to "my aunt", most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masterpieces behave bravely and boldly shoulder what they are faced with. From the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their behaviors do not correspond to the established rules or norms, and even can be considered as rebellious. But in their inner hearts, they have their own unique understanding about love, life and career and they can stick to these above all the way through. Nevertheless, "my granny" is still a woman who conforms to the expectation of men for her beauty and her loyalty, while "my mother" is an image of our motherland or the earth, which reflec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ideas, so what the readers can find is mostly the symbolic meaning behind this image. As for "my aunt", her career has almost been synonymous to her and her identity as a female is not as important as the other qualities like human nature, etc. Therefore, in creating these images, Mo Yan has achieved a great leap in his writing from writing about "woman" to about "human", which embodies change of Mo Yan's attitude to life as well as his breakthrough from writing "story" to writing about "human nature".

Key words: Mo Yan's masterpieces female image; rebellion and obedience; from "woman" to "human"

·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

男权意识下的突围与困境

——莫言小说女性形象再解读

张相宽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看作叛逆和颠覆传统伦理的典范,但究其深层原因,审视其生存真相,会发现她们深受子嗣至上、男尊女卑精神桎梏的束缚;她们被传统贞操观念、从一而终的封建伦理极度压抑;同时她们对男性依附性的意识也根深蒂固。通过她们的突围及其困境,莫言洞微烛幽,深刻批判了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男权压迫的事实。莫言用他的作品证明了男性作家描绘女性情感、揭示女性命运的可能性以及所能达到的高度。

关键词:莫言;小说;女性;男权;突围;困境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73-05

莫言坚持“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深入民间,创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在这个文学王国里,活跃着一群自由自在、敢说敢做、野性十足、坚韧顽强的女性形象。通常情况下,有些读者和评论家习惯于把她们当作反叛和颠覆传统伦理道德的典范。但是如果深究她们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审视她们生存的真相,就会发现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她们叛逆反抗的背后是男性中心意识隐隐的威胁,即使远在高密东北乡,她们也始终难逃男权意识的阴影,但也正因为如此,她们的突围才愈发显得艰难、决绝、惨烈和悲壮。

一、男尊女卑的伦理枷锁与女性解放的理性阙如

《大戴·礼记》有言:“妇有七去:不顺父母

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1]“无子去”成为套在女性身上的无形枷锁,使得女性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具有旺盛的生殖力、坚韧的生命力,她对苦难的勇于承担与超越阶级和血缘的宽厚仁慈赢得了读者的同情和赞誉。她是生殖女神,也是包容一切、奉献一切的大地母亲。有的论者甚至认为“上官鲁氏颠沛流离,历经苦难,顽强而博爱的一生是高密东北乡王国苦难历程的标志,是自由的女神,是前路的明灯,在高密东北乡钟楼广场的最高处,上官鲁氏的母亲光辉形象照耀众生。”^[2]但是上官鲁氏的一生之所以历经沧桑,饱经忧患,是与她深受子嗣至上、男尊女卑的男权思想的毒害分不开的。

上官鲁氏出生后父母在战乱中死去,不得不

收稿日期:2014-1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作者简介:张相宽(1980-),男,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寄居在姑姑家中,6岁时裹脚,成为姑姑姑父“待价而沽的奇珍异宝”,她一开始就是被物化的婚姻买卖的商品。她17岁时,经姑姑一手包办嫁给了上官寿喜,身价是二亩菜地,但需陪嫁一头黑骡子。上官鲁氏被剥夺了选择配偶的自主权,是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但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上官鲁氏结婚3年没有生育,于是招来婆婆上官吕氏的辱骂和丈夫上官寿喜的欺凌。当上官鲁氏回到姑姑家里寻求安慰时,姑姑则说:“孩子,也不能全怨你婆婆家无理,人家娶儿媳妇,图的是什?头一条就是传宗接代!”由此可见,不仅男人将女人当作传宗接代的工具,女人也自觉地将此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女性已经被男性中心意识所同化并自觉地加以实施和执行。当上官鲁氏进城检查了妇科之后发现自己生理正常,自己不能生育的原因在上官寿喜身上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改变了上官鲁氏的一生。上官鲁氏先后和自己的姑父、赊小鸭的、江湖郎中、光棍汉高大骡子、天齐庙里的和尚发生性关系,被4个败兵轮奸,生下了7个女儿,最后和传教士相好并终于生下龙凤胎上官玉女和上官金童。上官鲁氏几乎疯狂地四处“借种”生子,这种行为自然可以看作是对传统伦理的反叛,但这种反叛因为又和传宗接代、男尊女卑的男权意识相吻合而显得复杂甚至矛盾。一些论者已经对此提出独到的见解,李新宇指出,“对于丈夫和上官家族,似乎是反叛,但对于传统,却是顺从。所以,她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叛者。她很矛盾,头脑中有古老的传统观念,也有朴素的生存意识”,“与《红高粱》中的奶奶戴凤莲一样,鲁璇儿也是被迫成了传统妇道的反叛者”^[3]。而朱德发则认为这种行为“尽管能使她在追求性侣的过程中‘里比多’得到一定的释放,却难能把她引导到女性真正获得人性解放的现代道路;即使其‘里比多’得到释放能享受‘快乐’,也很难把这种‘高峰体验’升华到现代审美理性”^[4]。对于朱德发的观点,笔者不同意上官鲁氏如此行为的动机是为了“里比多”的释放和享受“快乐”,笔者认为她在为了传宗接代而“借种”时感受到的更多的应该是屈辱而不是“快乐”,她这样做是因为生活的

教训使她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真理:“女人,不出嫁不行,出了嫁不生孩子不行,光生女孩也不行。要想在家庭中取得地位,必须生儿子”。但朱德发对于上官鲁氏这种行为局限性的认识的确是真知灼见,上官鲁氏并没有女性解放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

《蛙》中的姑姑作为一个出色的妇科医生和忠心耿耿的计划生育工作者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姑姑”这一人物形象在莫言的系列作品中是有其发展轨迹的。他的中篇《爆炸》和短篇《弃婴》都有“姑姑”这一人物,在《爆炸》中的姑姑还认为“女孩到底不行”,只是在《蛙》中她才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而导致几个非法怀孕妇女惨死的罪魁祸首可以说就是男尊女卑的封建意识,如果不受男权中心意识的毒害过深,她们的命运也必然会有所不同。王胆逃跑时难产惨死,但陈鼻却因她生了个女孩而弃之不顾。她们为了要一个男孩,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岂不也恰恰证明了她们所受到的男尊女卑传统伦理的毒害之深吗?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死得愈惨,说明她们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愈重。

二、单向度贞操观念的压抑与反抗的限度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渗透于整个生命。”^{[5](P49)}性不仅可以用来传宗接代、种族繁衍,它还是人类正当的生命需求,是人类享受生命欢愉的途径之一。但长期以来,“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教条让人谈性色变,性成了见不得阳光的、肮脏的和罪恶的东西。而且,随着男权制的巩固,性禁忌成了对女性的单方面要求,《周易·恒卦》云:“‘妇人贞节’,从一而终也”^{[6](P115)},《女诫》曰:“夫有再聚之义,妇无二适之文”^{[7](P3)}。男子制定了严酷的道德律令供女子遵守,然后给这些节女烈妇树立贞节牌坊予以表彰,而女性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迎合这些男权中心意识的要求,有时甚至变本加厉,为自己制定更为严厉的伦理法则。长期以来,女子就是在男权文化的束缚下过着压抑的生活,即使是《红蝗》中“神秘传奇”的四老妈、《红高粱》中“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的戴凤莲也难逃男权中心意识的阴影。

看过《红蝗》的人一定记得因犯了通奸律条而被休回家的四老妈的形象。她骑着毛驴,颈挂破鞋,堂堂正正走大道,气势汹汹闯祭坛,脸露高贵辉煌的笑容,宛如登入仙班的仙姑。这是一个光彩照人、光芒四射的女性,她以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行为表达了对封建贞操观念的反叛和蔑视。她令那些妯娌侄媳们钦佩赞叹,唏嘘不已,宛如神话传说的人物。至少表面看来,四老妈的确是反抗传统伦理的勇士,但只要探究她如此刚烈行为的原因,再反观她行为的本身,则会发现她的反叛举动实是她绝望之后,心如死水之时的迷乱痴狂,她此时几乎失去了意识,对自己的所做作为无法做出判断也无法予以控制。因此,对她的神秘传奇的行为的合理解释应该是:她在封建贞操观念的压迫下濒临崩溃的边缘,她是男权意识的反抗者,但更是男权意识的受害者。从她被休离家之前的话可以看出她受封建贞操观念的毒害之深。她对四老爷说:“你一下子,实际上是要了我的命,休回娘家的女人,连条狗都不如……我死了以后,我的鬼魂也不会让你安宁。”她挑逗四老爷:“想摸就摸,别不好意思也别害怕,你四哥已经把我休了,他没有权利管我了。”在四老妈看来,被休回家等待她的只有死路一条,但她虽然看到并提出四老爷“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同样的通奸行为,但对此却没有反思,所以她对男权意识的反抗是有限的,还没有男女应该享有平等权利的自觉意识。相反,她的“你四哥已经把我休了,他没有权利管我了”的话反映出她还受到“出嫁从夫”的传统观念的约束。同样是通奸,女人被休,男人却依然是村里的头面人物,主持着祭蝗大典。由此可以看出封建贞操观念的不平等性:“因为男子习俗上不必为性行为方面的不贞而感到无颜面再活下去。对于男子充其量这只是一桩过错,在有些时候还是段‘风流佳话’,对女子则是场灭顶之灾,特别是在丈夫起了疑心之后,就再也无可挽回了。”^[8]而且,由于受到对女性单方面要求的贞操观念的影响,我们能够看到四老妈受到的压抑和痛苦。四老妈之所以被四老爷冷落是因为四老爷勾搭上了红衣小媳妇,四老爷在外拈花惹草,四老妈只能苦守空房,这才出现了后来四老妈和铜锅匠私通的事。但是,“越是受

到压抑的东西就越是拐弯抹角地寻找出路”^{[9](P12)}。在男权中心意识的阴影下,受到压抑的四老妈进行了不自觉的反抗,尽管由于封建伦理观念的深入骨髓而以悲剧结束,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还是被深深地震撼和感动。

《红高粱家族》中的戴凤莲之所以被作者认为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解放的典范”,是因为她“什么事都敢干”,而且她真的“什么都不怕”,在她的生命结束前“该干的都干了”。她最惊世骇俗的业绩应该是她和余占鳌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这是她对传统贞操观念、父权和夫权的最为决绝、最为悲壮也最为辉煌的反抗。但是,她的这种反抗是她深受男权意识压迫的结果,是因之而“连死都不怕”的自戕式控诉。她出生在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自然少不了受到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和上官鲁氏一样6岁开始裹脚,而她“为自己的脚自豪。只要有一双小脚,即便满脸麻子也不愁嫁;只要有一双大脚,哪怕你脸如天仙也没人要”。她成年后她的父亲因为贪图钱财将她嫁给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她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而又不明真相,出嫁时怀揣一把剪刀坐上了花轿。在出嫁的路上通过轿夫的口感到前途不妙,经过了痛苦的挣扎,“连死都不怕”的她反而放下了包袱,面对吃排饼的人她粲然一笑。新婚三天,令人绝望的真相更是生与死的煎熬,以至于在回婆家的路上遇到劫匪时她“无力挣扎,也不愿挣扎”,“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这才有了高粱地里轰轰烈烈的叛逆之举,这种叛逆之举既是对封建伦理传统的颠覆,也是怀着怨恨之心对父权、夫权的报复。她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但并没有对男权意识的理性认识,也未能找到女性解放的真正途径,所以才有了后来为了报复余占鳌和恋儿私通而与铁板会头目黑眼姘居,才有了生命结束时希望“天”“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的哀求。男权意识促使她走上反抗的道路但她最终并未摆脱男权意识的阴影。

三、人身依附与失去的自我

《檀香刑》的成功不只是因为莫言向中国说唱文学汲取创作经验,还在于他塑造了“敢哭敢

笑敢浪敢闹”的孙眉娘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孙眉娘“把千条的规矩万条的戒律扔到脑后”,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爱上知县大老爷钱丁。这种苦恋的确让人联想到女性打破阶级分野,无视身份差别,争取爱情自由和生命狂欢的努力,但是她内心深处依然受着男权意识的束缚。这从她和知县夫人“比脚”的惨败所引发的痛苦可见一斑,而她对自己在和钱丁爱恋之间身份地位的认知更能说明男权意识对她的压抑。千百年来,传统伦理观念已经成为女性生命的一部分,对于当时社会情境中的孙眉娘来说,建构女性主体性的路途还很遥远。

孙眉娘“生了一张娘娘的脸,但长了一双丫鬢的脚”。就是因为她生了一双大脚,直到20岁时还没能嫁出去,最后不得不委屈地嫁给了智力不健全的屠夫赵小甲。自从爱上钱丁,自从要和钱夫人一较高下,她的一双大脚就成了她痛苦的根源。“比脚”时,“眉娘看到,夫人似乎是无意地将长裙往上撩了撩,显出了那两只尖尖的金莲。身后的人群里,顿时响起了一片赞叹之声。夫人的脚实在是太美了,大脚的眉娘顿时感到无地自容”。钱夫人就是凭着她的三寸金莲,一俊遮百丑,使得孙眉娘灰头灰脸地败下阵来。孙眉娘痛恨:“俺的短处就是一双大脚,都怪俺娘死得早,没人给俺裹小脚,提起脚来俺就心里痛。”钱夫人的得意和孙眉娘的痛苦只能说明这两个女人都是男权文化的受害者,钱夫人肉体的痛苦换来了伦理的褒扬,孙眉娘顺应自然的天足带来了爱情的障碍。事实上,“小脚文化”既是男人畸形审美观的反映,也是男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将错就错,不顾女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和束缚女人的自由而制定的道德律条。而女人也自甘成为男人的附庸,被动或者主动地遵守和迎合给自己带来生理痛苦的传统观念。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6](P229)}。“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6](P283)},《周易》经过儒家的阐释演绎成为儒学的经典,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格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女性对男性的依附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班昭的《女

诫》更是为女性的依附行为推波助澜,“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7](P2)},进一步为女性的奴性心理提供了理论根据。孙眉娘对钱丁的爱情狂热、主动,看起来是反抗封建礼教的勇士,但骨子里的男尊女卑和对男性的依附性却根深蒂固,她和钱丁之间对爱情的付出是不平等的。爱情的确蒙蔽了孙眉娘的双眼,烧坏了她的心智,此时的她只有献身的热情而没有男女平等的意识。她是情的奴隶也是男权意识的囚徒。封建伦理的潜移默化使她自甘卑下,即使钱丁不爱她她还是以爱他为荣并矢志不移。其实,孙眉娘也有她的如意算盘:“俺家里有一个忠厚老实能挡风能遮雨的丈夫,外边有一个既有权又有势、既多情又多趣的相好;想酒就喝酒,想肉就吃肉;敢哭敢笑敢浪敢闹,谁也不能把俺怎么着。这就是福。”虽不能怀疑孙眉娘对钱丁的痴情和真情,但也不能忽略她的功利目的和依附心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加上钱丁的地位、身份和相貌、学识,使得孙眉娘既将他当作自己的情人,也将他视为自己的靠山。正是通过孙眉娘的生死之恋,我们看到了潜藏在女性身上的奴性心理。

如果说孙眉娘的故事历史较为久远,她对男性的依附心理和行为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生活在当代的杨玉珍身上体现的依附性的揭示则说明了莫言对女性的深入了解和对男权意识批判的深刻。杨玉珍的丈夫罗通和野骡子私奔后,杨玉珍并没有颓废堕落,一蹶不振,而是和她的儿子罗小通相依为命,艰苦创业,以节俭到“嘴里不吃腩里不拉”的程度率先在村里建起了五间大瓦房。她的口头禅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她的自立自强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敬佩。鲁迅说过,“一切女子,倘不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10],女性若想解放,就应该“不苟安于目前暂时的位置,而不断的为解放思想,经济等等而奋斗”^[10]。杨玉珍好像已经满足了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甚至掌握了主动权,但一旦罗通从远方归来向她认错悔改,她对男人的依附性立刻现出原形。杨玉珍一边痛骂罗通让他“好马不吃回头草”,一边换上了平时最

好看的化纤红毛衣,在出去买猪头时还顺便洗了个硫磺澡。当得知罗通领着他的私生女去了火车站,她当机立断,一手提着猪头,一手拉着罗小通飞奔着赶往火车站,尽最大能力把罗通留下来。而罗通留下来后,因为家里有了男人,这个昔日的破烂王竟然要洗手不干这种“没脸没皮”的营生了。男人的回归,使杨玉珍幸福满满,在村人面前扬眉吐气挺起了腰杆。杨玉珍能吃苦、有主见,但她的所做作为也体现出对男权中心意识的臣服。

17世纪的女权主义者普兰·德·拉巴雷曾经说过:“男人写的所有有关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5](P17)}这句话不无道理,因为男性作家在写作时有可能将男性中心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去。但是,女性写作也未必就能免除男性中心意识的影响或者还有可能出现女性中心主义的弊病。从另一方面来看,当局者迷而旁观者清,男性作家写女性也许更能揭示女性生命的真相,而正因为不处于同一性别的阵营,批判起来才更有可能不留情面而入木三分,从而对女性的性格、心理、命运和未来能有更好的理解。莫言曾经说过:“在母亲们的时代,女人既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又是物质生产的劳力,也是公婆的仆役,更是丈夫的附庸。”^[11]可以说,莫言对女性所受到的压迫有着清醒的认

识,他也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男权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对女性的书写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 [1]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 255.
- [2] 叶开. 莫言评传[M].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5.
- [3] 李新宇. 《丰乳肥臀》:母亲与生命的悲歌[J]. 名作欣赏,2013,(1):114-126.
- [4] 朱德发. “里比多”释放的悲歌和欢歌——细读莫言《丰乳肥臀》有所思[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4):19-27.
-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 [6] 周振甫. 周易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
- [7] 张福清. 女诫——妇女的枷锁[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 [8] 孙绍先. 女性主义文学[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106.
- [9] [保]基·瓦西列夫. 情爱论[M]. 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 上海:三联书店,1984.
- [10] 鲁迅. 关于妇女解放[A]. 鲁迅. 鲁迅南腔北调集[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56-157.
- [11] 莫言. 《丰乳肥臀》解[N]. 光明日报,1995-11-22.

The Analysis on the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Novels: a Discussion on the Breakthrough and Plight in Masculine Consciousness

ZHANG Xiang-kua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people are used to considering the female images in Mo Yan's novels as the rebellion and subversion of traditional ethics. But after looking for the underlying reasons and reviewing their living states, people may find that those women are restrained by the notion of masculine supremacy and fertile pressure. They are also deeply depressed by the traditional notions of virginity and loyalty in feudal ethic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greatly dependent on men in consciousness. Mo Yan analyzes and narrates their struggles and plight, and criticizes that women have long been patriarchal oppression. Mo Yan's works have proved that the male writers are able to describe women emotions and to reveal their fate very well.

Key words: Mo Yan; novel; women; patriarchy; breakthrough; plight

·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

重复与隐喻 架构与节奏

——浅谈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写作技法

陈亮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00)

摘要:文学写作作为作者使用文学语言描述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心智活动,不仅具有富含感性特征、典型化描摹等共性特点,同时还具有更多私人经验。以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长篇小说《蛙》为例进行分析发现,其从确立故事主题到筛选人物关系、扩展推进情节的各环节中,以“重复”的方式不断丰富故事架构,进而用隐喻等方式严格控制小说节奏,从而带给人震撼性的阅读体验。

关键词:莫言;《蛙》;故事核;人物关系扩展;叙事节奏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78-06

众所周知,文学写作作为作者使用文学语言描述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心智活动,不仅具有富含感性特征、典型化描摹等共性特点,同时还具有更多私人经验。甚至对于很多作家而言,“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1],所以即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常常因为写作技巧的不同而具有了不同风貌。同样作为一个写作者,笔者试图结合自身创作长篇小说的经验,分析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长篇小说《蛙》中的文学写作技法。尤其是在确立故事主题后,在筛选人物关系、扩展推进情节过程中,以重复、对比、隐喻等方式严格控制小说脉络与节奏,并通过多时空叙事延展叙述空间、完善叙述立场,最终使故事本身渐次丰满、“有骨有肉”,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震撼性的阅读体验。

一、重复:故事核——人物关系——故事架构

故事核,顾名思义,是指一个故事(一本长篇小说)的核心事件,也是整部作品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大多数作者的创作习惯来讲,通常是先确立故事核,再围绕故事核选取不同的人物关系、明确各组关系中的人物在不同层面的社会身份,据此扩展主体情节,并在对细部情节不断进行丰富的过程中把握稳定的叙述节奏,持续推进故事,渐至引人入胜。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其长篇小说《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它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万心富有对比性的一生:作为乡村医生的万心一生接生婴儿近万名,人称“送子娘娘”;作为计生干部的万心,一生忠实于

收稿日期:2014-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作者简介:陈亮(1980-),女,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机制研究。

党的计划生育事业,亲手流产了几千个本可以出生的婴儿,甚至无意中断送了一些产妇的性命。莫言本人曾在访谈中提及,尽管《蛙》涉及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这样一个敏感话题,但“这部小说最早也是从人物生成的。人物经历了这些事件,所以小说也自然涉及了这个敏感题材”^[2]。由此可见,“姑姑”本人的命运,才是整部小说从无到有的基础。而“计划生育政策”只是确立了故事主体后必然涉及的相关背景。那么,围绕“姑姑”这个被叙述主体,尽管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晚年生活是很幸福的,她在计划生育工作期间实际上也偷偷地帮了許多人”^[2],但作为“源于生活”又必须“高于生活”的文学创作,“姑姑”的形象因为“计划生育”大背景而获得更深刻的界定。用几个关键词来描述,即“技术高超的乡村妇科医生”“忠诚的计生干部”“向往爱情却最终用婚姻赎罪的女性”“昔日坚定的共产党人与晚年‘迷信’的退休医生”“泥娃娃艺人的妻子及泥娃娃形象的塑造者”。可以说,在这个故事里,对于“姑姑”这个故事核的认定不仅从横向角度上具有爱情、亲情、事业等层面的可延展性,同时在纵向角度上还具有从“送子娘娘”到“杀人妖魔”再到“泥娃娃形象塑造者”(赎罪身份)的深层延伸,是一个涵义丰沛、值得书写的优秀的“故事核”。

由此,故事的主线(一级提纲)也得以确立,即姑姑的生平。这一方面包括姑姑的事业线,即:姑姑童年——成为妇科医生接生(接生陈鼻、“我”、牛等)——成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追查超生人员耿秀莲、王胆、王仁美等)——退休后的赎罪期。另一条是姑姑的爱情线:王小倜——杨林——郝大手。同时还有一条副线即“我”的婚姻:王仁美——小狮子——(陈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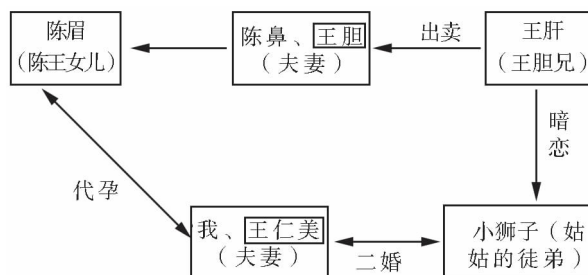
围绕核心人物发生的关联,即人物关系扩展为——

A组:陈鼻(姑姑接生)、其妻王胆(姑姑追查超生致死)、王胆之兄王肝(出卖妹妹王胆)。

B组:“我”(姑姑接生)、其妻王仁美(姑姑追查超生致死)、“我”的第二任妻子小狮子(被王肝暗恋多年、由姑姑介绍)。

C组:陈鼻和王胆的女儿陈眉(姑姑接生) = “我”儿子的母亲(代孕)。

用人物图谱勾勒如下:



(注:图中小方框标识为已逝者)

围绕这样的人物关系,延展出的二级提纲粗略为——

姑姑接生陈鼻——姑姑接生“我”——倒叙王小倜——姑姑恢复工作——姑姑的结婚对象杨林出场——姑姑身份变化抓计生——批斗杨林(姑姑婚事破灭)——“我”情定王仁美——“我”的婚礼——女儿出生——王仁美怀二胎——姑姑堵截王仁美——王仁美死——“我”的母亲过世——姑姑抓陈鼻妻子王胆——王胆死——退休后小狮子求子——牛蛙场参观——揭秘牛蛙场的“代孕”业务(我得知小狮子取精子用途)——得知为“我”代孕的是陈眉——(我梦见王仁美)儿子出生。

而通过对每一章节内容的梳理与归纳,站在写作者的角度,最后充实而成的三级提纲大致如下:

第一部:

1. 吃煤,人体器官命名的姓名由来。
2. 陈鼻来历——大爷爷归乡,姑姑被抓(杉谷司令对比)。
3. 姑姑接生陈鼻。
4. 姑姑接生“我”。
5. 姑姑给牛接生,关于英格纳表。
6. 送表人是飞行员,孩子们对飞行员的关注(上升气氛)。
7. (急剧低落的气氛)飞机失事,王小倜叛逃。
8. 40年后招飞,庆祝,姑姑拿来茅

台,重提王小侗,引出郝大手。

9. 侄子打探,倒叙王小侗(看电影、握手、吃空勤灶、口琴、半导体收音机、日记本——王小侗称呼姑姑为“红色木头”却也“解救”了姑姑)。

10. 1961年我送兔肉检传单——姑姑和黄秋雅打架。

11. 姑姑自杀,留党察看(原因是“以自杀的方式向党示威”)。

12. 1962年“地瓜小孩”的由来,姑姑恢复工作。

13. 1966年清明节,姑姑引入“小狮子”,杨林出场。

14. 人口急剧增长后姑姑身份变化,给王脚、肖下唇结扎。

15. 批斗杨林,秦河出场,黄秋雅“揭发”姑姑,杨林的“污蔑”。

第二部:

1. “我”定情王仁美。

2. 婚礼。

3. 女儿出生,郝大手第一次隐喻描写。

4. 九日庆典,铺垫陈鼻、袁腮近况。

5. 王肝对小狮子的暗恋,张拳老婆耿秀莲死。

6. (迅速进入关联情境)王仁美怀二胎。

7. 和袁腮对话,蝌蚪的内心挣扎。

8. 姑姑自我剖析:提到张拳的报复、自己的决心。

9. 姑姑执行政策,堵截王仁美。

10. 酒席,遇见杨主任,王仁美讽刺姑姑(却为女儿去京高兴)。

11. 王仁美死(死前交代后事一样的对话)。

第三部:

1. 母亡,申请转业。

2. 抓王胆(解放前后不同的“地道战”对比)。

3. “我”给母亲圆坟(杨主任和姑姑动员“我”做计生工作)。

4. 姑姑动员“我”与小狮子再婚。

5. 结婚登记,遇见陈鼻(想起王仁美)被讽刺。

6. 上坟,遇见王肝,被告知王胆去向。

7. 洞房夜谈王胆去向,小狮子:“王仁美咎由自取”。

8. 姑姑坐船追王胆、救王胆、送王胆——王胆死。

第四部:

1. 小狮子爱婴儿,王肝卖娃娃(秦河捏的),引出“陈眉”(插叙陈鼻要回孩子过程),小狮子庙宇中“拴娃娃”——诅咒式对比(小狮子生不出来,姑姑没有孩子,秦河无儿无女),姑姑被青蛙吓倒。

2. 牛蛙场参观,和袁腮话当年(表弟的话被打断,留伏笔)。

3. 再见王肝,见秦河(王肝描述一个失眠后的娃娃幻境)。

4. 小狮子遇见混血小孩,看专题片追溯姑姑嫁给郝大手的原因(开始揭示“蛙”的隐喻)。

5. 妇科医院参观,遇见小毕与肖下唇。

6. 小狮子去牛蛙公司上班(“蛙”的隐喻揭开)。

7. 河上坐竹筏得知牛蛙公司真相:代孕(交叉蒙太奇,小狮子别开生面的床戏)。

8. 揭秘陈眉为“我”代孕真相,堂吉诃德小饭馆与李手见面,回忆两次见陈鼻场景(代入陈耳、陈眉命运),陈眉出现还账。

9. 和小狮子动手,和李手交谈(李手不赞成引产)。

10. 我想开了(表面),遇见陈鼻放100元,被抢,吓姑姑的小男孩出现,追逐,肖下唇开宝马出现,我呈现匍匐姿态的狼狈,得知小男孩是张拳与耿秀莲的外孙——彻底想开了,决定接受代孕而来的孩子。

11. 去看姑姑,见到最后一个泥娃娃:神似“我”和王仁美那个没机会出生的孩子。姑姑给小狮子听诊(演戏当真)。

12. 儿子出生,假戏成真,梦见王仁美,决定写话剧《蛙》。

在这个提纲中,姑姑并没有直接出现在每一个小节中。但不能否认的是,周边每一组人物关系的命运都与姑姑紧密相连。尤其明显的是,在这个提纲中,“重复”成为一大特色,充实着人物命运与故事架构。

这一方面表现在主要人物之间的命运重复——这在小说创作中并不常见,因为对于一部有着明显话题性的小说而言,通常会采用由不同组别人物关系代表不同社会身份、走向不同命运的方式,用以概括生活中的种种可能性。但在《蛙》中,陈鼻一家的遭遇与“我”家的遭遇惊人地相似,都是男方由姑姑接生,女方因姑姑而死;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姑姑和小狮子都曾在年轻时冷眼对待超生妇女,轮到自己却终其一生都没有孩子;郝大手捏了一辈子活灵活现的泥娃娃,但末尾却出现了昔日驾驶计生船的秦河也摇身一变成为擅捏泥娃娃的“民间艺术大师”……或许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就带着这样重复性的熟悉感——别人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在这场与“生育”有关的跌宕大潮中,我们是旁观者也是参与者。当重复的命运不断交叠,这似乎就成了一种强调,一种乡土社会中最常见的可能性,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也预示着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重复性的暗示中,“个例”的“故事”变成了“普遍”的“真实”。

而另一方面表现在细节的不断重复:用40年后的“招飞”引出侄子对姑姑爱情往事的探寻,“我”用替“你爸爸”复述的方式,讲述“我”的大哥与王小倜看电影、握手、吃空勤灶等细节,用纯客观视角勾勒出一个栩栩如生但又始终存在距离感的“飞行员王小倜”;用两次河上追逃讲述姑姑的计生执法过程,只不过前者是张拳的妻子耿秀莲,怀孕5个月,最终和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死去,而后者是陈鼻的妻子王胆,在弥留之际由姑姑亲手接生一个女儿——孩子活了,但迎来的却是父亲陈鼻痛

苦万端的“天绝我也……”在这里,细节的重复倒更像是一种强度上的深化,诉说了重男轻女的乡土社会中,女性完全不被当做是一种生命存在,而这种赤裸裸的忽略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的漠视?与此相比,姑姑那句“你这个畜生”的怒骂足以掩盖她在河上追逃过程中让人不喜的冷酷——说到底,姑姑的“执法必严”可以理解为敬业,但她从没有丧失基于女性立场的“人情味”。

二、隐喻:人物形象——叙事节奏——客观视角

从前文的三级提纲中也可以看出,如果说长篇小说也像古代诗文一样有“起承转合”的话,那么《蛙》的正文前4章恰好就对应“起始、承接、转折、集合”的4个步骤。而推进这四步转化的,除了较为常见的时间线推进外(按照姑姑生平事件顺序推进),隐喻的频繁出现则给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一方面直接作用于故事架构确立后的具体人物形象塑造,同时还因为其在全书5个篇章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介入,而使整个故事拥有了富于韵律感的叙事节奏。

第一,民间泥娃娃艺人郝大手的几次出场,明显带有隐喻涵义的由浅入深。实际上,郝大手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一部分的第八节末尾,姑姑出席家宴,“在大门外,我们看到姑夫郝大手,那个不久前被封为‘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的泥塑艺人,正静悄悄地站在那里等候着”。作为全书的起始篇章,第一部分用了大量插叙,不紧不慢地铺陈各类背景、渲染环境气氛、交代人物关系,而郝大手的出场也是如此——没有过多描述,只是身份介绍与简单的人物代入。至于其丰富的隐喻涵义,是从“承接”篇章才开始铺垫的;第二部分第三节,王仁美为“我”生了女儿后出院回家的路上,遇见算命先生袁腮和村里的泥塑艺人郝大手堵在桥上争执,原因是袁腮无意中撞翻了郝大手的小推车,撞碎一车泥娃娃。从情节隐喻而言,这里似乎是以郝大手为载体,暗喻一种生命符号的打破,并为日后的重建埋下伏笔。“都说,高密东北乡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泥娃娃里找到小时候的自己。都说,他不到锅里没米时是不会赶集卖泥娃娃的。他卖泥娃娃时眼里含着泪,就像他卖的是亲生的孩子。”到这里时,明显的隐喻义

已经开始上升,这里的郝大手不仅仅是一个泥塑艺人,而是生命的顶礼膜拜者^[3],捏泥娃娃的过程好像女娲造人一样被赋予巨大神性。而从故事结构上来看,倘若此处只做隐喻,则在叙事节奏上必然有断裂感,因此此处的神化隐喻便开始与主要人物发生关联,紧凑推进情节,即“王仁美从车厢里探出身子,高声喊叫:郝大叔,您帮我捏两个娃娃,男的,要一模一样的”。在这里,不仅使“女娲造人”的神化隐喻得以“落地”、为姑姑日后嫁给郝大手完成精神赎罪埋下伏笔,同时还暗示了王仁美想要一个男孩的“狂热”。果然,在经历了“九日庆典”“耿秀莲死”两个紧锣密鼓的小节之后,到第六小节时,在完全没有任何冗余渲染的情况下,笔锋犀利如单刀直入,第一句话便是“部队领导向我出示了一份加急电报,说我的妻子王仁美怀了二胎”,直接介入更激烈的人物矛盾。到“集合部分”时,郝大手又出现,这里叙事节奏放缓,前面的单刀直入渐渐变成娓娓道来,在王肝讲述郝大手如何不给县长面子的“轶闻”后,“我”观看了“高密东北乡奇人系列”DVD,“姑姑始终处在画面的中央……而那郝大手,静静地坐在工作台后,目光迷茫,面无表情,仿佛一匹梦境中的老马”,姑姑捶胸顿足地讲述“卫生院院长……大名黄军……这小子什么都不会,唯有两项特长:一是请客送礼拍马屁,二是诱奸大姑娘”。显然,无论是在专题片里实名实姓揭发卫生院院长劣迹,还是让“奇人”配偶占用过多篇幅叙述自己嫁给“奇人”的始末,这都不符合电视专题片的叙事逻辑。那么此处如此处理,显然就是要忽略电视专题片的合理性,全力服务于故事本身的隐喻升华:即通过姑姑对嫁人原因的阐述,揭开郝大手以及他手下的泥娃娃作为“赎罪载体”的存在意义——“节目里展示了姑姑与郝大手携手制作泥娃娃的内容。姑姑闭着眼睛,对同样闭着眼睛、手握一团泥巴的郝大手讲述……”“在姑姑的讲述声中,那个名叫关小熊的男孩从郝大手手中诞生了。镜头给了这孩子一个特写。我看着这个面目清新,但带着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凉表情的孩子,不觉中泪如泉涌……”就好像一连串紧凑的鼓点敲到此处终于发出最沉重的闷响——所有那些因亵渎生命而产生的

恐惧与悔恨,总算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第二,“蛙”这个形象的含义揭示,在被提及的过程中渐渐由表及里。在起始部分,“蛙”的形象依次有县文联的刊物《蛙鸣》、哥哥姐姐像青蛙一样哇哇叫、姑姑像扔掉一只青蛙一样扔掉关于王小侗的传单、黄秋雅与姑姑打斗过程中露出了白得像青蛙肚皮一样的脊背……在这里,“蛙”的意象集中于容易理解的表层涵义,即争鸣、同“娃”音的“人”之存在,以及姑姑所厌弃的一切。到第二部分,张拳妻子耿秀莲跳河逃跑,小狮子笑着说:“有本事你游啊,鱼狗扎猛子啊,青蛙打扑通啊……”与其说是一种形象比拟,倒不如说寥寥数语就勾勒出小狮子在当时情境下的冷血,并为她此后终生不能生育埋下一个伏笔样的诅咒。而后是第四部分开端,说到姑姑曾被青蛙吓得口吐白沫,这说明姑姑在内心深处对“蛙”的认知已经越来越清晰。而打着牛蛙养殖场旗号的代孕公司大门口那尊黑黝黝、“视线阴沉”的牛蛙塑像,则干脆完成了“蛙”隐喻的双重界定——作为生殖力极强的生物,它暗喻代孕者完成了不孕不育妇女的梦想,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异化为以生命换取钱财的生育机器。所以,“蛙”的最后一次集中性出现,就在第四章尾部,姑姑在DVD中叙述嫁给郝大手的原因时所提及的那个改变她命运的夜晚,当大批青蛙扑向姑姑,“千万只青蛙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试图拦截姑姑的去路”,“对姑姑发起突然袭击”,于是姑姑“身上的裙子已经被青蛙们撕扯干净”……毫无疑问,这一段青蛙(或者说是被姑姑强制流产的几千个娃娃)反噬场景的描写之精彩,既源于对隐喻义的深刻揭示,也源于对叙事节奏的畅快把握,那是画面节奏的极速奔突与叙述过程的戛然而止——当郝大手出现在那个小桥上时,他不仅拯救了被大批青蛙追杀的姑姑,也完成了两个隐喻意象的重合——关于姑姑的主线叙述到此结束了。

第三,关于全书第五部分,剧本《蛙》的情境逆反了。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在正文之外的段落,这个剧本没有对人物身份、前期行为进行铺垫(显然是一个无法真正公演的剧本),第一幕就是抒发“陈眉”这个角色本身的怨恨,第二幕

则致力于抒发郝大手的怨气——也就是说,在正文中始终没有发声机会的代孕妇女陈眉、民间艺人郝大手,甚至早期富有、后期落魄的陈鼻都在剧本里大声呐喊、怒骂、诅咒,曾经沉寂的人物形象在第五部分里全面“复活”!必须承认,因为这种“复活”,正文中的小说虚构在剧本荒诞的表达映衬下反倒增加了很多真实性,产生了一种小说本身是对于现实的“真实再现”的表达效果,同时有效推动了其后情节的结构延伸与力度强化。而在这个荒诞的话剧情境中,第三幕,陈眉告状、小魏接状、所长包庇,这三个环节犀利地隐喻着某些情境下所谓司法公正的荒诞本质。而通过第四幕中主人公“我”和姑姑的对话,更全面引申出“蛙”“娃”“娲”的含义。及至第五幕中,黑衣人带走陈眉,陈鼻要保护女儿,这里的黑衣人已经成为官方的代言人、制度的卫道士。到最后第八幕电视剧拍摄现场真戏假作、用抢孩子的典故来断案,以及第九幕戏中戏里关于故事的“真假”之辨……伴随着姑姑的那句“剧中的姑姑是我呢,还是不是我?”质问的悬念在各种隐喻的不断推进下,以慢——快——慢的节奏步伐,将整部小说的哲学思辨推到顶峰。同时也因为从前四部分“我”的第一人称转为第五部分话剧的客观视角,加之书信体的格式,而使整部小说拥有

了更为全面、客观的叙述立场。

总之,阅毕《蛙》,启发甚多。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它饱含着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对60年波澜起伏般农村生育史的冷静认知。作家以“姑姑”这个女性形象为核心,通过娴熟老道的写作技巧,展现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含蓄表达了作家一以贯之的对生命的由衷敬畏,同时直面“悲悯”“忏悔”“赎罪”等问题的深层含义。然而最终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在于这部有着精彩故事结构与有力叙事节奏的长篇小说,通过它精准又韵味无穷的文学语言,“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的绝望,但是让大家也明白,我们在绝望当中也有希望”^[4],这就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所留给我们的无限可能。

参考文献:

- [1] 杨景贤.莫言:作家要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EB/OL].新华网,2009-11-30.
- [2] 莫言.《蛙》就是一个孤独的山峰[EB/OL].人民网,2009-12-28.
- [3] 范云晶.肉身和精神双重悲剧的沉痛书写——论莫言的新作《蛙》[J].名作欣赏,2011,(2):42.
- [4] 莫言.《蛙》就是一个孤独的山峰[N].东方早报,2009-12-09.

A Study on the Writing Techniques in the Full-length Novel *Frog* by Mo Yan: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Ones Including Repetition, Metaphor, Framework and Rhythm

CHEN Liang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 China)

Abstract: Literary writing is a kind of creative aesthetic activity of mind, in which the author uses literary language to shape artistic images and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nd emotions. It not only has som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ich percep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ypified depiction, also has more personal experienc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take the novel *Frog* by Mo Yan, the 2012 Nobel Prize winner,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writing skills, which finally bring people wonderful reading experience. The analysis starts with confirming the story theme, and then includes screening characters relationship, extending story plot, establishing the story framework by means of repetition, and controlling the narrative rhythm strictly with many writing skills, such as metaphor, etc.

Key words: Mo Yan; *Frog*; core of story; extension of character relation; narrative rhythm

· 女性文学研究 ·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体书写

——半夏小说论

降红燕

(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半夏是云南当代本土女作家,其小说文本具有“都市”“时尚”“物恋”等特点,体现出现代女性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这些特点与作家的心理结构相关联,更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消费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

关键词:半夏小说;消费文化;女性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84-05

半夏原名杨鸿雁,1966年8月出生于云南会泽,198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生物系,1990年代开始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是地地道道的云南本土作家。半夏创作样式主要涉及小说和散文,散文曾获“首届老舍散文大赛优秀作品奖”(2002),但其更多的心力倾注在了小说创作上。小说处女作为《生意人三叔》,发表于1993年的《边疆文学》。1990年代后期开始,小说的聚焦对象基本集中在都市女性人物的心理情感世界上,主要计有短篇小说《戴起墨镜来》(1999)、《情感纤维》(1999)、《心茧》(2000)、《清楚的容色》(2001)、《偷看美人刘惠兰》(2002)等,中篇小说《自由落体》(2006)、《螺旋结构》(2007)等。这些小说大多使用的是本名“杨鸿雁”。自2004年起不断有长篇小说问世,2004年3月和5月,花城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心上虫草》和《活色余欢》,自此的小说均以“半夏”署名。2009年5月,《铅灰暗红》发表于《芳草》2009年长篇小说专号。2010年第4

期《小说月报》原创版发表《潦草的痛》,2013年大型文学期刊《十月》长篇小说第5期发表《忘川之花》。

半夏的创作已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是目前评论界对半夏的研究还很少。本文拟从性别视角出发,对半夏的长篇小说展开讨论,探寻其文本的性别审美特征及意味,并进而加深对我国19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某种发展态势的认识。

—

先看5个文本的故事梗概。

《心上虫草》讲述的是都市女性的婚外情故事。已有婚姻的职业女性何薇因为感情甚笃的妹妹何若在去与身为有妇之夫的恋人韩树林赴约的途中遭遇车祸死亡,她欲为妹妹的生命价值寻找证明而与韩树林有了交往,不想却陷入了与韩树林的情渊之中。两个当事人各自的家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了一次劫难,最终何薇与医生丈夫陈彬的家庭重回正常轨道。这样的故事乍一

收稿日期:2014-12-23

作者简介:降红燕(1963-),女,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学(文化)与性别研究。

看就像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样,类似的故事在报刊等通俗读物上可以屡屡见到。但是半夏并不仅限于讲述一个个艳俗的婚外情故事,而是通过对女主人公何薇的心理情感世界的展示来探究当代职业女性的精神追求:“女性尤其渴望一种表面不动声色内里热烈持久的爱情,这种爱不喧哗不热闹不张扬”^{[1](P2)}。半夏认为:“一个时代的内在精神线索可以从爱情的细节上发现,一个关注当下生活的人要能倾听来自生活内部来自爱情深处的疼痛和叹息。”^{[1](P4)}

小说聚焦的主要是女性何薇的内心情感世界,何薇的恋人韩树林、丈夫陈彬以及另一个男性人物王政的形象比较平面单薄,尤其是在男性心理的揭示上文本显出了一定程度的盲视。好在这种盲区在《活色余欢》里得到了弥补。《活色余欢》是一幅中国当代社会的浮世绘。作者也有了某种改变:从《心上虫草》的女性人物性格心理展示转向男性人物性格心理分析。副厅级干部冯世光表面仪表堂堂,实则是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在家里他有老婆的照顾,在外有一近(本地)一远(外地)两个情人,同时还覬覦画家白强年轻貌美的妻子。白强则是弘一法师的崇拜者,他从弘一法师关于欲望的理论中悟到:“人只有走出被欲望支配的困境,生命的质量才会得到升华。”^{[2](P207)}小说中冯世光和白强的行为是有其心理基础的。相比《心上虫草》,《活色余欢》的面向似乎开阔了许多,不仅限于女性,也展示了男性的心理世界。

与《心上虫草》《活色余欢》一脉相承的是《潦草的痛》。小说基本以第三人称外聚焦的方式展开,但是其中又贯穿着视点人物周舒的眼光。全文讲述的是周舒的表姐玫、姐姐周弥和周舒自己3个城市女人的婚恋故事。玫表姐是一个回到了家庭的女人,她的全部生活内容与重心就是儿子和老公。儿子到了国外留学,丈夫又长期出差国外,玫表姐的生活如一潭死水。一次电脑视频中玫表姐好像看到了远在外国的丈夫有了女人,打电话给儿子又得不到理解,玫表姐于是服药自杀。中学教师周弥与丈夫离婚后独自带着儿子生活,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儿子却需要来

自父亲的关爱而与父亲单独联系,遭到母亲的阻挠,儿子离家出走了。表面活得风生水起的周舒既救下了自杀的玫表姐,又经常关心着姐姐,但是她自身的家庭也面临困境,平淡的婚姻生活冲淡了恋爱时曾有的激情,周舒没能忍住单位上司短信中的甜蜜诱惑而出轨,老公出于报复离家去寻找大学时的旧爱,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面临解体。聪明女人周舒迷途知返,深受单亲家庭之苦的周弥力助妹妹保全家庭,走出怨妇心态的玫表姐帮周弥找到了儿子。小说似是一个大团圆结局,但是在一片充满喧嚣之气的滚滚红尘中,人们来不及感受一切,爱和疼痛均是浮皮潦草的,尤其是女人们的心,每个女人的心都长了老茧。“心茧”是一个贯穿《心上虫草》《活色余欢》和《潦草的痛》的重要意象。

如果说以上三部小说以都市女性情感世界为描摹对象,人物处于城市空间,文本充溢着浓郁的社会现实生活的气息的话,那么《铅灰暗红》则打开了另一个向度的表现空间。半夏曾说:“云南的山川风物人情是我血液中的浓缩物,倘若抽一管血,用坩埚在火上炼一下,一定是有几粒针状的结晶体叫‘云南’。缩小点说,滇东北乌蒙群山褶皱中的一小块地方以及昆明城是供养我生命及我作品的沃土。”^[3]那小块地方是云南会泽铅锌矿,前边的三部作品都以昆明城为原型,会泽铅锌矿则在作家笔下化为了老咀山矿,《铅灰暗红》就是作者对自己童年时代生活成长之地的人与事的眷顾与回望。作者的童年时代正是“文革”期间,“文革”对于中华民族是一场劫难,老咀山矿的生活画卷底色也是沉重的铅灰色,但是在孩子的眼中也不乏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女孩红英的回忆中,老咀山矿有惨烈的残酷画面(《美人纪》《涩人生》),更有人性的温暖场景(《爱情篇》《苦乐曲》)。可以说《铅灰暗红》承续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流脉,但它又不是“伤痕文学”的简单承续。《铅灰暗红》由多个小故事组成,结构方式犹如彩线穿珍珠。

很显然,《铅灰暗红》在现实题材重在横向的铺排之外,加入了历史的维度,到最近的《忘川之花》,这种纵深感更加深入了。《铅灰暗红》是“文

革”回忆,《忘川之花》则深入到20世纪上半叶,而且从民国初年一直延续到当下,在深度、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拓展。

《忘川之花》是一部女性家族小说,文本以女性个体的命运故事为核心散射开去,将历史与现实相交织,历时民国初期、抗日战争、“文革”到改革开放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当下,把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悲欢离合的微小叙事相结合,践行了作者半夏“在更高的高度上与读者相逢”^[4]的理念,体现出半夏写作中不懈的追求、努力及其进步和成绩。

二

从以上对半夏长篇小说的大致梳理中可以看出,半夏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主要来源于其写作对象,其文本惯于讲述女性的情感故事,这是从杨鸿雁时期到半夏时期一以贯之的特点。女作家惯于讲述女性故事已经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每个作家讲述的具体故事各有不同。半夏小说的女性故事特点何在?细读半夏小说,可以发现一些经常出现的符码,有的反复出现,有的贯穿始终。

都市。“都市”是半夏小说反复出现的故事发生场景。有生物学背景的海夏自称“我的故事是一个‘情感生态系统’,内含不同的‘爱情种群’,每个‘爱情种群’平衡了,大的‘情感生态系统’才平衡。”^{[1](P2)}半夏的小说便是对人类情感生态世界的书写。而在这些故事中最突出的主人公首先是一些都市白领丽人:何薇、何若、王云莉、周舒、周弥、许鸿仪等。这些女性人物都生活在城市之中,都是些职业女性。不同于旧时代只限于家庭小天地的女子,也不同于当代受到的更多传统隐性规约的乡村女子,她们都是些有职业的生活于大都市的现代女性,她们身上充溢着独立自主的朝气与活力,虽然由于种种人生的磨难际遇,这些女人的心上长了老茧,但是在半夏小说中她们依然是光鲜亮丽的一个群体,而只有在都市的背景中,她们的身上才可能发出熠熠的光芒。

时尚。“时尚”文化有很多具体表征,服饰只是其中之一,人物着装的时尚是半夏小说最突出

的特点,文本中的女性主人公都可谓时尚的先锋,这种倾向在较早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比较明显。发表于2001年《女友》杂志的短篇小说《清楚的容色》可谓代表,白领丽人叶青与网友“木头”在昆明城的地标地点翠湖上演了一场“网恋见光死”的戏剧场景片段。小说非常短,但却充满时尚的气息,比如叶青,就是时尚丽人的装扮^[5]。

叶青后来的不想再见“木头”也是看到对方的土气:说的云南地州方言,穿的百货大楼的大路货夹克。在半夏的长篇小说中,生活于城市中的女主人公们差不多都是和叶青一样的充满时尚感的女子。半夏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渲染这种对时尚的偏爱。这种时尚感也延伸到对男性人物形象的描摹中。

在“历史题材”的《铅灰暗红》和《忘川之花》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时尚的深深印痕,《铅灰暗红》开头“美人纪·二篇”中的柳惠兰就是老咀山矿“文革”时期的时尚先锋,她因为漂亮和打扮入时而与环境格格不入,稍显风骚就受到周围人的侧目、批判。“文革”结束后,她在省城当了一家美容院的老板,这种设置可见作者对女性与时尚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联系观念的流露。《忘川之花》中的时尚则主要是通过缅甸曼丽和爷爷许德昌体现的,他们生活于缅甸南部,接受了现代教育,缅甸南部海滩上的阳伞、面包、咖啡则是彼时彼地的时尚标签。

科技的进步与物质的丰富带来了现代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改变,特别是生活于广大城市中的女人们。在充满时尚感的生活方式中,现代女性找到了自己。

物恋。对某种物品的迷恋也是半夏小说的一个突出表征。半夏曾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是个恋物狂:“我确实是个恋物狂,遇到我恋的东东特别爱发岔,比如玉,比如银饰,比如茶及喝茶的用具,环境的布置等”^[3]。排名第一的“玉”就屡屡出现在其文本中。《潦草的痛》全篇就是以一只玉镯开始的,“玉镯”成为女性人物心理和命运变化的一种象征和隐喻^[6]。

《忘川之花》故事的发生地是腾冲,写腾冲似

乎不可能不写到玉。女主人公的名字就叫玉兰,玉兰嫁到的许家是富庶之家,许家的富庶除了文本中说到的开着马帮客栈之外,一个重要情节就是许家的梅花枝头上都挂着好几只玉镯子。因为许家的老梅有点枯干的迹象,许家老太太认为玉能养人,肯定也能养花养树,于是把家里的好玉镯拿了几只出来。小说中还具体出现了三只玉镯,一只是奶奶玉兰送给缅甸曼丽的“寸把长的阳绿外接着一节指甲盖大的翡红,余处是一节绵白”^[7]的三彩玉镯,曼丽是戴着这只玉镯死去的。一只是玉兰戴着的豆青糯底玉镯,抗战期间被德昌拿到当铺当了作为从事地下秘密抗战文化工作的资金。第三只是许家养子麻三爷的后人为赔罪送给奶奶的秧苗绿的玉镯。三只玉镯在文中都起到了联系、推进故事情节的作用。

与女人对“玉”的情有独钟相对,半夏小说中也写到了男人的钟爱物——“轿车”,这“轿车”的变化是“与时俱进”的:在《心上虫草》中是三厢夏利,在《活色余欢》中是大众宝来,而到了《潦草的痛》中则为宝马5系了。

三

半夏的小说中还有明显的生物学背景、云南方言的运用等特色,但是我们的专注点是“都市”“时尚”“物恋”三者,这种概括当然有失于简单之嫌,这是批评比之于创作的固有缺憾,然而这种归纳又建立在文本本身故事和读者的阅读体验相结合的基础上,并非无中生有。为什么半夏的写作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这与来自于作家心理结构的创作动因密切相关。在以单行本出版的《心上虫草》《活色余欢》和《潦草的痛》中,都有半夏的“自序”或是“后记”。她认为:“一个关注当下生活的人要能倾听来自生活内部来自爱情深处的疼痛和叹息。”^{[1](P4)}她希望自己的写作具有穿透性:“我追求作品的字里行间默默地有一种潜流淌过,它打动人们的心,有穿透力,穿透人生繁琐的表层穿透人脸的表情,触摸到灵魂。”^[8]她叹息:“疼痛永远是不潦草的。只有潦草的爱,只有爱会变得潦草。于是,疼痛只好跟着潦草起来,能隐忍的都隐忍了。我们不得不咽泪装欢。”^[9]半夏是一

个热爱俗世生活的作家,正如她自己所说,她的文字飘荡着生活的烟火味。这种“烟火味”在她的博客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半夏是在写小说,不如说她是在写自己。

除了与作家自身的主观因素相关外,半夏的写作特点更来自于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对女性情感心理世界的关注是半夏的写作重点,这是女性作家似乎与生俱来的一个共同特点,而半夏小说“都市”“时尚”和“物恋”又明显带有199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新特征,这种特征是当今商业消费文化日益高涨的氛围下的产物。

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深入,我国从计划经济历经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过渡阶段,进入到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转型带来了艺术的新变,中国文化形成了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者共同构成当代文化地图的格局^[10]。大众文化在文化市场上的地位日益突出。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现代化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到21世纪,消费文化的力量日益突出,尽管存在一些不平衡的差异现象,但是在大城市基本形成了一种现代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在消费行为中,女性无疑是一个更重要的消费主体,尤其是在服装、首饰、化妆品、医疗美容等方面。很多女作家的写作形成了一股潮流:“突出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的主题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女作家写作旨趣发生转换的一个方面。”^[11]半夏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就是这种拥有独立自主性的城市女性。

在以往的性别文化视域中,女人是作为一种被看的客观对象物来对待的,但是发展到当代消费社会,女人们很多时候是在为自己妆扮,妆扮美丽的女人自己就能感受到一种自信的快乐,并不一定需要男人的肯定。半夏小说中的现代都市白领丽人便是现实生活中这样一群具有明确自我主体意识的女人,她们活得风生水起、怡然自得,充溢着现代女性的活力。正如有的论者在谈到女性与时尚的关系时精辟指出的:“‘女性是时尚的生物’这样的断语不再是一个负面的判断,不再是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一种轻蔑指认,也不再内化为女性对于自己的一种具有罪感的

自我判断,而更多呈现为女性一种可以释放自己、解脱自己的依傍资源,成为女性可以借用来言说自身主体性的一种方式”^[12]。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中,与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徐徐展开相应和,一直涌动着一股与消费文化相联系的潮流,在从1940年代的张爱玲、苏青的海派写作,到当代新时期以来王安忆、张欣、张梅、池莉、安妮宝贝、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1990年代开始写作,新世纪新作不断问世的云南本土作家半夏的写作忠实于社会生活,没有(当然也无法)脱离消费社会的文化语境,加入了当代女性写作的大潮,尽了自己的一己之力。

从更高的标准看,半夏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都市现实题材的几个作品有模式化、雷同化的倾向。人物性格不够鲜明、突出,感觉是事件在带动着人物活动。小说没有呈现出某种高远的“意”,有时价值观有些模糊,人物的漂浮感应该由此而来。文本有些像城市物语,或城市浮世绘,作品重在客观呈现都市生活场景。就女性写作的特点看,文本中对消费文化有时会产生异化、阉割女性主体性,对女性时常会沦为消费客体的危险也似乎警惕不够。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好在这种不足在《铅灰暗红》《忘川之花》中已得到很大改善,而且半夏的创作依然还

在高峰期,我们期待半夏会有更好的新作问世。

参考文献:

- [1] 半夏. 爱情种群的繁衍和变数[A]. 半夏. 心上虫草[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 [2] 半夏. 活色余欢[M].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 [3] 朱彩梅,安阿凤. 云南60后作家访谈之十二 半夏:让文字飘出生活的烟火味[EB/OL]. 心上虫草的博客,2011-01-10.
- [4] 半夏:在更高的高度上与读者相逢[N]. 生活新报,2014-07-02.
- [5] 杨鸿雁. 清楚的容色[A]. 柴效锋. 新女性小说[C].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 62.
- [6] 半夏. 潦草的痛[J].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0,(4).
- [7] 半夏. 忘川之花[J]. 十月,2013,(5).
- [8] 半夏. 欲望深处的叹息[A]. 活色余欢[C].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254.
- [9] 半夏. 潦草的痛·自序[A]. 潦草的痛[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254.
- [10] 孟繁华. 众神狂欢:当代中国文化冲突问题[M].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21.
- [11] 乔以钢. 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4.
- [12] 董丽敏. 文化视野中的性别研究[A]. 乔以钢,林丹娅. 女性文学教程[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 341.

A Study on the Writing Style with Feminine Subje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er Culture: Taking the Novels by Ban Xia for Example

JIANG Hong-ya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Ban Xia is a contemporary native female writer in Yunnan and her works reflect the independent subject consciousness of contemporary women by describing their lives. The features of her novels could be summed up in some words such as city life, fashion and obsession to accessories and consumer goods, which are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her mental structure, but also are the phenomena of consumer culture since the 1990s.

Key words: novels by Ban Xia; consumer culture; feminine subjectivity

妇女文学的长时段考察

——从王萌《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
——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说起

毕新伟

(阜阳师范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1)

摘要:长期以来,在中国传统妇女文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现代的认知方式观察传统,运用现代知识阐释传统问题,不可避免地造成对妇女文学的误解和遮蔽,无法正确地看待妇女文学的德性诉求。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辨析,并探寻对其德性品格进行现代传承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传统;封建;礼教;才德之辩;精神生活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1-0089-08

中国妇女的文学创作与男性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妇女文学研究者谢无量认为最早可以上溯至“三代”。他曾对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这样阐述:“周时民间采诗,兼用老年之男女任之。其诗亦必男女均采,故《诗经》中宜多妇人之词。”^[1]其后历朝历代均有妇女从事文学创作,在明清时期达到妇女古典文学创作的高峰,经历过清末民初的文学转型后才衰落下来,被“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女性新文学创作取而代之。若以妇女文学称谓传统社会女作家的创作,以女性文学称谓现代社会女作家的创作^[2],中国妇女的文学创作就会进入到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认知系统中,以时易世变来解释文学现象。王萌女士的著作《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中,运

用大量的史料清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妇女文学发展线索,成就自然非常突出,但由于是跨型研究,其中的理论预设和分析推论均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此不揣冒昧,阐述如下。

一、如何认识和理解传统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认为:“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的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因而“传统就是历经延传而持久存在或一再出现的东西”^{[3](P17)}。这说明传统经过世代传递具有了连续性。他还认为,传统在其根脉延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添加或减少一些东西。这种作为范型存在的传统根脉可以称作元级传统,其支脉构成

收稿日期:2014-12-03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2013年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国古代女性修身教育的转化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DEA130238)

作者简介:毕新伟(1972-),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性别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了复杂的附属传统,当元级传统发生量或质的变化的时候,附属传统也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文学作为附属传统,其所具有的“规范意图”^{[3](P25)}就是对元级传统的应和,所以对元级传统的认知和理解是评判传统文学的关键。

王萌女士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是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到也许用一个叫“封建”的词汇就涵盖了全部,但复杂的是与其所谈论的时代产生了“名实错位”的问题,在元级传统的理解上进行了误读,使得她对妇女文学的认识在敞开了某些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遮蔽。

按照冯天瑜的考证,汉语“封建”一词的本义是“按宗法——等级原则封土建国、封爵建藩。”^{[4](P18)}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封建制是一定的权力下放到诸侯;在伦理关系上,以嫡长子继承的宗法制为人伦原则,二者合起来构成周朝的“礼制”。秦朝统一以后,以“郡县”取代封建的政治组织形式,冯天瑜认为中国进入了“非封建”时代,一直持续到清王朝的崩溃。“郡县”制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形式,由分权走向集权,其专制王权一旦定型就不再变异。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家族礼教在封建宗法制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汉代“独尊儒术”,家族礼教因而在吸收了儒学资源后完成整体框架的建构,宋代理学家进一步填充内容,使家族礼教愈益偏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家族礼教并非封建伦理而是“非封建”的专制伦理。

把专制礼教当作封建礼教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出现的,这在现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冯天瑜认为,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封建’的含义在某些重要论者那里发生变化:从一古史概念,演变为‘前近代’的同义语,成为与近代文明相对立的陈腐、落后、反动的制度及思想的代名词。”^{[4](P192)}始作俑者是陈独秀,他“将中国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4](P209)}。这种名实错位的泛化封建观经过1920年代的大革命、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到1950年代得到全民性普及。

当封建泛化并固定为一种思维和研究的范式后,这种被发明的传统就掩盖了历史的真实。

比如常会被提及的“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等伦理话语,其词语组合的错位便搅浑了历史实际。“封建时代(周代)礼教尚未定格、婚恋保有较多的上古遗风,男女情爱较为奔放、自由,《诗经》中有多篇生动地展现男女自由恋爱乃至私奔的诗篇。《周礼·地官·媒氏》更有明载:仲春三月,允许男女约会,‘奔者不禁’。礼教是在专制一统的两汉以降确立并渐趋强化的,此后一再演出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将‘礼教’桎梏、‘包办婚姻’归之于‘封建’,实是文不对题。”^{[4](P210-211)}

这样的认知在性别研究中业已成为常识,高彦颐(Dorothy Ko)认为这种对中国妇女史的封建性研究很成问题,她列举了陈东原的《中国古代妇女生活史》(应为《中国妇女生活史》)、杜芳琴的《女性观念的衍变》说明女性受“封建”之害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她说:“我以为,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这种混淆的出现,是因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她从明清时期的妇女文学中看到了新的景观,认为通过文学的传递,她们“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它凸显了即使在儒家体系范围内,女性的自我满足和拥有富有意义的生存状态的可能。”^{[5](P4)}妇女整体上被“封建礼教”摧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被禁锢、被压抑、受迫害只是现代社会想象历史的一种方式,是进化论和唯物史观混合的产物。

《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意在阐述妇女文学如何向女性文学转化,连接传统与现代,论证现代女性文学发生的本土渊源,追寻历史足迹的意义,这是极富学术勇气的研究,乃一开创女性文学和女性史研究新路径的举动,但在理论框架上陷入泛化封建观的窠臼,尽管材料丰赡,却掩盖不住判断上的失误。因为把明清时期看作“封建社会”,那么其文化也自然是封建的文化,成为一道禁锢人性的樊篱,因此就得需要挖掘突破樊篱的思想和文学创作,连成一线后与“五四”的新女性写作接轨。这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形

成了以偏概全的论断,因为明清时期,就妇女文学中的主流思想来看,对家族礼教是赞美和维护,而不是冲击和破坏;二是对妇女文学的精神性品格有误判的情况,也就是说进行了脱离伦理情境和生活情境的过度诠释;三是过于注重晚明的个性解放思潮传统及其与“五四”的承接,而忽略了从妇女文学到女性文学之间存在的断裂。

王萌这种妇女文学的关系研究,很明显采用了观念上的倒推方式,即站在现代的立场上,以“五四”新文化和女性新文学为确定性价值,在往回追溯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携带了现代的有色眼镜。在学术传承中,《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与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有直接的亲缘关系。周作人首先在晚明文学与新文学之间勾勒了一个传承轮廓,任访秋认为失之简单,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段文学进行分析和说明”^[6],晚明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赋予了反封建的意义,文学也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及,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反封建相衔接。可见王著与任著的关系更近,但二者在存在这些相同问题的情况下,王著依此在妇女文学的评价上出现的偏至更大。因为任著以谈男性文人的思想和文学为主,这在传统家族礼教经理学改造后束缚性增强的情况下,是以性灵之学来平衡礼教,尽管李贽、袁中郎他们反对程朱理学,但是属于局部的伦理调整,并不能撼动礼教的大树。他们反对“三纲”,反对妇女守节,是元级传统本身往另一端发展的表现。也就是说,汉代初成的礼教在宋代以后内部形成了两股势力,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各执一端、互相制衡,并互相作用。这个由男性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实为妇女文学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冲击礼教的文学妇女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在获得写作机会的时候表达她们对礼教的遵从。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现象,与妇女文学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了。这说明作为附属传统的妇女文学,其“反封建”性一点也不明显,高彦颐甚至说:“看不到她们对社会性别体系的公开进攻”^{[5](P10)}。

回到历史场域考察礼教规范在宋及以后朝

代的紧缩,就会发现充足的社会原因。汪晖把中国现代思想的起点定在宋代,其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使得城市生活繁荣起来,出现了“早期现代性因素”,“以天理为中心的儒学思潮”就是被激起的“批判理论”^[7]。程朱理学在个人欲望和利益观念增强的时候以天理世界观来进行自我约束,重视道德的训练,压抑个性发展,其理念自然是反早期现代的。但理学在宋代只是体现为一个生成的过程,未能成为统一的意识形态,及至晚明,商业和经济发展又前行了一步,追求性情、欲望自由扩展的思想潮流应运而生,冲击礼教的大厦,而礼教便以提倡“三纲”、贞节来应对。二者都是晚明社会生活发展的应激性产物,妇女文学以及晚明文学就是在这种碰撞中走向繁荣的,有人且称之为“文学盛世”^[8]。

在晚明关于妇女的才德之辩中,妇女被许可阅读较多的书籍,积累了文学经验,当她们拿起笔来表达思想和情感时,由于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影响,自然是认同“温柔敦厚的儒学诗教”^[9],或作贤妻,或作良母,或作端庄的闺秀。这就是妇女及妇女文学的传统,不能用现代观念苛求她们去冲击贞节,冲击所谓的“封建礼教”。另外,任著指认的晚明思想解放运动,即王著所说的“女性解放思潮”,在性别关系上到底是怎样讲述解放的,不妨抄一段王著引用的话来看个究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王著对此评析道:“袁宏道对人间‘真乐’的描述,代表了晚明文人的性情追求。他以一种放浪形骸的风流才子的架势挑战封建伦理道德,以近乎极端的高扬个性和肯定人欲的思想,鼓动人们放纵欲望,追求人生的快乐和享受。”^{[10](P19-20)}这样的解放恐怕不能说是解放妇女,只能是男性自我的放纵吧,妇女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是绝不可能获得解放的。挑战伦理更多的属于男性行为,在大量的妇女文学中表达的对伦理的认同和维护,与这种纵欲享乐的思想恰好背道而驰。传统礼教、女

教与妇女文学思想的对接与融合,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必须这样来认识传统,否则,就会对历史形成人为的遮蔽。

二、妇女文学传统的思想和精神品格

明清时期之所以有大量妇女获得文学写作的权利,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明中叶经济、文化总体上走向繁荣,带动了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的诸多变化,其中“思想解放运动”对女作家的产生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明中后期出现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言论激发了关于妇女的“才德之辩”,李贽认为女人见识短的看法是对妇女的偏视。妇女长期局限于家庭生活领域,自然阅历有限,而女教又不重视妇女的社会知识教育,哪里会形成高深、长远的见解呢?这不是妇女本身的问题,是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说的“社会性别”问题,社会压抑了妇女经验的多样化,以至于显得妇女的见解和经验刻板单一。妇女无才识便难以有见解,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势必要培养妇女的才识,因此,叶绍袁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11]。王著认为,叶绍袁提升妇女才识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以沈宜修为核心的吴江女性创作群体的发展和繁盛”^{[10](P36)}。袁枚也为妇女创作正名,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12]。在弘扬妇女德性的前提下重视才识,尽管是一种局部修整,但却敞开了妇女的精神空间,发展了另一种生活。

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认识,“长久以来一直被当作是传统社会‘反女才’的反动罪证,……革命史思维下的研究多是批判其反动性,并且常常与整个传统社会对联在一起”^[13],这种罔顾史实的判断对学术研究的危害性甚大。从最早以文字记载这句话的陈继儒的理解中可以看到,其文意不在于反才,而在于正德。陈继儒解释说:“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他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愈也。”^[13]把这句话放在历史的场域

中看,“其所产生的明末社会商品经济正日益发展,反理学思潮潜滋暗长,各种反理学、反礼教的观点纷纷出世,批判理学道统对人性的扼杀,肯定人性中自然情欲的天然合理。在此背景下,男女自然的情感才思获得了一种纵欲式的发展,严重威胁着儒家礼教的道德精修。‘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正是旨在对这种男女逞才适情、伤风败俗的时弊进行矫俗正名的儒者之论。与其说它是对‘女才’的一种禁制,不如说它是卫道儒者面对颓俗的无奈嗟叹,亦可以说是对儒家道德价值沦丧的愤激呐喊,所发论之重点首要不在‘反才’,而是‘正德’,包括‘女德’,也包括‘男德’”^[13]。儒学以“德”为本位,重视培养人的德性,而在对“才”的态度上,也不是一概而论地反才,需要区分的是,如果是正德之才,就非常欢迎,若仅仅是适情纵性的诗词歌赋之文才,则加以反对,因为害怕坏了德性。吕新吾在《闺范》序言中说:“自世教衰,而闺门中人,竟异之礼法之外矣。……则不教之故,乃高之者,弄柔翰,逞骚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拨俗弦,歌艳语,近于倡家,则邪教之流也。”^[14]这分明决定了妇女的文学书写在思想上只能正德、守礼,不可轻薄、乱性。对于妇德的强调延续到清代,如女诗人恽珠在《正始集》弁言中说:“则女子学诗,庸何伤乎?独是大雅不作,诗教日漓。或竞浮艳之词,或涉纤佻之习,甚且以风流放诞为高,大失敦厚温柔之旨,则非学诗之过,实不学之过。”^[15]诗教合一因此成为妇女文学的主流思想。

诗教合一在妇女文学中的表现是宣示对女学、儒学的认同与卫护,即便是王著例举的“控诉和抗争”类诗作,也只是渴望要像男性一样为礼教、国家而奉献。王著认为这样的妇女“是有意识地企图建构起一个女性的乌托邦,让更多的女性在精神上获得一种支持。”^{[10](P90)}其实,建构一个希冀融入男性功能圈的乌托邦,本身就是对男性价值伦理观的协同式认同。这种有限度的个性展露,根本不可能对礼教构成挑战。而在贞节问题上,王著对明清妇女文学又似有问责的意思,“然而女性在创作中有一个题材始终没有任何突破,那就是对贞节的颂扬,这也反映出女性

朦胧觉醒时的矛盾心态,她们还不敢突破这一封建礼教的约束,有时甚至还有强化之势”^{[10](P93)}。这个题材在妇女文学中的比例可谓是最大的,而且她们在明“志”的时候并不犹豫,亦无突破礼教的意思或意图。光大中《安徽才媛纪略初稿》载有姚芙卿事迹,谓其“贤而多才。于归甫一年,城陷,恐为人辱,赋《绝命词》,自缢死”。诗云:“到此何妨拼一死,好留清节在人间”^[16]。能以死明志,足见对贞操具有自觉性的认同。

王著分析过这种生活状况,且有诗文佐证。洗玉清之文《广东女子艺文考·序》:“……既婚之后,则心力耗于事奉舅姑、周旋于党者半,耗于料理米盐、操井臼者又半,耗于相助丈夫、抚育子女者又半。质言之,尽妇道者,鞠躬尽瘁于家事……”^{[10](P95)}这些言说表明妇女的生活空间窄狭,且劳动强度大,劳心、劳神的事情繁多,需要时时注意以免出了差错。从明代开始骤然增多的女教著作,均会对妇女的容止做出详细规定,要求她们温柔贤惠、清心寡欲、谨小慎微,必须遵守父家、夫家的生活规范,女儿一旦出嫁,便终身不改,以贤妻良母的要求自警、自省。这种奉献型的生活使她们不得不放弃物质性的享受和追求,转而以精神空间的开拓平衡日常生活的刻板与枯燥。王著所说明清妇女对婚姻的逃避只是个别现象,大多数人愿意接受婚姻的约束,就知识妇女而言,她们的婚姻之烦闷以及婚前之孤寂,都可以通过精神性生活的开掘得以疏导,这种矛盾的调适,成就了她们文学书写的精神品格。

明清妇女文学的精神诉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诉或向同性亲友倾诉生活的困苦、亲情友爱的珍贵。王著列举数首作品分析同性之间的感情交流,认为“这种女性之间的情谊更多的是寻求一种情感和体验的交流,寻求一种女性之间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她们认同和归属的边界,与礼教的边界相重合。因而,王著也说:“明清女性笔下的姐妹情谊,是在男性主导和认可的范围内,女性自我生活的丰富和补充,基本上并不含有性别对抗的色彩”^{[10](P105)}。第二种表现王著没有归纳整理,就是对自然景观的感情性描

绘。明清妇女在婚前和婚后都不可能拥有大量长久的同性情谊,她们基本上不涉外事,主要生活在家庭(居室和庭院)里,偶尔会有出门游山涉水的机会,这决定了她们接触自然风物的比例远远大于接触喧闹的人市。所幸中国的造园技术相当高超,种花植草,造假山开小溪,曲径通幽、移步换景,徜徉其中,仿佛置身世俗之外,往往能触发诗性的感受。“在传统社会,女性的生活空间比较狭窄,狭窄的自然空间无形中拉长了女性的精神时间”^[17],呈现出时间空间化的趋势,在庭院里感受时间的洗涤,沉思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正如清代来华耶稣会士蒋友仁神父在一封信中写的:“中国人在园林的装饰中利用了技巧来美化自然,……在中国园林中,眼睛不会疲倦,景观几乎总是限于与之相应的空间,你可以看到整个激动人心、令人沉醉的美。”^[18]发现诗性,就是体悟到诗、思、在的同源关系,这种“惠赐之力唤醒了热爱旷野的感觉,即便是久埋心底的深深的忧伤,山中小道也是化悲伤为喜悦的理想场所”^{[19](P70)}。女诗人商景兰著有《闺中四景歌》和《闺中四景词》,描绘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自然景象和创作主体不同的感情变化,在情景交融中领悟生活和生命的意义。开启精神世界的明清妇女,通过对诗性生活的把握,稀释或转化世俗生活的单调与严酷,这是她们找到的最好的应对礼教的方法。

如上所述,在明清妇女的文学中,我们看到守礼教尽妇职虽然使她们受尽折磨,却不期然地让她们在闲暇时发现了另一种可以超越世俗家庭生活的精神生活,在思想与自然接通的时候,发现存在的伦理意义和劳作的意义。

三、妇女文学传统能否传承到现代

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里,妇女及其所留下的文学传统几乎没有被看好过,经常被批评得一无是处,林毓生所说的“全盘性反传统”在这里非常适用。明清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妇女来说是为她们开拓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它并不反女学、反礼教,到清末民初的时候,女学和礼教还能够应对变幻的局势,但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开展,妇女传统在接纳现代因素的同时,自身也开始了转

型,形成了一种笔者尝试称之为女性文化守成主义的思想潮流,其立足现代,有选择地接纳妇女传统中的良性因子,使其与现代女性人文主义相结合,塑造中国现代型女性人格和精神操守,意义在笔者看来是巨大的。艾恺(Guy S. Alitto)分析过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认为梅光迪、晚年梁启超、梁漱溟、辜鸿铭、林纾等人“主张复苏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同时坚信中国文化不但和西方文化相当,甚至还要优越。”这种“反现代化”的立场促使他们“提倡融合的中西文化,指出未来的世界文化——或最起码将来的中国文化,会是一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体。我把这种立论,称作‘文化守成主义论’”^[20]。给艾恺阐述的文化守成主义加入一个性别视角,就会发现其与女性文化守成主义的同与异。比如辜鸿铭在接受传统的时候,把那些压抑女性的内容也看作是优秀的传统,这显然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女性文化正常的现代性转化。不过,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要提倡中西文化的融合,致力于传统的现代传承,这正是希尔斯对传统的理解。

晚清救亡图存的严峻局势迫使维新派找到以女性解放为手段而自新、自强的突破口,欲图挽狂澜于既倒。他们培养女性的国民意识和家庭意识,呼吁“强国保种”,提倡新贤妻良母主义,虽然他们未脱离礼教,但对于晚清女性来说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王著对晚清提倡的贤妻良母主义并不看好,因为是“仍然立足于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道德的框架内,没有改变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状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加重”^{[10](P129)},而且还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这种判断建立在部分男性论者的言论上,如王著所引史宝安的话:“女子以生育为其唯一天职。……若使之外驰,则家政废弛”^{[10](P131)}。极端武断的言论肯定会有一些,但并不是大多数,主流意见其实是多具有建设性质,以渐进方式促成女性的现代变革。王著所引蔡元培的意见,按说极具有可行性,也并非只想把女性拘囿于家庭之中,他只是强调了家政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以此培养新型的贤妻良母。他说:“今日女子入学读书后,于家政往往不能操劳。亦为人诟病。必也入学后,于家

庭间之旧习惯有益于女德者保持勿失,而益以学校中之新智识,则治理家庭各事,必较诸未受过教育者,觉井井有条。……夫女子入校求学,固非脱离家庭间固有之天职也。”^{[10](P131)}当今女性学界多有不赞同提倡贤妻良母者,以为会使女性退回到家庭做全职主妇,这种担忧可以理解,但并非一提倡贤妻良母就是规劝女性全身心回归家庭,社会对女性的回应其实是在不断地向其敞开更大的生存空间,并不不断地对两性的空间占位进行调整。因而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也并非仅仅要她们作一个守在家里的贤妻良母。也许可以这样理解,当社会还不能给女性提供更多生存机会的时候,作有知识文化的贤妻良母肯定比作愚妻恶母好得多。

晚清更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还是由女性自己提出的,比如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在1898年就倡导“男女平等”,同年王春林发表了《男女平等论》,1907年秋瑾写了《勉女权歌》,都旗帜鲜明地要求男女平等,改变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不良格局。按说,提倡男女平等与呼吁贤妻良母并不是不可同时进行的事情,但王著对此进行了价值区分,认为呼吁贤妻良母是“附和男性启蒙者的论调”,提倡女权才是“表述了自己的思想”^{[10](P140)},其实提倡女权的女性中以为并行不悖的也自有人在,吕碧城即是如此。她的《书怀》有“谁起平权倡独立,普天尺蠖待同伸”^{[21](P1)}的诗句,《写怀》有“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娥眉独立时”^{[21](P6)}的诗句,在长文《兴女学议》中把教给女子知识、塑造独立人格与培养贤妻良母结合起来,说明在吕碧城的理解中做贤妻良母并不影响女性人格的独立。一方面吕碧城反对传统中压抑女性的内容,一方面又对妇德、礼教保持尊重,但也不是全部认同,她采取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夫礼教有随时事变迁以求完善之必要,而无废弃之理由”^{[21](P475)}。吕碧城不是泥古不化的女性,她持一种变化的礼教观,在德性、礼俗的建设中融入了西方的现代因子,这样就使女性既脱离了礼教的压抑性教育,又保持了礼教中人文主义教育的内容,与现代女性人格独立的教育进行良性结合,培养女性健全的人格,这就是女性文

化守成主义的思路,显得稳健而妥当。可惜的是学界很少关注这个问题,王著也不例外,尽管谈到吕碧城的诗文和思想,也没有离析出这一重要的转型资源。

在王著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由此催生的新一轮女性解放思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和分界线。之前的变化都具有保守的性质,只有到了“五四”才掀开崭新的一页。可见,王著采用的是断裂性史观,因袭的重负终于可以摧毁、卸下。但历史往往是复杂的,正如激进主义思潮的兴起,激发了文化守成主义的应战一样,新一轮的女性解放思潮同样引发了女性文化守成主义的应对。而这个应对,在王著中被轻轻一笔带过了,其叙述是这样的:“著名作家冰心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即是沿着男性的思路宣传“贤妻良母主义”的作品”^{[10](P140)}。不消说,这里存在着误读和误判的情况,与作品实际不符。更严重的是,一旦被判为因袭了男性的保守言论,就把女性文化守成主义从晚清到“五四”的传承给腰斩了。

女性文化守成主义在“五四”以后的发展中本来命运不济,而在后人的阐释中又一直被遮蔽和曲解,这就需要反思“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了。新文化运动中一股传承了晚清无政府主义的某些思想,在面对西方文明的焦虑中而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裹挟了巨大的能量,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中国人的信念和知识系统。“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22](P2)}林毓生认为:“这种反传统主义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22](P6)}前述“封建”语意的意识形态变化,也是其中的表现之一,传统与“封建”的指意重合后,对传统的拒绝便成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林毓生的反思特别值得重视,他说:“人们可以抨击所察觉出的传统中的有害部分,而不必一定要全盘地谴责过去。根除某一传统中不合时宜的毒素,通常不一定含有全部否定文化遗产的意思。如果某一传统内的改造潜力是巨大的,那么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对该传统的某些符号和价值经由

改造还可以赋以新意,这种新意,一方面可提供导致进步的‘种子’;同时在另一方面还可以在改革过程中保留对于传统文化某些成分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在建设具有活力的现代化社会的工作中,一些传统文化的成分,不但没有阻碍进步,而且还帮助了这项建设工作”^{[22](P6-7)}。传统女学、礼教坚持培养妇女的德、言、容、工,看中妇女的德性以及在家中重要性,若一概斥之为“封建”的话,那么现代女性还能怎样去建设自我的德性、人格和日常生活?这些合理成分如果不能传承到现代,那么现代女性基本的价值规范又在哪里?当然这里只是就传统因素的提取而言,并非全部认同,对传统所塑造的妇女依附性人格等方面是应该加以拒斥的。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与一个贤妻良母不存在不可兼容的情况,一个具有健全人格的女性也肯定不会把家庭责任当成束缚。再者,也不能因为现代社会给女性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召唤广大女性参与社会运行,因而出现事业与家庭的两难,就一根筋地去贬抑贤妻良母。尽管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很快,简直是日新月异,但还没进化到舍弃婚姻家庭完全个人化的程度,也就是说婚姻家庭在现代社会依然非常重要,需要两性的共同建设,因此冰心接续的文化守成思想即使是在今天也有很大的认识价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过激性地反传统,导致男女两性的文化守成思想均未能很好地在社会上传播并产生普泛性影响,使传统的传承出现了困难,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个问题,以后还会产生困扰。希尔斯说得好:“以统一的速度抛弃所有昔日的事物,这根本就不合乎社会的本质。”^{[3](P43)}傅铿在阐释希尔斯的思想时说:“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是一种社会对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因而一个社会不可能完全破除其传统,一切从头开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传统,而只能在旧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3](P1-2)}这不仅是对历史思想和行为的清醒认识,也是对我们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有益提

醒。只有对历史抱有“了解之同情”和“同情的理解”，才能进入历史中考察妇女文学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设若“眼里只有僵死材料与概念，恰恰没有活生生的处于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人，个体的生命，这就远离了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本性”^[23]。

参考文献：

- [1] 谢无量. 谢无量文集(第五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6.
- [2] 乔以钢, 林丹娅. 女性文学教程[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2-3.
- [3] 爱德华·希尔斯. 论传统[M]. 傅铿, 吕乐,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4] 冯天瑜. “封建”考论(修订版)[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 [5] 高彦颐.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 [6] 任访秋. 任访秋文集(第五卷)[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361.
- [7] 汪晖.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4. 110.
- [8] 廖可斌. 万历为文学盛世说[J]. 文学评论, 2013, (5): 68-76.
- [9] 宋清秀. 清代女性文学群体及其地域性特征分析[J]. 文学评论, 2013, (5): 108-113.
- [10] 王萌. 禁锢的靈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11] 叶绍袁. 午梦堂集(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1.
- [12] 袁枚全集(第3集)[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570.
- [13] 刘丽娟. “女子无才便是德”考述[J]. 妇女研究论丛, 2009, (5): 57-62.
- [14] 陈宏谋. 五种遗规[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16.
- [15] 恽珠. 国朝闺秀正始集[C]. 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刊本.
- [16] 傅瑛. 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M]. 合肥: 黄山书社, 2010. 232.
- [17] 付建舟. 两浙女性文学: 由传统而现代[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9.
- [18] A. O. 洛夫乔伊. 观念史论文集[C]. 吴相,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111.
- [19] 海德格尔. 思的经验(1919~1976)[M]. 陈春文,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20] 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 前言-5.
- [21] 吕碧城. 吕碧城诗文集[M]. 李保民, 笺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22] 林毓生.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M]. 穆善培, 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6.
- [23] 钱理群. 我的文学史研究情结、理论和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书后[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3, (10): 7-58.

A Research on Women's Literature: Analyzing the Masterpiece *A Study on Subject Consciousness in Women's Works from Late Mi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by Wang Meng

BI Xin-wei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n the traditional women's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researchers are used to analyzing the traditional issues and items by means of the modern cognitive style and the modern knowledge,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iterature and the omission of its moral appeals. It is of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is issu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virtuous characters in women's literature.

Key words: tradition; feudalism; feudal ethical code; debate on talent and morality; spiritual life